

目　　录







前　　言

本书是与《清代宰相趣闻轶事》(图文本)同时创作的。所写近代名人范围较广,既有维新人士、革命志士,还有贤臣奸臣、学者商人,以及杰出妇女、宫廷太监等等。共40余人,57篇。

本书不是人物传记,不是对历史人物作全面评价。所记大多仅限于某一历史人物的某些侧面、某些趣闻轶事,故不能仅据此便给某历史人物下结论,要评价历史人物还需作全面深入的研究。

本书内容多不见于"正史",故可以从一些重要侧面补"正史"之不足,有利于加深对有关历史人物的认识。不仅可以扩大知识面,其正反两方面的事例均可资借鉴。谨以此奉献给对历史有兴趣之读者,并敬请批评指正。

作　　者





林则徐记趣


林则徐像

林则徐（1785—1850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民族英雄，也是近代睁眼看世界最早的先进中国人之一。他领导禁烟运动，虎门销烟，英勇抗击英国侵略者的英雄事迹，早已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本文不再赘述，仅从其他一些侧面对此英雄人物略作介绍。

一、勤奋好学打基础

林则徐出身于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以教读为生。他4岁即开始接受启蒙教育，父亲对他谆谆教导，循循善诱，严格要求，精心培养。他也自幼聪明好学，刻苦攻读，童年时即以擅长作文出名。据说，有一次他父亲的朋友来访，想考考他的才学。那人根据南方人多养母鸭生蛋的做法，即出“鸭母无鞋空洗脚”，让林则徐作对。这个对子是很不容易对的，不料林则徐不假思索，即以“鸡公有髻不梳头”作答，简直对得妙极了！

有一次，老师带学童去游览名胜——鼓山，登上绝顶峰后，来了兴致，当即出“山”、“海”二字，令学童们各作一副七言对联。当学童们正



在搜索枯肠、不知如何作对时,林则徐却第一个作出如下对联:"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不但对仗妥帖,天衣无缝,而且构思雄奇,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可见其才思敏捷,立意不凡。故他13岁即考中秀才,20岁考中举人,27岁考中进士,给他以后40年为国为民建立丰功伟业打下了良好基础。



林则徐诗文

二、公正廉明选拔真才

林则徐考中进士后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散馆,任翰林院编修,不久奉派充任江西乡试副主考官。科举考试向来流弊甚多,托人情送红包,抄袭作弊,司空见惯。林则徐大公无私,办事特别认真,决心扫除私弊。他细心审阅考卷,逐卷写出评语,尤其对落选考卷,必逐篇写出其"疵累之处",并自录批语底本,不使有一篇批语相同,同时对抄袭作弊者进行严肃处理。因他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结果所选出的人才,"素有文誉","清贫绩学者甚多",杜绝了滥竽充数现象。发榜后他还亲自调查访问,倾听舆论,得到地方人士的赞颂,大家异口同声称这次考试为"清榜"。

三年后,他被派任云南省乡试主考官。他仍是极力选拔"文理优长"的真才,使云南士子"感悦奋发",有人甚至说:自从汉武帝在云南置郡以来,还从来没有过这次考试的盛举。从此,林则徐公正廉明、办事认真的美名很快地传开了。

后来,在他担任江苏巡抚期间,还亲自担任江苏乡试监考官,选择公正饱学的人担任阅卷官,对他们严格要求,对落选的考卷还进行了复查,发现错判,立即纠正,以免屈抑人才,而对作弊考生绝不轻饶,分别轻重给予"以次降等"、"概行斥革"和"永不准考"等处分。





贡院是清代举行乡试、会试的场所，通常建于城内东南方，图为保留在南京的江南贡院

科举考试是选拔各级官吏的主要途径，关系到政府的吏治，国家的兴衰，他曾说“为国首以人才为重”。科举考试作为“抡才大典”，必须革除积弊，他为此特上一奏折，指出考官或者肆意受贿、舞弊成风，或者不能悉心阅卷，只观其大概，稍不称意，即使人遭落选。考生也夹带、抄袭成风，导致“真才落选”，“愚人擢升”。他建议制订一个考官校阅章程，颁布全国实行，对失职考官和舞弊考生严加惩处。

林则徐不仅在科举考试上为国家选拔真才，在他数十年的官宦生涯中也时时处处留心物色人才，珍爱人才。为了收罗人才，他还专门建立了自己使用的“人才档案”。每逢会见客人，他必详细询问其专长、技能、兴趣爱好，以及经历交游，所交往之杰出人士和地方风土人情等。他身边有四名书记，专门记录整理这些资料。他的书房中特备一个大柜子，里面有 18 个小箱子，按 18 行省分别收藏各省人才资料，以备必要时随时查阅、录用，做到用人时心中有数，以便人尽其才。他的这些资料，实际上就是他的人才档案。

三、廉洁奉公的林青天

1823 年至 1837 年间,林则徐主要在江苏担任封疆大吏,曾任江苏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及两江总督。他主张做官应从基层做起,通过实践获取从政经验。他曾对僚属说:“吾恨不从牧令出身,事事由实践。”他做了大官,更严于律己,曾为厅堂亲自书写如下一副对联:“求通民情;愿闻己过。”上联鞭策自己深入了解民情,感知民间疾苦;下联要求自己虚心听取下属意见,也鼓励别人敢于向他提意见。他嫉恶如仇,急于把事情办好,往往性急易怒,为了时刻提醒自己改正这个毛病,特地亲自书写“制一怒字”的匾额高悬于厅堂之上。

他在江苏任职期间政绩卓著,查禁鸦片烟馆,取缔鸦片贩子,勒令吸毒者戒烟。兴修水利,倡捐平粜,赈济灾民,禁止囤积居奇,减缓赋税,免关税招徕四川、湖南等地米客。兴利除弊,努力做到利国利民。同时清理历年积案,秉公审理,昭雪冤案,被人们称为“林青天”,誉满江南。

1838 年 11 月,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去广州查禁鸦片。当时吏治腐败,贿赂公行,各级地方官对从中央来的大官往往曲意逢迎,溜须拍马,竭尽民脂民膏以盛大款待。尤其是钦差大臣替天子行事,更是地方官巴结的对象,而以往的钦差大臣无不借此作威作福,大摆排场,狠捞一把。林则徐有鉴于此,在临出发前特地给沿途各州县发出一道“传牌”,说明他此行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只带马弁 1 人,跟丁 6 人,厨丁小夫共 3 人,合计仅 10 人,都是随身行走,并不设前站后站之人,所坐大轿 1 乘,自雇轿夫 12 人,所带行李自雇大车 2 辆,轿车 1 辆,其夫价轿价均已自行发给,足以敷其食用,不许在各驿站索取丝毫,各州县亦不必另雇轿夫迎接。所有食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并强调“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于随身所带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如有索取者即须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凛遵毋违,切切”。

从这道“传牌”看,作为一位堂堂钦差大臣,赴任时如此轻装简从,

不带官员亲信，这在有清一代是极为罕见的。自雇车轿，不费地方一丁一卒，只吃家常便饭，并事先传牌，言出法随，认真做到，更是史无前例。其廉洁奉公、纪律严明，跃然纸上。

无独有偶，次年初当林则徐抵达广州上任后，他又亲自书写告示，悬挂在最显眼的办公衙门前。告示明确规定：公馆一切食用，均自行买备，不收地方官供应，所买物件都按民间时价给现钱，不准有丝毫抑勒赊欠。公馆前后不准设立差房，家人出门，乘坐小轿随时自行雇用，地方官不必预派伺候。“如有借名影射扰累者，许被扰之人控告，即予严办，各宜懔遵勿违。”他不但在告示上这样规定，而且严格检查执行，所以手下之人无敢违犯，杜绝了官僚借机收受贿赂、扰累地方，也大大有利于他查禁鸦片工作的开展。

要禁烟，必先了解烟贩们贩毒的情况。林则徐除了明察暗访，作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之外，还想出了一个高招，他以了解地方民俗民情为由，举行“观风试”，这是一般官员到一个新地方上任常采取的措施。

他把广州城四大书院的数百名生员全集中到越华书院参加考试。开始考生们以为这是例行公事，无非想了解地方上的情况，照直写上就是。不料打开试卷一看，人人目瞪口呆，原来试卷上的题目主要有如下几个：

1. 广州最大的鸦片烟馆在哪里？此外还有哪些烟馆？

2. 鸦片贩子有哪些人？

3. 有哪些官员接受过鸦片贩子的贿赂？

所问的问题全都与贩毒有关，显然是为雷厉风行开展禁烟运动作准备。但那些烟贩和受贿官员很有势力，生员们不敢得罪，故试卷上特别声明考生不要写上自己的姓名，以解除考生的顾虑。于是考生们放心大胆，知无不言，使林则徐掌握了大量信息。

四、设巧计救灾民

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担任湖广总督，正值大旱灾年，米价腾贵，老



百姓面有饥色,度日艰难。林则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了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便倡议各级官员,量力捐钱买米,平价卖给百姓。可是官员们都面有难色,谁也不肯捐,林则徐又不能强迫大家捐献,故其倡议无法实现。

不久,林则徐便贴出告示,定于某日虔诚祈雨,上自巡抚、藩司、臬司,下至各州县官都要参加,照例还必须在前一天沐浴斋戒(吃素)。到了规定日期,林则徐徒步来到祈雨祭坛,各级官员跟随其后,烧香祭拜之后,在地上铺上芦席,各人在芦席上依次静坐。当时骄阳当空,不许遮阳,也不设茶水,闷热异常,各官员有苦难言。林则徐说:“我辈平日养尊处优,不识民间疾苦,今日愿与诸君共尝之。”大约静坐了有三炷香工夫,各官员口渴难忍,林则徐说:“茶水还是可以少喝一些,便命人拿来茶水,林则徐先喝了,然后依次分给各官员喝,大家早就口干舌燥,接过茶水一饮而尽。茶水中有催吐药物,不久林则徐先大吐起来,其余各官员也跟着大吐。林则徐说:“这足以检验我们求雨是否有诚心。”命令大家不得把吐出来的东西掩埋掉。他亲自逐个检验,并命随从一一登记所吐之物。检验结果,除了林则徐一人吐的是野菜和米饭之外,其余官员所吐的都是荤腥厚味,显然违反规定,没有在前一天吃素斋戒,证明他们求雨之心不诚。林则徐立刻沉下脸来大怒说:“为民请命求雨,难道就是你们这样子吗?天心之不仁,降灾于百姓,都是你们视民命如儿戏所招来的。”众位官员深感惭愧和惧怕,怕林则徐将此事上奏朝廷,弹劾他们,从而丢掉乌纱帽,于是纷纷表示愿尽力捐钱,买米平粜,救助灾民,将功折罪。林则徐略施小计,便救了灾民,渡过了难关。

五、家有贤妻郑淑卿

一个伟大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贤淑的女人,林则徐也是如此。他14岁即与本城朱紫坊名儒、著名进士、前河南永城县知县郑大谟的长女郑淑卿订婚,时郑淑卿年仅10岁。岳父郑大谟是官宦富裕之家,而



林家却是穷苦寒儒，门不当，户不对，郑家为什么肯把长女下嫁林家呢？因郑大谟是慧眼的伯乐，他看中了林则徐的人品和学识，料定他将来必成大器，所以很痛快地把长女委身于他。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人生两大快事。林则徐选在他考中举人举行鹿鸣宴的那天，与郑淑卿举行结婚典礼，集人生两大快事于一日，真是双喜临门，喜上加喜，一时传为佳话。这一天，平时比较冷清的林宅，顿时宾客盈门，高朋满座，热闹非凡。这时林则徐 20 岁，郑淑卿年方二八，婚后伉俪情深意笃。郑淑卿从富裕的娘家来到林家，过着艰苦的日子，她无怨无悔，祸福同享，生死与共，无微不至地体贴照顾丈夫，操持家务，使丈夫能全心全意投入学业和事业。

林则徐在宦海沉浮 40 年，官职经常变动，服官地点也跟着不断变更，有时一年之内即变更两三次，先后历官十四省。郑夫人也往往跟随丈夫北上南下，东奔西跑，长途跋涉，历尽艰辛，从无怨言。她生第三个孩子时，就是在从杭州返回福州的途中，生于建州的船上的。

林则徐蒙冤遣戍新疆时，郑夫人不辞辛劳率家人陪送他到西安，然后命儿子陪丈夫去伊犁，自己与女儿、儿媳驻守西安，常通过驿站递寄家书，或诗词唱和，使孤身处于偏僻荒凉边陲的丈夫得到温暖和鼓励，增添了他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林则徐历勘南疆八域，行程三万余里，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六十八万余亩，为开发和巩固祖国边疆作出贡献。

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十二月，林则徐奉旨被释放。次年八月林抵西安接任陕西巡抚。中秋佳节阖家团圆，喜不自胜，在抚署后花园设席，园中花木扶疏，山水成趣，景色宜人。林则徐多年来没这么高兴过，席间林则徐心情特别兴奋，他说这里的景色好是好，如果能在厅堂悬挂上十盏宫灯，再摆上十盆素心兰，那才是尽善尽美呢！没想到不久果然看到十盏宫灯高悬，长廊上兰花的幽香沁人心脾。郑夫人虽是诰封一品夫人，可一向生活十分俭朴，从不铺张浪费。她见此情景便劝告丈夫说：增添这些宫灯、兰花固然十分惬意，可是这花是远地运来，这灯也要





林则徐祠堂

花不少钱,我们当官的居于百姓之上,应该谨于事而慎于言,不可不勉。林则徐听了很受启发,马上叫人把宫灯、兰花撤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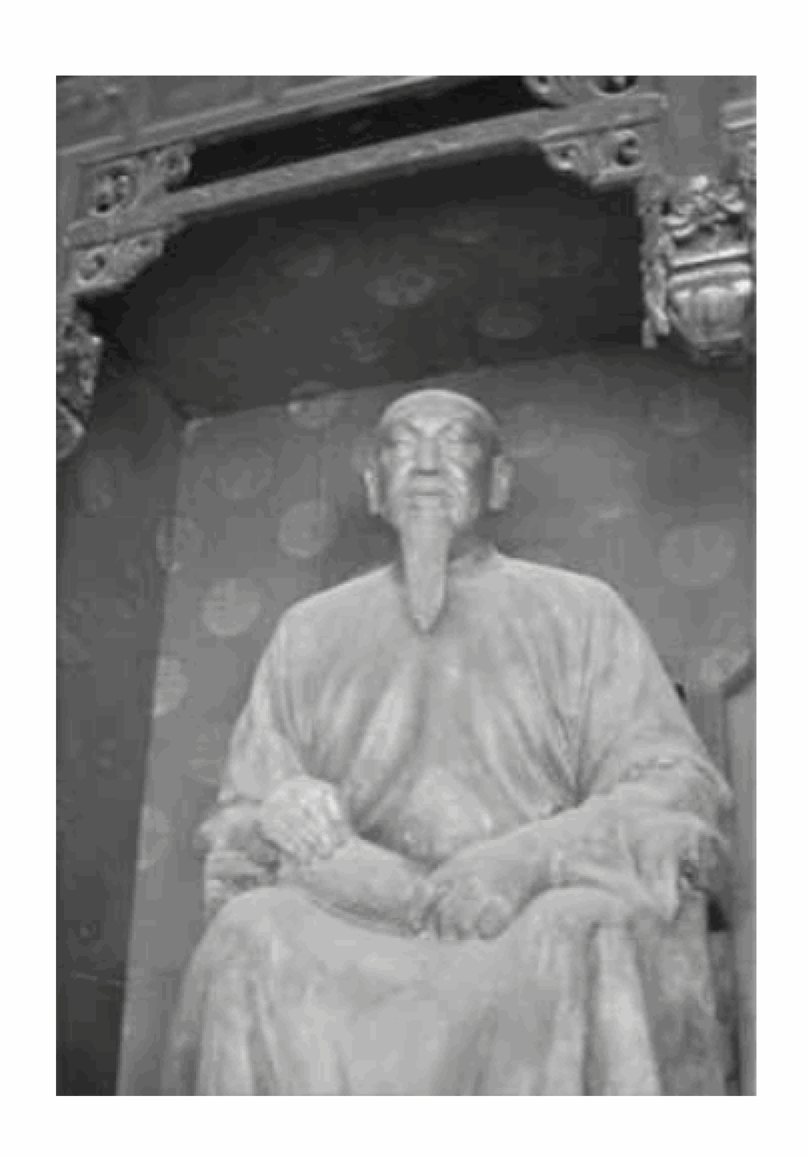
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五月,林则徐奉旨调任云贵总督,郑夫人已年近花甲,仍“以久病之躯,万里相从”,随丈夫从西安奔赴昆明上任,十一月竟病死于昆明,享年 59 岁。林则徐痛失厮守终身的贤内助,万分悲痛,临终因儿女均久在外地,竟不能相见一面,只有小女为之送终,林则徐心如刀绞,哀叹:“暮年遭此,其何以堪!”只过了三年他也踏上了黄泉路。

林则徐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不但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也得到世界各国正直人民的景仰,成为 19 世纪中叶名扬全球的伟人。他反对英国肮脏的鸦片贸易,是抗击英国侵略的英雄,却仍得到英国人民的颂扬。1838 年杜索夫人在伦敦创办了蜡像馆,专门陈列世界各国的伟人、名人蜡像,不久,该馆便陈列了林则徐的蜡像,供英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瞻仰。



林则徐与王鼎的友谊

道光十八年(1838 年)九月,湖广总督林则徐上书清廷,坚决主张严禁鸦片。以大学士穆彰阿和直隶总督琦善为首的封建官僚集团因大量收受外国鸦片贩子的贿赂和其他好处,而反对禁烟。当时任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的王鼎则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支持林则徐等人的禁烟主张。他向道光皇帝进言:林则徐"多谋善断,有守有为,堪当重任"。道光皇帝采纳了王鼎的建议,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往广州查办。从此,这两位杰出的爱国者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林则徐坐像

1840 年年底和 1841 年年初,当清廷在侵略者面前屈膝投降、将林则徐革职继而充军新疆的时候,王鼎曾领衔保奏,但未成功。1841 年 8 月,黄河在开封府城西十余里南厅祥符汛三十一堡的堤防处决口,滔滔洪水,一泻千里,开封城和下游广大地区的百姓遭到了洪水的肆虐。道光帝急派王鼎赶赴祥符督办河工。王不顾穆彰阿等人的反对,极力要

求道光帝命赴新疆途中的林则徐留下,协助他"襄办河工"。这样,从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八月到次年三月,他二人同心协力,不辞劳苦,在风沙和严寒中奔波筹划,率领数万民工日夜奋战,终于使大工合龙,河水归道。



王鼎塑像

王鼎对林则徐在祥符大工合龙工程中的作用十分赞叹。他在给道光帝的奏报中说:"林则徐襄办河工,深资得力",同时希望皇帝能按往常惯例,论功行赏,重新起用林则徐,至少也可以将功折"罪",赦免流放。王鼎深信自己的建议是能够被采纳的。在庆贺工程合龙的宴会上,王鼎请林则徐坐在首位,并亲手把皇帝赐给他的黄马褂披在林则徐身上,表彰他的功劳。当时,圣旨到,谕曰:"于合龙日开读。"王鼎忍耐不住内心的高兴,他和林则徐放怀痛饮,并向林暗示:还有好事啊!但出乎王鼎意料的是,圣旨上曰:"林则徐于合龙后,着仍往伊犁。"王鼎愤愤不平,多次上折挽留,但由于投降派的阻挠和道光帝态度的变化,终未改变决定。

林则徐从祥符工地起程,王鼎相送于河干,两人依依不舍,王鼎更是老泪纵横,涕泣不已。林则徐写了两首诗送给王鼎,以谢知遇之恩和由衷的祝愿。诗中说道:

幸瞻巨手挽银河,休为羁臣怅荷戈!
精卫原知填海误,蚊虻早愧负山多。
西行有梦随丹漆,东望何人问斧柯?
塞马未堪论得失,相公且莫涕滂沱!







林则徐墨迹

元老忧时鬓已霜，吾衰亦感发苍苍。
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
人事如棋浑不定，吾恩每饭总难忘。
公身幸保千钧重，宝剑还期赐尚方！

王鼎辞别了林则徐，回到了京城。他在皇帝面前怒斥穆彰阿、琦善是秦桧、严嵩。奸诈的穆彰阿不敢争辩，只是阴险地一笑躲开。道光帝佯装不知，对王鼎说："你是醉了吧？"要让太监把他扶下去。王鼎仍"刺刺不休，上怒，拂衣而起，文恪（王鼎）执裾大言曰：'皇上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老臣知而不言，无以对先皇帝！'"王鼎既痛心皇帝昏庸无道，不听忠言，又恨穆彰阿、琦善欺君误国，陷害忠良。乃草就遗折一本，沉痛写道："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用，林不可弃。"他将遗折放入怀中，"乃于茶房别院缢焉"，演出了一幕"尸谏"的悲剧。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五月底，在伊犁的林则徐从友人的来信中得知王鼎的"尸谏"噩耗，悲恸万分。他作诗寄哀：



下马有坟悲董相,只鸡无路奠桥公,
伤心知己千行泪,洒向平沙大幕风。

他又作如下挽联和挽词:

各位显韩城,叹鞅掌终劳,未及平泉娱几杖。
追随思汴水,感抚膺惜别,还从绝塞恸人琴。

廿载枢机赞画深,独悲时事涕难禁。
艰屯谁是舟同济,献替其如突不黔。
卫史遗言成永憾,晋卿祈死岂初心?
黄扉闻道犹虚席,一鉴云亡未易任。

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八月,林则徐接任陕西巡抚。他来到王鼎的故乡蒲城为这位先辈守"心丧"。然后步行八里到城西忽家村为王鼎扫墓,并参加了纪念王鼎八十诞辰的活动,还亲笔写了"味兰书屋"和"槐阴山房"两块匾额,以贞洁常青的味兰和不畏严寒的槐荫来比喻这位先辈的品格和精神。



余黄堂狐媚药方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道光皇帝和战不定，朝中主战派与主和派斗争很激烈，但主和派占上风，道光帝最终接受主和派的意见，罢斥禁烟有成的林则徐，派主和派的琦善为钦差大臣，到广州与英军谈判。琦善执行投降路线，竟私自与英国人签订《穿鼻草约》，接受割让香港及赔



1840 年 9 月，英舰北侵到渤海，向直隶总督琦善提出六项要求，清廷在英军武力威胁下，派琦善到广州与英军议和

款等条款。该草约未经清廷批准，但英军却悍然宣布占领了香港。

消息传来，群情大哗，抵抗派官员纷纷上奏折，要求罢免琦善，重新起用林则徐。道光帝也不愿轻易割地赔款，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一月决定对英宣战，派他的侄子、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往广东主持战事。奕山率大军一万七千多人齐集广州，但他并没有抵抗侵略者的决心，反而敌视勇于抗敌的广大人民。认为“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寇”。四月初一日（公历 5 月 21 日）奕山怀着侥幸心理，出兵夜袭英船，初获小胜。次日，英军进行反扑，只经过 5 天战斗，城外炮台便全部失守，清军全部退入城内，再也不敢抵抗，并急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向英国人乞降，订立城下之盟——《广州条约》。

正当奕山、余保纯之流向英军屈膝投降之时，广州广大人民群众却挺身而出，展开英勇的抗英斗争。四月十日（公历 5 月 30 日），广州北郊三元里 103 乡约 5 000 义民，围攻英军所占领的四方炮台，打得英军丢盔卸甲，鬼哭狼嚎，陷于绝境。英军头子义律不得不向广州知府余保



三元里人民的讨英檄文



纯求救，余亲自出马，使尽欺骗、威胁等手段，强迫义民解散。英军在清朝官兵的保护下逃出了重围。鉴于余保纯及其后台奕山等投降派的丑恶嘴脸，时人特作《狐媚药方》予以揭露和讽刺。全文如下：

金黄堂号（指余保纯）《精制狐媚药方》，服用可延年益寿，润身肥囊，固宠求荣。须认明专办讲和，情真价实，主顾不误，招牌为记。药方如下：柔肠一条，黑心一个，厚脸皮一张，两头舌一根，媚骨一副，屈膝一对，叩头虫不拘多少，笑脸三分。以上八味药材，用笑里藏刀切碎，口蜜为丸，藏于乌龟壳内，临用时以狼心一个，狗肺一副，煎成糊涂，和药送服。

此妙文对奕山、余保纯之流，狼心狗肺、卑躬屈膝、奴颜媚骨、卖国求荣的罪行，鞭挞得痛快淋漓，入木三分，又极其诙谐风趣，表达了广大人民对卖国贼无比痛恨的心情，被广为传诵。





耆英与《南京条约》的订立

第一次鸦片战争持续了两年之久,英国侵略军为迫使清廷尽快全面妥协投降,决计避开中国沿海,溯长江西上,打击心腹重镇——南京。

英军经过镇江时,遭到了中国军民最顽强的抵抗后,于1842年7月下旬侵占了镇江。8月6日,英国"东方远征军"的76艘舰艇(战舰11艘,汽船13艘,运兵船4艘,运输船48艘)直趋南京,在下关江面下了锚,大小英军舰艇列阵架炮,又派士兵登陆,扬言要水陆并举,攻击南京城。



璞鼎查(1789—1856年),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闰三月接替义律出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次年,胁迫清廷签订《南京条约》,后任英国第一任驻香港总督

一贯主张对英军妥协投降的两江总督牛鉴吓慌了,立即出面与英军协商投降事宜。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则认为,牛鉴只是地方官吏,不是清廷派出的全权代表,拒绝和他谈判。同时宣称,清廷派出的全权代表



耆英不立即来和谈，就马上攻城。牛鉴只得派人飞报在无锡的钦差大臣耆英。

耆英和牛鉴一样，认为“夷情可畏”，力主对英军妥协屈服。当时，他已接到道光帝“专意议抚”的密谕，命令他和伊里布等要“俯顺夷情，俾兵萌早戢”，在和谈时“不必虑有掣肘”，全权办理妥协投降事宜。

这样，耆英、伊里布急忙向英军乞和，并通知璞鼎查说：“钦差大臣已奉谕旨，永定和好，不日即可到省。”璞鼎查表示接受和议。

8 月 11 日，耆英、伊里布赶到了南京，马上派出江苏按察使黄恩彤等与英国侵略者接洽，具体商量投降条件。第二天，耆英、伊里布和牛鉴等按照英国侵略者的要求，开始进行正式和谈。

实际上，英国政府早就为英方全权代表拟定好了两个谈判方案：第一个方案，要求割让沿海一岛和开放五处贸易口岸；如果清廷不同意割地，则以第二个方案代替，即要求：①在五处口岸自由贸易和居住；②规定“公平”、固定、划一的税则；③商业上实行最惠国待遇；④对英人贩运违禁品（指鸦片）只准没收其货物，不得侵犯其人身；⑤领事裁判权。

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为了诱迫愚昧无知的耆英等人全盘接受英国政府的两个方案的所有条款，在谈判过程中软硬兼施。8 月 20 日，还特地邀请耆英、伊里布和牛鉴等中方代表到英军旗舰“皋华丽”号上去“访问”。

当中国代表登舰后，英军耀武扬威，“摆队挎刀”，吓得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的耆英等目瞪胆裂。两江总督牛鉴原来一直认为英人是用牛来推动军舰前进的，不相信人们所说的是机械动力的作用，登舰“参观”后，“至是始叹而信之”。

最后，耆英向道光帝奏报道：“貌甚恭谨，词甚谆切，不得不俯顺其请”，要求全盘接受英方提出的所有条款。

道光帝在上谕中则回复说：“当告以大皇帝相待以诚，允准通商，汝国亦应以诚相待。”

1842 年 8 月 29 日，在英国炮舰兵临南京城下的威胁中，以清朝孀



和全权大臣耆英等为一方,以英国全权大臣璞鼎查等为一方,齐会于南京仪凤门(即兴中门)外的静海寺,耆英恭顺地伏首在璞鼎查早已拟定好的条约文书上签字画押,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也称《江宁条约》)。西方列强欺侮东方巨人——中国的百年屈辱史,就这样从石头城下首开纪录了。

静海寺是明成祖朱棣为纪念郑和下西洋航海平安归来而建造的佛寺,位于苍翠欲滴、郁郁葱葱的狮子山麓(明朝前叫卢龙山)。当年郑和再度下西洋时,还曾在此寺祭海神。谁知,这座静海寺竟会成为中国近代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之处。



《南京条约》议约地——静海寺

《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天,即8月31日,璞鼎查及其随员们趾高气扬地从仪凤门进入了南京城,耆英卑躬屈膝,设迎接的行台于上江考棚,竟然还鸣礼炮向侵略者致敬,并大开满汉全席,盛情款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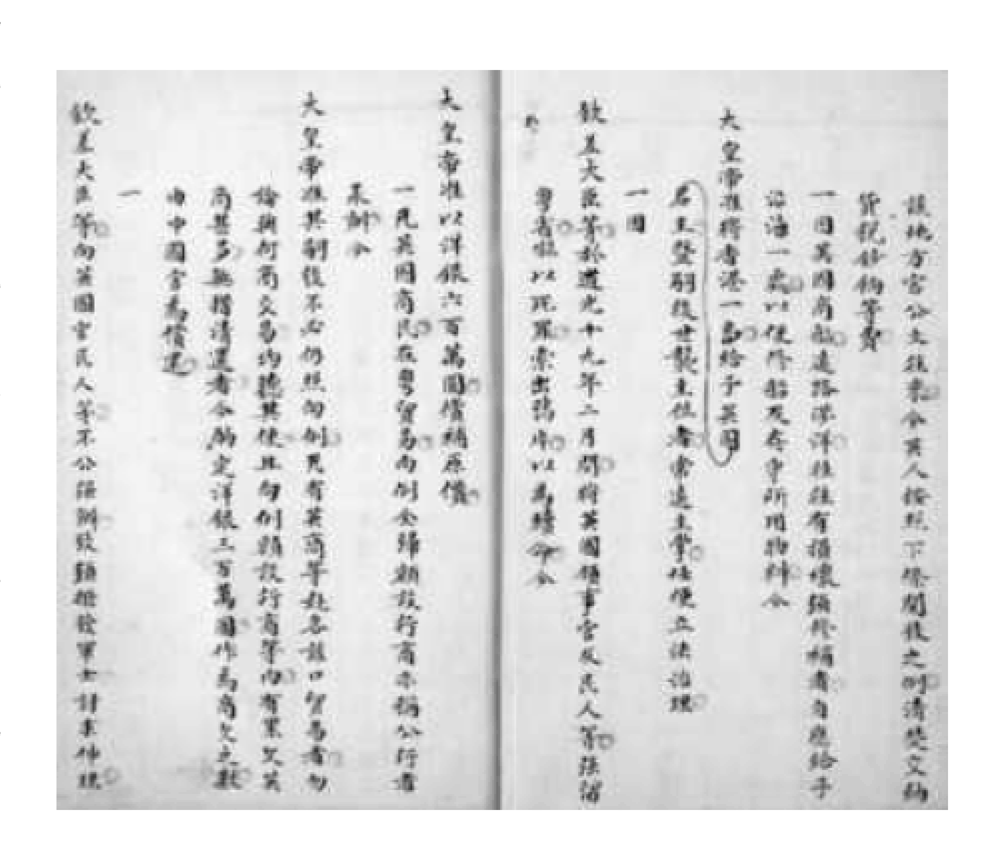
在宴会上,英将莫礼逊以胜利者的姿态,大肆吹嘘英舰进犯南京的经历,还得意地宣称,他们本来是不敢深入长江的,后来曾派了奸细沿长江侦探了七次,对江水流速、深浅及港汊、险隘等都进行了详细的勘查,同时侦悉了江防武备薄弱。而英国间谍在从事这些活动时,竟如入无人之境。英国兵船能够顺利绕过吴淞口,沿长江西下,这是经过了长期周密策划的。莫礼逊夸口说,他们就要征服"长江天堑"了!

钦差大臣耆英等中国官员们,却被莫礼逊那一口流利的汉语,又如此熟悉中国的"长江天堑"而深深地惊呆了,"恐夷症"一下子平添了十分。当天,耆英又向道光帝奏报称:"该夷船坚炮猛,初尚得之传闻,今既亲上其船,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伏。"

对于钦差大臣耆英的这种恐洋丑态,连道光帝也看不下去了,提起硃笔来在奏折上批道:"可恨!"但朝廷上下可以信赖的敢去同洋人打



交道的又只有耆英、伊里布这批人，道光帝不得不又委派耆英、伊里布等人负责到广东同英国人进一步商讨条约的各项细则。由于伊里布年事已高，一到广东就病死了，以后的谈判主要是耆英一人承担的。



《南京条约》（部分）

第二年7月22日，双方在香港议定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10月8日正式签字），于10月8日又在广东虎门签订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件。

当中英和谈全部结束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又向耆英提出：这次英国换约之后，也许会派遣一位公使到北京，中国方面能满意招待，予以相当的尊敬吗？耆英马上很诚恳地回答：我敢担保大皇帝一定很喜欢接见这样一位代表。上次阿美士德爵士来中国时，一些当政的大臣在那里拨弄，我觉得很抱歉。

紧接着，璞鼎查又要挟耆英说，英军去年在攻打台湾时，受到当地军民的抗击，被打死了32人，俘虏了133人，要求惩办有关官员。耆英马上写奏章，诬陷在台湾领导军民英勇抗击英军的台湾兵备道姚莹和总兵达洪阿，致使这两位爱国官员被革职和逮捕问罪。





官文与胡林翼狼狈为奸

清朝是满洲少数民族建立的，入主中原后，为了巩固满族的统治地位，不得不利用汉族官绅，但又对他们心存疑忌，尤其不许他们掌握军权。自从太平天国起义，以至几乎占领南方半壁江山，单靠满族原有的八旗、绿营武装已无法把太平军镇压下去，清廷不得不起用汉族将领，发展汉族地主武装，从而涌现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汉族著名将领，号称“曾左李胡”，他们组织了湘军、淮军。清廷既要依靠他们镇压太平天国，又对他们极不放心，严加防范，派得力的满族大员进行监督和钳制。



曾国藩像



左宗棠像







李鸿章像



胡林翼像

咸丰四年(1854 年),太平军攻占武汉。次年,任荆州将军的满族官员官文升任湖广总督,统辖湖南、湖北两省。第二年胡林翼升任湖北巡抚。清廷显然是要利用胡林翼配合曾国藩的湘军,夺回武昌及两湖被太平军所占领的地区,而以官文加以监督。

官文只因是满洲贵族而得以青云直上,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才干,事无巨细都不费心,多假手于幕友或家丁,自己则沉溺于酒色,每夜在总督府张灯奏乐,偎红倚绿,尽情行乐。因此胡林翼很轻视他,致使督抚二人关系很不融洽。

其实,胡林翼年轻时也曾醉生梦死,鬼混青楼,比官文有过之而无不及。他 19 岁与两江总督陶澍的第七女结婚,婚后就住在南京岳父的两江总督府。那时他少不更事,胸无大志,不求上进,成天泡在秦淮河红灯区的妓院中,仅一年多时间,就花掉岳父百万两银子,简直是挥金如土。

岳父陶澍见他人很聪明,颇有才气,是个可造之材,将来必成大器,但若听任他这样沉沦下去,就会毁掉他的一生,于是对他进行教育,促使他彻底悔悟,重新做人。他也是孺子可教,便拜别岳父母,携爱妻进京,埋头苦读,积极准备参加科举考试。他终于一举考上举人,在四年



后的下一科会试中又考中了进士，时年26岁。后来他又在官场中崭露头角，很快就被提拔为湖北巡抚。因他年轻时有过一段花天酒地的沉痛教训，更使他对官文的行为不满，可说是浪子回头金不换。

当然，他瞧不起官文，主要还是因为自己很能干，又很肯干，肯为朝廷出生入死，而官文却既不能干，又不肯干，居高位而不肯效死力。胡林翼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连曾国藩都经常夸奖他说："胡宫保(林翼)忧国之诚，进德之猛，好贤之笃，驭将之厚，察吏之严，理财之精，何美不备，何日不新，天下宁复有斯人哉?"

就拿解决军饷的事来说，当他率军进驻黄州，兵饷不继时，他亲自撰写言简意赅的一篇短韵文，印发各有关厘局催饷。文曰：

> 开口便要钱，未免讨人厌。官军急收城，处处只说战。性命换口粮，岂能一日骗?眼前又中秋，给赏更难欠。惟祈各路厘局大财神，各办厘金三万串。

此文仅56个字，即把军饷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讲得一清二楚，并提出了各付3万串的具体要求。文发后，仅旬日间，各地厘局即把饷银络绎不绝运来，解决了燃眉之急。

官文有自知之明，他自认才干不如胡林翼，为了倚重胡对付太平军，有意主动与胡相结纳，曾三次前往拜见，胡都托词不见。有很多事情，胡也自作主张，径直行事，不与官文商量。官文所用之人也多被胡参劾罢官，致使官文的幕僚愤愤不平，主张官文也参劾胡所用之人，进行报复，官文不同意。胡以军械不继，派人持令箭到总督署坐索，不给不走。官文的幕僚都大怒，认为欺人太甚，异口同声对官文说："他们如此无礼，公即使不生气，我们在这里也觉得没有脸面，应该上奏朝廷参劾他。"并替官文起草了一份弹劾胡林翼的奏折。

官文在大事上并不糊涂，他认识到大敌当前，自己无力对抗太平军，胡又是一位很得力的干将，不依靠他将坏大事，绝不可意气用事。



于是他耐心开导幕僚说:“我所统率各军,不论派哪一军去抗击太平军,能像胡林翼那么得力吗?”幕僚不得不承认不能。官文又说:“我亲自出马,亲统各军去抵抗太平军,能比胡林翼更得力吗?”幕僚又承认说:“似也不能。”于是官文说:“我辈的才干都不如胡林翼,而他独任其劳,在前方拼命,我们安享其逸,已甚惭愧。而且此间大僚只我与胡,我无胡不能御敌,胡无我不能筹饷,若因一些小事而闹翻,国事将由谁来担任?”他把利害关系说得非常透彻,幕僚们听后都对官文的深谋远虑大为折服。

胡林翼的幕僚见督抚不和,恐误大事,便规劝胡说:“天下未有督抚不和而能办大事者,况且官文为人平和,易于相处,若能善与结交,必能左右他,这样实际上就等于你巡抚兼任总督,何乐而不为?”胡听此言,觉得很有道理,就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态度,主动去拜见官文,官文求之不得,也推诚相结,两人互有所需,相互利用,终于和睦相处,共同对付太平天国。

有一件事使官文十分感激。官文有一爱妾过生日,为表示宠爱,讨她欢心,伪称他夫人作寿,遍邀百官往贺,进行隆重庆祝。届时嘉宾云集,门庭若市,确实很风光。湖北布政使已递进手本,才得知并非夫人寿辰,只不过是小妾的生日,认为受了欺骗,勃然大怒,索回手本,将悻悻而去。胡林翼正好来贺,见状询问何故,布政使说:“若是夫人寿辰,我们来祝贺,这是应有的礼节。今天我们是朝廷的大僚,岂能屈膝去祝贺一贱妾的生日?”说罢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一带头,道府以下官员也纷纷索回手本,准备返回。这样一来,官文本来想求荣耀风光,结果将适得其反,反受其辱,局面将会很难堪,被人传为笑柄。

胡林翼心中赞叹布政使的骨气,但为了顾全大局,团结官文,他竟写了非常客气的“晚生胡林翼顿首拜”的帖子进府祝贺。其他官员见巡抚都亲往祝贺,又都改变态度,纷纷跟着进去贺寿,使官文挽回体面,不至于尴尬,尤其是官文的爱妾更感激胡林翼的恩德。



胡探知官文对爱妾言听计从,宠而畏之,便以夫人的名义邀请官文爱妾过府游宴。他特地关照母亲善待她,不仅阖府热情接待,而且胡母还认她为义女,胡便成了她的义兄了。从此,胡的举措,考虑到官文不易接受的,便先告知其妾,妾便向官文吹枕边风,使难题迎刃而解。妾常对官文说:"你的才具识见,怎能比得上我胡大哥?不如依从胡大哥为好。"故官文对胡的主张未尝有异议,使胡得以放手去做。

不久,胡的母亲病逝,照例给假治丧营葬,在他守制期间不再过问政事,省中政务全由官文主持。官文手下一些奸利小人,乘机兴风作浪,胡林翼参劾的官员纷纷升居要职,官文府中更加奢侈,钱不够用,竟提用军饷以供挥霍。

胡闻知此事,气愤难平,准备上奏弹劾。正好户部员外郎阎敬铭担任军中总理粮台,得知胡要弹劾官文,便竭力劝阻说:"本朝二百年来,不肯轻易让汉人掌握兵权,现在督抚和统兵大臣满汉并用,已是很大进步。湖北居天下要冲,精兵良将荟萃,朝廷岂肯不以亲信大臣亲临监督?你弹劾掉一个官文,能保证再派来的人比他好吗?如不好,你能再弹劾他吗?如果新来的人独断专行,处处掣肘,岂不更糟?现在官文无成见,又为朝廷所倚重,每有大事,可借他上奏朝廷,得以恩准,即使每年供养他十万金,也是合算的,和这种人共事,求之不得,你为什么还要去掉他呢?"胡听了他的一篇宏论,拍案大喜,仍旧和官文紧密勾结,甚至和他结拜为异姓兄弟。

官文也更加信赖和倚靠胡林翼,凡有军报到,总是说:"告诉胡大人可也。"对胡的所作所为,无不大力支持,齐心合力与太平军为敌。而论功行赏,因总督在巡抚之上,又是满洲贵族,所以官文总是功居首位,并因此晋封为伯爵。



肃 顺 轶 事



一、貌美酿成肃顺生

肃顺(1816—1861 年)是郑亲王乌尔棍布之子。关于他的出生,尚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据说,有一次郑亲王下朝,在途中偶遇一位少女,长得花容月貌,极其娇美,就想买来为妾,立马派心腹赵某跟踪探寻。

赵某寻查到实情后,向郑亲王禀报道,此女是回族人,家境贫寒,仅有父母相伴,但早已许配人家,并且不屑给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为妾。郑亲王一听,大为懊丧,但又不死心,决计要亲自前往那少女家,就是花再多的金钱也非要达到目的不可。心腹赵某怕把事情弄糟了,急忙请郑亲王从长计议,让他慢慢地将此事办妥。郑亲王急不可待,只同意给心腹赵某三个月的期限,一定要把那位少女弄到手。

于是,赵某伪装成被革职的人,在那位少女家旁边租屋居住,并利用邻居的关系,主动去结交那少女的父亲,无论她家有什么危困之事,都给予慷慨资助,相互的感情日趋融洽,此女的父母十分感激赵某。可是,赵某仍然没有办法把该女弄进王府,而三个月的期限却日益迫近了。

正巧,郑亲王这时被皇上任命为步军统领,上任三日,就有人将抓获的几个盗贼押解到衙门中来候审。赵某一听,不禁大喜,不由得计上



心来。他与郑亲王密商后,买通盗贼,叫他们诬陷那少女的父亲是窝主,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将那少女的父亲与几个盗贼一起斩首示众。赵某则假惺惺地去安抚其母女,又为其父厚葬,深得母女的好感。同时,却又指使人手持伪造的其父的借据,登门追索。赵某又假充好人,倾囊为其家清偿所有的"债务",这么一来,该母女二人的感激之情,更是刻骨铭心。紧接着,赵某又暗中指使地痞流氓不时登门调戏该女,又阴险地派人四处散布该女不贞洁的谣言,特意闹得其未婚夫家及四邻都知道,终于迫使其未婚夫家前来退婚。

该母女刚刚祸从天降,现在更是走投无路、无法可想之际,只有去找赵某商量。赵某不动声色地说:"不如送你女儿去王府,不但你母女有了安身之所,而且可以享受荣华富贵,没有什么办法比这更好的了。"母女二人只得同意了。赵某马上找人来给该女认真打扮了一番,送到了王府中。郑亲王如愿以偿,不禁大喜,重重地赏赐了赵某。次年,该女即生了肃顺。

但是,过了不久,郑亲王患颈疽病而死,为使头颅与躯体不分离,装殓时特地请来刽子手为其缝合颈项,因为京城里只有刽子手擅长此技。巧合的是其心腹赵某,后来也是患颈疽病而亡。当时,知内情的人都说,这是老天爷的报应。

二、才高招致肃顺亡

肃顺不仅出世颇具传奇色彩,而且在他长大以后,又具有一种过人的才识,特别是善于延揽人才。如当年左宗棠入京会试,伏阙上书,痛陈时事,多触忌讳,咸丰帝大怒,拟旨革掉其举人,命顺天府、五城逮捕治罪。圣旨未下,肃顺爱其才,秘密派人转告左宗棠,让其离京逃亡。第二天圣旨下,而左宗棠早已逃跑了。肃顺与左宗棠无一面之交,完全是看重了他的文才武略。后来,左宗棠成为了支撑晚清危局的重要干将之一。

又如曾国藩兵败皖南,退守祁门,朝廷内外弹劾者纷起,廷议时许



多大臣都主张撤职查办。肃顺则一反众议，直言道：“胜败兵家之常，临敌易帅，兵法大忌，不如使之戴罪立功可也。”这样，使曾国藩得以一心从事军务，从容指挥作战，最终打败了太平军。

由于肃顺具有过人的才气和胆识，深得咸丰帝的信任，他也因此盛气凌人，骄恣不检。当英法联军侵入北京之即，他随咸丰帝逃到热河行宫后。在热河，他常戏坐在皇帝宝位上，并问随侍人员：“像不像呀?!”那拉氏见了，非常忌恨他。

咸丰帝在热河行宫驾崩后，其 6 岁的儿子载淳继位，年幼无知。载淳之母那拉氏虽被尊为西太后，但出身、名位皆卑下。肃顺是咸丰帝临终时委任扶佐幼帝的八位顾命大臣之一，虽然早有提防那拉氏之心，却又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

后来，权力欲极强的西太后玩弄手腕，首先讨得东太后的信任，然后联络恭亲王奕䜣等重臣，在外国侵略势力认可下，在北京发动了“辛酉政变”，夺取了清王朝大权。西太后首先就是要处死顾命八大臣的主心骨肃顺。

按照清朝祖制，凡宗室之人有罪，皆于宗人府赐自尽，不刑于市。而西太后对足智多谋、才识过人的肃顺恨之入骨，不遵祖制，定要斩首示众。



对内重用汉人、对外强硬是考察肃顺政治性格的两个基点。本书以此出发，揭示了这位乱世危局中的权臣在咸丰年间的所作所为及其命运



咸丰帝像







慈禧像　　恭亲王奕䜣像

临刑时,肃顺大骂那拉氏,刽子手急忙用刀筑其口,齿舌皆被割裂,鲜血直流,肃顺乃喷血大骂,直至被处死。



“人参状元”翁同龢

清朝咸丰六年(1856 年)三月,以文笔盛名满天下的翁同龢、孙毓汶经过会试,都考中了贡士。按照清朝科举制度的规定,在会试后一个月将举行殿试,由皇帝对会试取录的贡士在朝廷上亲自进行策问考试,称为对策,即是廷试。录取者分三甲(即三等),通通赐为进士。但是,一甲仅限三名,第一名称状元,二、三名分别称为榜眼、探花。



翁同龢像

翁同龢与孙毓汶两人都是才华横溢、文笔超人的佼佼者。当时,一般人都认为本科状元非翁即孙。因此,翁、孙两人也都竞相暗自用功,精心策划,力争在廷试中压倒对方。

廷试的日子一天一天临近了。由于翁、孙两家是世交,在殿试前夕,孙家特邀翁同龢到府中住宿,以便第二天一起去参加廷试。在孙家盛情邀请下,碍于世交情面,翁同龢同意了。

晚饭后,孙毓汶的父亲以长辈的身份,与翁同龢畅谈至深夜,才让他回屋去休息。翁回到屋内正欲上床休息,不料在其住所四周突然大放爆竹,震耳欲聋的响声,一直持续到天亮,翁同龢根本无法合眼休息。

第 二天,翁同龢进入考场时,感到全身无力,困倦得打不起精神。



孙毓汶常用印鉴



翁同龢书法作品

忽然，他想起自己随身带有两根人参，马上放入口中咀嚼起来，顿感津生气爽，元气大振，精神百倍。他伏案奋笔疾书，文章一气呵成，无一败笔。特别是翁同龢的书法自成一体，潇洒脱俗，流利畅达，常为世人所效法。并且自道光朝以来，皇上取录状元，十分重视书法和卷面洁净，不太注重文章内容。因此，状元终究还是落入了翁同龢之手，孙毓汶则被取录为榜眼。因翁同龢以吃人参提神而夺取状元，故人们戏称他为“人参状元”，一时传为佳话。



“神童”张之洞

地处西南边陲的夜郎大地——贵州，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曾孕育了众多的优秀中华儿女，张之洞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之洞祖籍为直隶（今河北）南皮，其父张瑛中举后，被派到贵州任地方官。1837 年张之洞出生于贵州首府——贵阳城内六洞桥寓所，其父因此为之取名为之洞。



张之洞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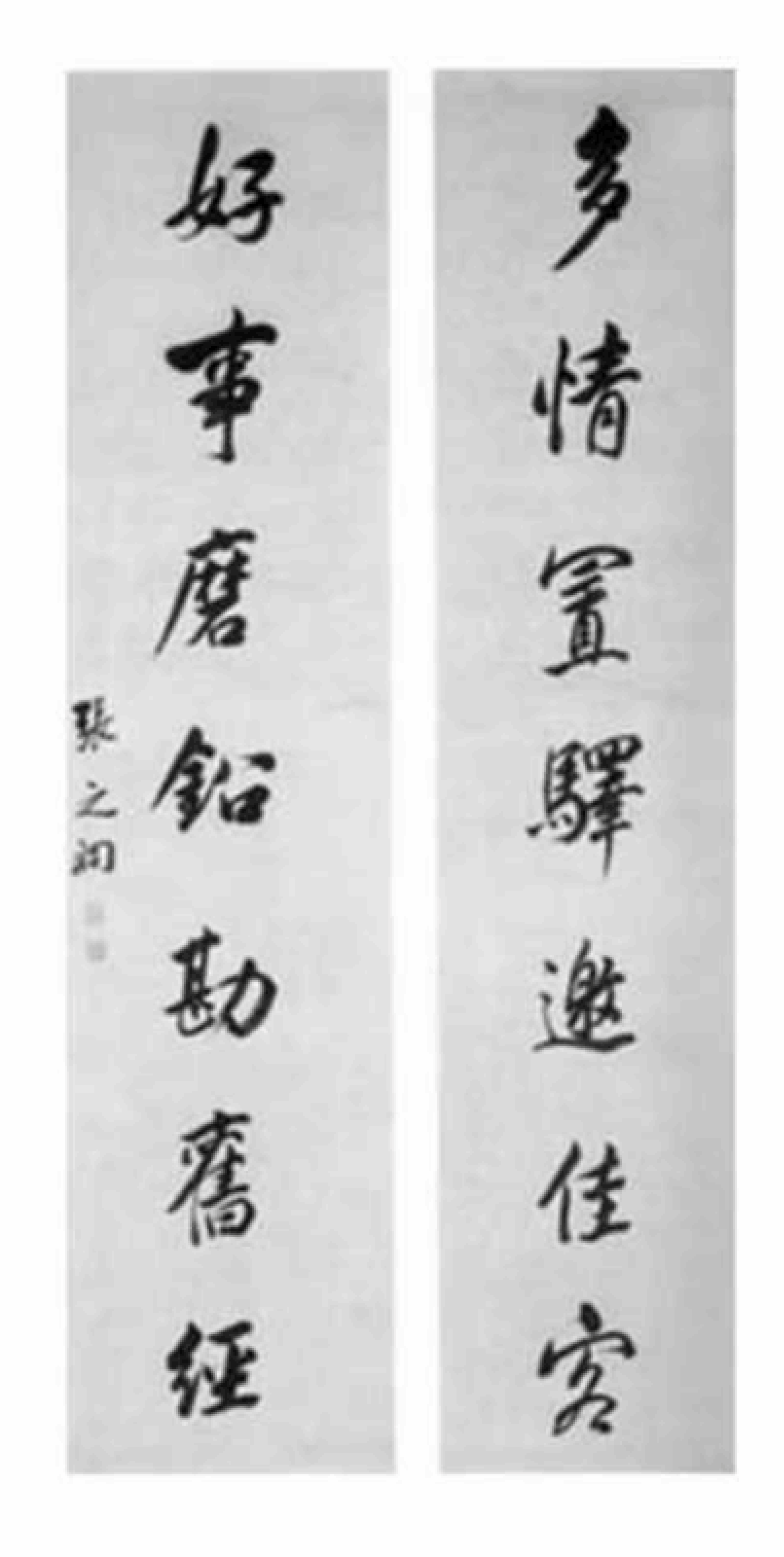
张之洞身材瘦小，为人精灵。童年启蒙读书，聪慧过人。不满 10 岁，已能吟词作诗，出口成章。13 岁时，为贵州兴义府名胜“抬堤”撰写了碑记，文采飞扬，令人赞不绝口。1852 年 16 岁时，他参加咸丰壬子科顺天乡试，一举中了解元（乡试第一名），声名大震，被世人称誉为文笔超凡的“司马相如”。

贵州的同龄人料想不到貌不惊人的张之洞，竟有如此博大的学问，猜想他一定是有神灵附身。尤其是他的长相，使人越看越似猴，甚至于连他的起居饮食等习惯，也被人们加以附会，戏称为是猴精转世。此话一传开，后来，居然连官场中也有人认定张之洞前身一定是猴。这里除



了具有嫉贤妒能的意思之外，也含有几分为自己的无能开脱的用心。

不久，张之洞参加会试。按清朝科举制度，会试总裁要聘请同考官若干名，分阅试卷，然后向主考官推荐，最后由主考官决定取录名单。当时，张之洞的考卷是由同考官范鸣和审阅的。他看过张之洞的考卷以后，大为赞赏，马上列入推荐者的试卷中。但是，揭榜后，张之洞的名字却被从录取者中剔除了，范再三力争，最终还是被摈弃不录，气得范鸣和大骂主考官瞎了眼。



张之洞七言行书对联

两年后，张之洞再次参加会试，范鸣和又是同考官，张卷又落入范之手，这次终于中了进士。

殿试时，按规定应在早晨 8 时左右进场，下午 6 时左右出场。并且规定殿试时写大卷每行必须写到底，只有写到“皇上”、“圣明”等字样时才可提行。当时，朝廷对策主要不是考文章，实际上是考填文章的笔法。但是，张之洞独不肯受这些限制，不等一行写满，随文思抬头另写，这种写法，称为“实对”，按理是犯规的。而且，张之洞一卷在手，奋笔疾书，笔随思迁，毫无驻笔，一直写到天渐黑尚未完卷，按规定应该抓卷了，但十位阅卷大臣都倾慕这个享有“司马相如”名气的才子，有心收为得意门生，特地为他吹燃了抽水烟袋用的“纸捻子”照亮，让他乘着火光一气写完。最后，金殿传胪，张之洞高列一甲第三名，点了探花。



“李鸿章大杂烩”

1896年5月，清廷按照沙俄政府的意愿，派遣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事后，李鸿章一行又前往英、法、德、美等国联络邦交，在列国周游。

8月，他们在美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因此，李鸿章决定在纽约举办中式宴席来款待和答谢美国各界人士，并派人到华人聚居的唐人街酒食店置办。

举行宴会的那一天，美国各界人士云集唐人街，这引起了好奇心极强的美国公众的注目。过去，美国人是很少去唐人街的，更难得在那儿就餐。唐人街的酒食店主要是为旅居美国的华人服务的，使他们在异国他乡也能品尝到中国的饮食，以此寄托一份思乡之情。

宴会上，色香味俱全、造型独特的中式菜点一道又一道地端了上来，洋人们看得目瞪口呆，吃起来更觉得别有风味，一连吃了几个小时都不肯下席。这可愁坏了在一旁的总管，急忙凑近李鸿章的耳边问道：“中堂大人，菜都吃完了，怎么办？”李鸿章不动声色地略一思索，马上说道：“把已撤下去的残菜加热，用大盆端上来。”一会儿，一大盆热气腾腾的残汤剩菜大杂烩端了上来，洋人们又争先恐后地品尝起来，并连声赞道：“OK！ OK！”其中有一位洋人还问李鸿章：“中国菜为什么总把最好吃的放在后面？这道菜叫什么？”李鸿章被弄得哭笑不得，一时答





1896年,李鸿章出访美国时,《纽约世报》(*New York World*)刊登的李鸿章到访的情景

不上来,便顺口说:"好吃多吃! 好吃多吃!"结果歪打正着,"好吃多吃"与英语的"杂烩"(hotch-potch)发音正好相近。此后,许多洋人慕名而来唐人街品尝中式餐点,每餐必点李鸿章宴请时用的"名菜"——大杂烩。唐人街酒食店的老板们,也趁机将错就错,用各种上等好材料组合精制而成"李鸿章大杂烩"。今天,这道菜仍然是中国各大酒店菜单上赫然有名的珍贵菜肴。

中国食品原本就讲究味美、色鲜、益身,偶然间被李鸿章的名气渲染得众所周知,吸引了许多西洋人到唐人街一饱口福,掀起一阵"李鸿章大杂烩"旋风,一时间使唐人街的饮食业日趋兴旺发达,每年有数百万美元的收入,确实令人惊叹!


1896 年 8 月 28 日李鸿章访美抵达纽约


1896 年，李鸿章在美国的留影

这样，仅纽约一地，杂烩馆先后达三四百家，而且还蔓延到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匹兹堡等地，成了旅居美国华人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

后来，所有旅美华人酒食店莫不大书“李鸿章大杂烩”、“李鸿章面”、“李鸿章饭”等食单，以招揽崇拜名人和充满好奇心的西洋人光顾。李鸿章的大名竟成了众多旅美华人的衣食。

当然，有许多所谓的“李鸿章大杂烩”，徒有其名而无其实，烹饪技术十分低劣，原料也面目全非，华人们根本就不屑一顾，而西洋人却还以为“李鸿章大杂烩”就是这么个味，品尝者反而络绎不绝，这无非是为了满足一下强烈的好奇心而已。

李鸿章还喜欢吃烧羊肉，通过此次访问，他的这一爱好得到宣扬，美国首都华盛顿还为此开设了一个烧羊肉街呢！这恐怕是李鸿章外交史上的唯一“胜利”和“辉煌成果”吧！

盛宣怀的"宣腿"



盛宣怀像

盛宣怀(1844—1916年),字杏荪,又字幼勖,号愚斋、止叟,江苏武进人。他从小聪明乖巧,记忆力很强,能言善辩。虽然年轻时即考中秀才,却不喜欢寂寞寒窗、苦读经书、从事八股,不求科举功名。他爱好新奇,追求西方的"奇技淫巧",又善拍马钻营,26岁入李鸿章幕府,颇得信任,很快就成了李鸿章办洋务的最得力干将。他先后经办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华盛纺织总厂、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通商银行等新式企事业,并任其总办、督办、董事长等要职。同时官运亨通,节节高升,从兵备道、海关道、会办商务大臣,直至邮传部尚书,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成为红极一时的洋务人物。

盛宣怀以搞洋务而家资巨万,富甲一方,生活奢华,尝遍山珍海味,尤其爱吃火腿。火腿乃中国名产,最出名的首推浙江金华火腿,与之相伯仲的便是云南的宣威火腿,也是遐迩闻名。盛宣怀长驻上海,浙江为近邻,常吃金华火腿不足为奇,宣威火腿远在边陲,交通不便,反觉名贵。有人拍他的马屁,知他爱吃火腿,便特意托人从云南买来两条宣威火腿,敬献给盛宣怀,礼帖上写着:"奉上宣腿一双,请笑纳。"盛宣怀一





盛宣怀所著《愚斋存稿》



盛宣怀的部分书信



美国著名学者费维恺肯定了盛宣怀对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作用



盛宣怀被人称为“中国商父”，可以看出其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独特地位

看礼帖，触动忌讳，很不高兴，心想：“我盛宣怀的双腿，何劳你奉上？”当即摆手命听差拿下去。可是第二天，他又想起了那双“宣腿”，很想尝一尝，便问听差：“我的腿呢？”听差忐忑不安地回道：“大人的两条腿，我想到您好像不喜欢，已让下人们吃掉了。”盛宣怀虽不高兴，也只好作罢。

因盛宣怀拍上压下，待人刻薄寡恩，得罪了不少人，人们恨他而找



盛宣怀住宅,建于1900年,系具有欧洲古典风格的花园别墅,现为上海淮海中路1517号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官邸

不到报复的机会,听说他的“宣腿”被下人吃掉的事,便想捉弄他以泄愤。有人就送了一份礼去,礼单上也写着“奉上宣腿一双,请笑纳”。盛宣怀打开礼盒一看,竟见那两条“火腿”又黑又小,根本不像宣威火腿,又弄不明白是什么东西,便叫来专管膳食的饭司务来看,饭司务一看就明白了,回道:“大人,您的两条腿是狗腿。”这是讽刺他当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等人的狗腿子,差点没把盛宣怀气晕过去,他暴跳如雷,但送礼的人不具名,无法弄清是谁的恶作剧,也无可奈何。



潘祖荫愿作“乌龟忘八旦”



潘祖荫像

潘祖荫，江苏吴县人，字伯寅，咸丰年间中进士。在京为官多年，累迁至工部尚书、军机大臣。他十分守时，痛恨当时官场不守时间的恶习。每次请客吃饭，若客人能准时到达，他便热情招待，酒宴尽欢而散；若客人不准时到，哪怕是稍微超过约定时间，他便只以茶水招待，并与之长谈。坐的时间长了，客人饿了，他则只给客人一碗面吃，绝不设酒席。客人责备他慢待自己，明明说是宴请，为何只给吃一碗面，潘拒不接受意见，反驳说：“是你自己不守时，我过时不候，有何罪过？”从此凡他请客赴宴，客人没有敢迟到的。

他为人诙谐，有一次任会试总裁，阅卷官推荐可以录取的试卷，他复阅时对其中一卷写评语曰“欠沙石”，而不予录取。该考生辗转托人询问“欠沙石”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文章日光玉洁，考试时间有限，匆促间未必能有如此琢磨工夫，或许是别人代枪，故不予录取。”又在另一份卷子上批写一“矮”字，考官们看了都愕然，不知所云，便问他是什么意思，他笑着说：“矮者，谓其不高也。”原来如此。





赛金花与洪钧

出使俄、德、奥、荷四国的大使洪钧，回京后任兵部左侍郎。光绪十九年（1893 年），洪钧病逝，其爱妾赛金花去上海开妓院，并与孙作舟同居。当时人们认为她背叛了洪钧，有人将此事告诉潘祖荫，并为洪钧叹惜不已。潘笑着说："你怎么这样不识时务？人死了，什么也看不见，听不着，还有什么身后的荣辱？这就是俗话所谓'死乌龟'，比生前当乌龟强多了。"

接着他对乌龟大发议论："古人很多以龟字命名，龟是四灵之一，所谓四灵就是麟、凤、龟、龙，龙还排在龟的后面。可是世人对麒麟、凤凰和龙极尽颂扬赞美之辞，为何独不赞美乌龟呢？我最近新建一座书斋，应当给它取名'龟厂'，并将著文阐述其意义。"



乱世名妓赛金花

不久书斋建成，为庆祝书斋落成，潘大宴宾客，并拿出他所撰的《释龟》文传观。从此他自署"龟厂老人"，在酒宴中又以龟字行酒令。他笑着风趣地说："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宴会的书斋叫龟厂，龟厂者，龟居之，龟出入之，非我龟族类，屏之，远之。今日出入此斋者是谁呢？我是把诸公当同类看待，如诸公以为然，那么此龟厂可任意出



入。龟的寿命可达千岁，而人生只有百年，就这一点说，可知人不如龟。”他的宏论不俗，颇有独到见解。

光绪五年（1879 年），潘祖荫任刑部尚书时，有一天，他属下的官员送来一份稿件，潘看了不够满意，命令该司员重新草拟，该司员不服，不肯重写。潘大怒，把稿子扔在地上，这名司员也不示弱，指着地上的稿子骂道：“谁要拾起这份稿子，谁就是忘八旦。”愤然转身扬长而去。潘只好叫仆人把稿子拾起来，可是刚才司员已说了谁拾起来，谁就是忘八旦，所以谁都不愿意去拾。潘便自己去拾，同时笑着说：“我做忘八旦何如？”下班后，他还亲自到该司员家中慰问，检讨刚才自己的态度过于粗暴。在那个时代，能这样对待下属、严于律己的长官实属罕见。



《潘祖荫日记》记录时事，亦有抒怀，可看出潘的坦率、重贤等性情



潘祖荫故居



郭嵩焘的出使遭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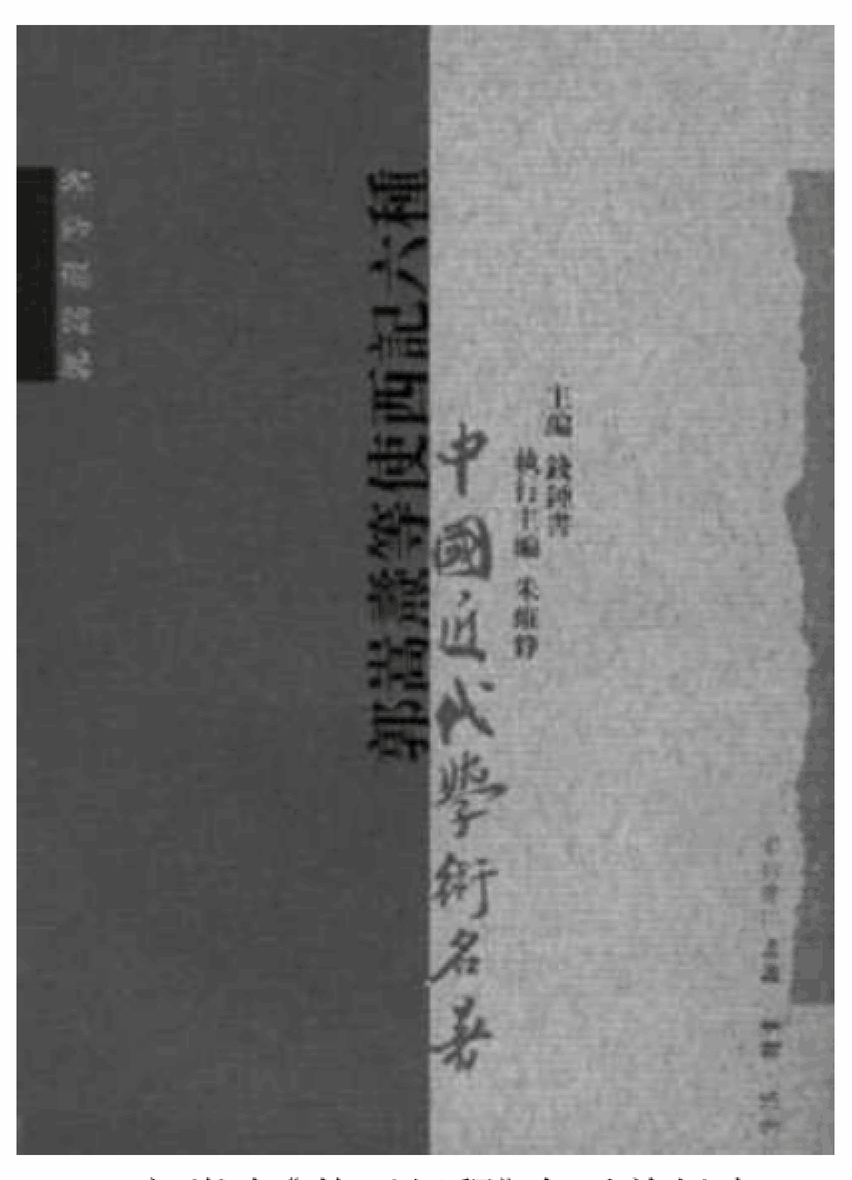

郭嵩焘像

1876 年，清廷向外国正式派遣了第一位公使，即常驻英国公使——郭嵩焘，开创了近代中国向海外派遣正式外交官的先例。

然而中国的第一位驻外公使，最初却是负着不光彩的使命走出国门的。1875 年，英国驻北京使馆翻译官马嘉理擅自潜往云南为英国探路队服务，在腾越地区与当地人发生冲突被杀死。事件发生后，英国以武力相威胁，迫使清廷签订了屈辱的《烟台条约》，其中规定了开放港口、扩大其他政治经济权利外，还有清廷派人亲赴英国赔礼道歉的条款。郭嵩焘就是作为道歉的使臣而迈出国门的。

郭嵩焘出使英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当时，中国思想界里的“夷夏之辨”的观念城池仍固若金汤。他们认为，遣使驻外，是“徒损国体”，“我之使彼，形同寄生，情类质子，供其驱策，随其嚬笑，徒重辱国而已”。所以，当朝廷宣布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之后，人们都认为这是

一个极为耻辱的差事。然而，郭嵩焘接受了这个任务。他说：“数万里程途避而不任，更有艰巨，谁与任之！”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同僚目之为“汉奸”，同乡“耻与为伍”。还有人编了副对联讽刺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郭嵩焘《使西纪程》今无单行本，此为《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书影



郭嵩焘书法作品

在世俗不容的情况下，郭嵩焘踏上了出使的征程。五十多天过去了，他按照总理衙门的要求，把从上海到伦敦的五十天的日记进行了整理，而后以《使西纪程》的书名寄回了总理衙门。谁知这样一本两万字的小书，竟像一颗炸弹投入死水潭中，激起了轩然大波。原因是，《使西纪程》中有一些封建士大夫们不愿听到的逆耳之言。例如：书中称赞英国人彬彬有礼，并非蛮夷之类；英国在香港所办教育，“规条整齐严肃”，深得中国古人“陶养人才之遗意”；西方技术发达，“七万里一瞬而至”；西洋立国两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书中还认为，中国要研究、学习西方治国之道，“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



年亦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这些都是那些士大夫们既不能容忍更不能接受的。所以，朝野上下，一片讨伐声。《越缦堂日记》记道：“《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翰林院编修何金寿特地奏上一本：“疏劾郭筠仙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在内外压力之下，清廷诏令立即销毁《使西纪程》字版，禁止发行。后来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谈到此事说：郭嵩焘曾作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

事实上，事情并没有结束。在《使西纪程》毁版后，和郭嵩焘一起出使的副使刘锡鸿又立即对郭发起了攻击，指数郭有“三大罪”：

一、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二、见巴西国王，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三、柏金宫殿（今译白金汉宫）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

他还在使馆同仁中扬言：“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接着，他向朝廷“密劾”郭氏犯有十条罪状，除了前面述及的三事外，主要内容还有：①锐意学习洋语，并令少妾效之，四出应酬，败坏闺教；②模仿洋人风俗，集会时索伞、去扇，听唱时捧单、击案，奉客时，改茗饮为糖酪，“不以忘本为耻”；③擅改国家礼制，接见新加坡大酋时，竟改尚左为尚右；④意欲将船上龙旗，改镶黄正黄为五色；⑤怨望朝廷，



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内容多关系政要，时抒郁愤，内含刚强沉着



“谓各国遣使皆仅编修部曹为之，独伊以侍郎充当，又谓凡劾伊者皆立见升擢，言之切齿深恨”。

郭嵩焘曾上疏为自己辩解，请求查处刘锡鸿、何金寿勾通构陷情形。但上谕反而责备他“固执任性”，“所见殊属褊狭”，而京师士大夫又继续攻击他，要求将他撤职。在这种情况下，郭嵩焘只好自行引退，奏请因病销差。总署本拟将郭氏查办治罪，因李鸿章力持不可，才算保住面子，宣布由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接任。其时距郭氏到任仅仅一年零七个月。

郭嵩焘离开英国时，“伦敦、巴黎两都人士颇有依依不舍之情，佥称之曰：如斯人者，可不愧国使两字。当其初至也，崇行人之馆，建中国旌旗，不失汉官威仪。请见英王，不亢不卑，进退合度。于一切政事之宜，皆能明察，而愿以大公无我之心，径告本国。苟利时事，知无不言。



历史学家汪荣祖先生的《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一书详述了郭嵩焘的一生，他的人生挫折，实际反映了近代中国发展的挫折



此书记录了郭嵩焘的一生，书中还记述了这位历经晚清咸丰、同治、光绪三代皇帝，数番宦海沉浮，大起大落的名士，远赴英伦西游的诸多故事



中国驻外公使,皆得于是人,何有于忌也!”

然而,在郭嵩焘回归故里时,遇到的却是另一种气氛。抵长沙时,长县、善县竟“以轮船不宜至省河,属书阻之”。“士绅至于直标贱名及督抚之名,指以为勾通洋人,张之通衢”,官员“自巡抚以下,傲不为礼”。

1891年,郭嵩焘在心情落寞的凄凉情况下与世长辞。王先谦等具呈,李鸿章代奏,讲了他为人与治学的许多好话,如“生平廉洁自矢,任运司时裁汰规费;出使三年,开报公款仅薪水、房租两事,其他皆自支销;归后家无馀赀,惟以书院修脯自给;文章学问为后进所宗”,希望朝廷为其立传赐谥,但被清廷断然驳回:“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这体现了统治者对一个思想背叛者的“原则性”,真是时代的悲剧。



戏迷德馨丢官记

德馨是镶红旗满族官僚，官拜江西巡抚，酷好声色，而且极为贪婪，在他的巡抚衙门内除了忌日，没有一天不演戏，堪称一位大戏迷。他的属下有一个新建县县令叫汪以诚，善于溜须拍马，见巡抚喜欢看戏，便把县衙内一切大小事情交给他的同僚代办，专心致志，成天泡在抚署中全力筹办演戏事宜，还派遣人员到全国各地，不惜以重金聘请名伶来江西抚署演戏，并亲自担任提调，挑选剧目，安排演出，以讨好德馨。



天津广东会馆清末戏园



当时江西有一文人曾作一副对联予以讽刺，上联是“以酒为缘，以色为缘，十二时买笑追欢，永夕永朝酣大梦”；下联是“诚心看戏，诚意听戏，四九旦登场夺锦，双麟双凤共消魂”，横额是“汪洋欲海”。所谓“四九旦”、“双麟双凤”都是当时名伶的艺名。这副对联不但形象而深刻地揭露了德馨贪恋酒色、沉迷戏剧、醉生梦死的丑态，而且巧妙地把为他提供演戏服务的马屁精汪以诚的姓名嵌入横批和上下联的首字予以鞭挞，实属不可多得的佳联。

德馨有两位女公子，从小跟随父亲天天看戏，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也成了戏迷，后来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嗜好尤过乃父”。当她们成了妙龄少女，进入青春期时，便极喜欢看演男女奸淫的黄色戏剧，如《翠屏山》、《也是斋》之类，几乎没有一天不看。



《翠屏山·杀山》剧照

光绪十三年（1887 年）选秀女，德馨的两个女儿，一个 18 岁，一个 17 岁，都在应选之列，姐妹俩都长得国色天香，美艳绝伦，所以经过多次反复筛选均能顺利过关。到了次年十月初七日，终于进入了最后确定宫廷主位的时刻。慈禧太后原本内定要选自己的侄女为皇后，选她二人为嫔，但因在关键时刻光绪皇帝想把玉如意递给她们，选其中一个为皇后，触怒了慈禧太后，致使她俩双双落选，眼看就要到手的嫔位失之交臂，德馨也差一点当上国丈。也幸好她们未被选上嫔位，否则如此品德低下的宫眷和昏庸的皇亲，只能对江河日下的晚清政局带来危害。后来德馨的一个宝贝女儿嫁给了内务府大臣奎俊的儿子、内务府郎中铜林为妻，铜林身体弱

小，终年不洗脸，德馨之女既成了他的夫人，对他也无可奈何。

德馨虽是封疆大吏，却不可能一手遮天，他的劣迹在甲午战争的硝烟中终于暴露出来。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七月，他被御史高燮曾参奏，清廷派湖广总督张之洞确查后，降旨予以革职。上谕说：“江西巡抚德馨贪婪荒纵……兹据查明，所赏拔任用多系贪猾奸诈之人，平日收受属员馈送，纵容门下近侍婪索，且于筹办防务之际，兼旬演戏，一味酣嬉，实属辜恩溺职，著即革职。”汪以诚也跟着丢了乌纱帽。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



张佩纶西席变东床

李鸿章先是聘张佩纶作家庭教师,后又招他为女婿。张佩纶便由西席而变为东床,这是一段曲折而鲜为人知的奇缘。

张佩纶字幼樵,直隶(今河北省)丰润人。同治九年(1870 年)考中举人,次年中进士,时年才 23 岁,被誉为才子。此后任职翰林院,由庶吉士升任侍讲。光绪五年至七年(1879—1881 年),母丧在籍守制三年,在此期间曾入李鸿章幕府,参赞军机。期满回翰林院,不久升任詹事府少詹事,次年又升任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因他勇于抨击时弊,弹劾官员,敢于进谏慈禧太后,以清流议政,名声大噪,成为清流派中坚,被誉为清末四大谏臣之一。



著名作家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

光绪十年(1884 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佩纶受命会办福建海疆事务。他执行李鸿章主和派的妥



协退让政策，大敌当前不备战，听任法国军舰和福建水师舰同泊马尾港内达一月之久，并且严令水师“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更可笑的是，当张收到法舰开战的宣战书后，他竟在战船上高悬免战牌，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免战争，致使在敌舰突然全面进攻下，被动挨打，一败涂地，全军覆没，他自己亦赤足逃往鼓山彭田乡。马尾战败，张佩纶难辞其咎，受到朝野强烈抨击，一致要求予以严惩，朝廷将他革职充军。但他不服，认为不应由他一人独当罪名，他只是执行上级指示而已。张佩纶拟将李鸿章阻止他备战、等候议和的历次文电公之于世。李闻知，急忙答应日后一定为他开脱，请他保持沉默，勿露真相。

光绪十四年(1888 年)，张佩纶充军期满返京，以四品京卿见用。他再次应邀入李鸿章幕府，颇受李的器重，几乎言听计从。有一天，李生病，张到他的卧室探病，看见一位倩丽无比的少女在侧侍奉。她乃李唯一的千金，才华出众，李视为掌上明珠，李便介绍说:“这是小女，粗略懂得吟咏诗词，老夫很爱她。”并命女儿拜见张佩纶，女儿施礼毕退出。

李鸿章从枕边拿出一本诗稿说:“这是小女的手笔，雕虫小技，贻笑大方，请你多给指教。”张翻开诗稿，见其中有一首《马江感事》七律，诗云:

鸡笼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
一战岂容轻大计，四边从此失天关。
焚车我自宽房琯，乘障谁教使狄山。
宵旰甘泉犹望捷，群公何以慰龙颜。

张看到这里深受感动，乃至眼泪涔涔流下来。李惊问他为什么哭，张说:“女公子这首诗，堪称晚生平生知己，没齿难忘，故感动得流下眼泪。”李也无限感慨，又见张佩纶很有才学，便聘他为西席，执教女公子。

女公子聪慧过人，诗文俱佳，师生相处极好，时相唱和。有一天，李



到书斋,张很高兴地夸奖说:"女公子学识大有长进,不愧是没考功名的进士。"李听了当然很欣慰,笑容满面,心花怒放,却假装谦虚说:"老师夸奖弟子过分了,小女怎敢当!"从此对张更加器重。

有一次,李鸿章在和张佩纶的闲谈中说:"小女资质不错,可惜在婚姻大事上高不成低不就,蹉跎至今,仍待字闺中,请你留心代为物色如何?"张当时已过不惑之年,原配妻子是闽浙总督边宝泉的千金,夫妻感情很好,不料在他流放期间,郁郁寡欢,因病去世。他已鳏居数年,急于续弦,对李之千金早有爱慕之意,只因李的门第太高,且年龄相差悬殊,不敢唐突启齿,便问李择婿条件,李坦言:"能如君之文章、才学足矣。"听了李之言,张认为此乃天赐良机,赶紧跪下,鼓足勇气,毛遂自荐,口称"岳父大人",表明求偶之意。李愣了一下,因张比爱女大约20岁,又是二婚,不免有所踌躇,但最后他还是答应了这门亲事,叫张佩纶速请媒人来提亲。张的同事、好友于晦若自告奋勇充当月老,张剃掉胡须,行聘纳采,不久便拜堂成亲,伉俪感情甚笃,吟咏唱和为乐。

张佩纶自从成了李鸿章的乘龙快婿,地位随之发生变化,由西席变为东床。此事引起不少议论,有人写一副对联加以嘲讽。联曰:

老女配幼樵,无分老幼;
东床即西席,不是东西。

另一说,联曰:

养老女,嫁幼樵,李鸿章无分老幼;
辞西席,就东床,张佩纶不是东西。



李鸿章夫人赵小莲和女儿鞠藕



二联意思一样，只是后者把当事人的姓名全点出来，更为露骨。那时的风俗是早婚，女子过了 20 岁尚未嫁人就算“老女”了。幼樵是张佩纶的字，恰巧“老”与“幼”相对，“东”与“西”相对。旧时称家庭教师为“西席”，称女婿为“东床”。这副对联的讽刺未免过于刻薄。

李鸿章有私产 4 000 万两白银，张佩纶以女婿的名分，得沾其光，坐享其成，住在南京安享晚年。1903 年去世后，有人撰联曰：

三品功名丢马尾；
一生艳福仗蛾眉。

此联讽刺张佩纶因中法战争中马尾一役战败丢掉三品官，后来却倚仗娶了李鸿章的千金，而后半生得享艳福。还有一联曰：

中堂爱婿张丰润；
外国忠臣李合肥。



李鸿章是大学士，时人称大学士为“中堂”。张佩纶是直隶丰润人，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旧时对名人常以其籍贯指代名字。此联抨击李鸿章奉行投降卖国的外交路线，丧权辱国，是中国的汉奸，外国的“忠臣”。

贵州人陈夔龙主持重修北京城

说到北京城,世人无不知晓。讲到贵州,了解的人就不太多了。但是,雄伟的天安门,庄严的正阳门,却是在贵州人陈夔龙主持下和带头捐资修复而重放异彩的。

1900 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肆意杀人放火,各国还特意纵兵抢劫和破坏达三日之久,全城一派狼藉,到处烈焰冲天。

次年,《辛丑条约》签订前后,各国军队才陆续撤出北京城。当时,北京众多的名胜古迹被战火焚毁,幸存的也是一派残破不堪的景象。在东华门一带,"蓬蒿满地,弥望无际";"午门、天安门、太庙、社稷坛等处,为炮弹伤毁,中炮处所,密如蜂窠"。此外,天坛、先农坛、地坛、日坛、月坛及各主要街道上的庙宇等,大半被焚毁。而正阳门(即前门)城楼,早在 1900 年义和团焚毁前门大街大栅栏老德记西药房时,因火势失控就已被延烧。战火已经无情地吞噬了北京古城昔日那迷人的风采。

当八国联军开始撤离北京时,顺天府(今北京地区)府尹陈夔龙应直隶(今河北)商民的吁请,两次上奏朝廷,逃亡到西安的慈禧太后才决定在当年(1901 年)十月偕同光绪帝返回北京都城。

为迎接太后和皇帝返回京都,急需对已是残垣断壁的北京城进行大规模整修,工程量极其浩大。据初步估算,光修复主要街道上的重要





八国联军架设在东交民巷的炮位



八国联军炮轰大清门(今毛主席纪念堂一带)



北京在八国联军的炮火轰击下熊熊燃烧



被八国联军烧毁的东交民巷肃王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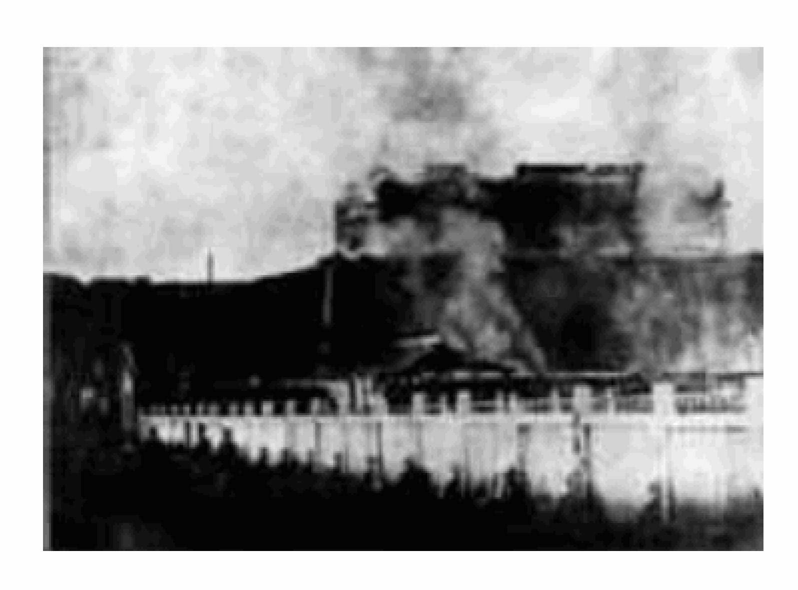


被八国联军炸坏的内城水关(今正义路一带)



被八国联军炸坏的正阳门箭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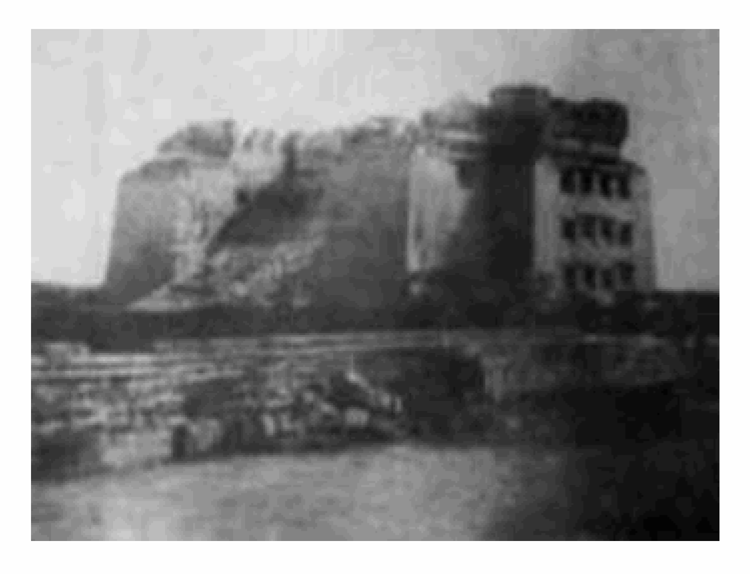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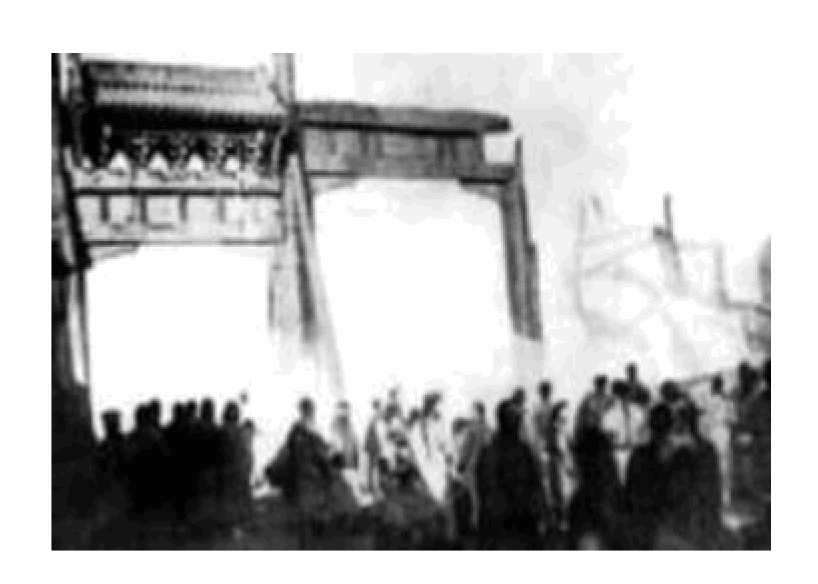
被八国联军炸毁的正阳门城楼正在燃烧



被抢掠一空的翰林院藏书室



被日军炮火炸毁的朝阳门箭楼



崇文门内大街被烧



日军集中几十门大炮,轰击朝阳门,摧毁箭楼,攻入城内,并向东直门、安定门方向,扩大战果。清朝10万守兵溃散



建筑，实需款达百万两之巨，这还不包括重建完全被毁的正阳门城楼的费用。

清朝大臣们本拟定由尚书张百熙、侍郎桂春两人负责承修各项工程，但奏报到慈禧太后那里时，慈禧胸有成竹地笑道："此次工程，须由在京大员中拣派。情形熟悉，较为得力，我意中已有两人：一兵部侍郎景沣；一顺天府尹陈夔龙。不如一并派充四人合办。"由于桂春、张百熙因故不能马上参加筹办修建工作，所以实际上由陈夔龙和景沣主持各项工程。他们马上召集各方工匠，派人四处精心选购所需的材料，迅速展开了各项工程的整修和重建。



张百熙像

陈夔龙（1855—1948 年），字筱石，别号庸庵居士，贵州省贵阳市人，19 岁中举，30 岁取进士，44 岁擢升顺天府尹，慈禧太后出逃后，命他与昆冈等八人同为留京办事大臣，随时商办一切事宜。他奉西太后修复北京城之命后，一丝不苟地工作，亲临各处施工现场视察，对天安门等众多的北京著名古建筑的修复和重建作出了较大贡献。

当时，面对清廷下拨的用以修复北京城的巨额钱款，景沣就同陈夔龙商量，要按照清朝官场中的腐败之潜规则，凡各项工程在估定价目以后，各主管人员照例从中剋取二成。在各项工程施工完成后，该项开支所节余的经费，照例私分。景沣想从工程费中大捞一笔，以满足其贪欲。

陈夔龙马上断然拒绝，认为此次北京城所受到的战祸侵害，已是前所未有的创伤，而市民遭到的伤害就更加深重，生活都十分艰难。因此，重新修复京城的工程，"不得以常例论"。全部工程款项一律核实，工价一律如数发放到工匠手中，主管各项工程的政府官吏员工等，连车马等杂费也一律自备，不准挪用工程费用。张百熙赶来参加主持修建京城的工作后，也表示支持陈夔龙的做法。



这样,陈夔龙等人全身心地投入重建北京城的工作,每天逐一视察各处工地。工匠们也日夜紧张劳作,从各地筹集来的大批材料源源不断地运到北京城,施工进度一天超过一天。重修北京城的浩大工程(除已荡然无存的正阳门城楼外),竟然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就基本竣工了,北京城又重新恢复了昔日雄伟壮丽的英姿。

清廷为了奖励陈夔龙,先调其任河南布政使,尚未启程,马上又擢升为漕运总督(是管理从南方各省由运河向京城输送粮食的显职),同时又令他亲赴河南汤阴县宜沟驿迎接銮驾,在数日之间就被慈禧太后召见三次之多,赏赐优厚。最后,还赏白银 1 000 两。

陈夔龙到江苏淮安任职后,虽身在漕运总督任上,心中仍一直惦念着尚未修复的北京正阳门城楼。他便倡议各省督抚捐资助修,并带头首先捐献白银 1 万两。后来,各省督抚从公款中拨出白银共计三十多万两,终于使正阳门城楼重新巍然屹立在天安门正前方。但在数十名封疆大吏中,仅有陈夔龙一人肯慷慨解私囊。



浙江杭州十五景之一——陈夔龙墓

陈夔龙身居高位,离开贵州多年,却一直怀念着故乡的山水风情。他常感叹道:“乡关万里,欲归不得。”1907 年,他从江苏巡抚任上奉调四川总督(后改任湖广总督),他便请假三个月,终于回到了阔别 26 年的贵州。当他兴奋地登上风景如画的贵阳黔灵山绝顶时,禁不住挥毫写下了重圆故乡旧梦、春风得意的诗句:“石磴重寻旧点苔,荡胸绝顶白云开。”

陈夔龙后来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辛亥革命爆发后,弃官侨居上海。著有《梦蕉亭杂记》、《宣迂阁书画录》、《松寿堂诗钞》等。



清末第一御史江春霖

一、立志当御史

江春霖（1855—1918 年），字仲默，号杏村，晚号梅阳山人，福建莆田人。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江希濂是同治年间举人。他从小刻苦好学，生活俭朴，粗衣恶食，刚正憨厚，言行一致，品德高尚。光绪十七年（1891 年）中举人，三年后中进士，由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历任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及翰林院撰文等职，在翰林院先后整整十年，掌管论撰文史之事。



江春霖工书法，瘦劲有骨气，字如其人

江春霖认为这种写应时文章，编校史书的工作，与国家的兴衰关系不很大，并非他的志愿。他早在年轻当秀才的时候，就已立下大志，要当一名都察院监察御史。曾作《言志对》阐述他的志愿。都察院是国家的监察机关，掌管监察政治得失、官员优劣，以及参加议奏重大政事，会审重大案件等等，是一个很有权威的机构。监察御史号称“言官”，可以随时上奏皇帝，发表政见，弹劾官吏，看起来权力很大，实际上和翰林院撰文一样是一个小小的正五品官，担的工作，是得罪人的差事，若得罪权贵，往往轻者丢掉乌纱





范仲淹的雕像

帽,重者连命都搭上。因此,人们大都不愿意当御史,当上御史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肯得罪人,为什么江春霖却立志要当御史呢?

他在《言志对》一文中充分说明其理由,他决心奉行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国家兴亡,万民安危为己任。他不求高官厚禄,美差肥缺,而追求最大限度地有利于国家和人民。他认为六部九卿只能各管本部门的事,对其他部门和国家全局则无权过问。“独谏官于庶政之得失,万民之休戚,社稷之安危,职官之能否,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皆得形于奏牍。”所以,御史的责任和权力相当于宰相。他说:“宰相知无不为,谏官知无不言,官职虽卑,任同宰相。”他完全清醒地知道“刚直取忌”的后果,决心若当上御史,一定要坚持真理,绝不妥协,“官可去,身可舍,而公论是非,必不可泯”。

光绪三十年(1904 年),朝廷下令考选御史,江春霖认为实现自己平生志愿的机会来了,便积极准备应考,结果考了第一名。从 1906 年起历任江南道、新疆道、辽沈道、河南道和四川道监察御史达 5 年之久。按清朝惯例,凡当御史满两年,即可保送出任知府。知府是从四品官,比御史高一级,由御史出任知府是升官发财的好机会,是御史的出路和御史们追求的目标。江春霖任满两年后,吏部照例准备外调他去任知府,不料他却给吏部递交了《辞免截取知府呈》,坚决要求继续留任御史。

二、尽职尽责为民请命

江春霖自从当上御史,便连连上奏折,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



尽。据现存奏折的不完全统计，共上疏 69 件，其中对施政方针及各种具体改革，提出诸多建议。其荦荦大端者，有清除官制十二弊，理财，变通学制，酌定律例，重订税则去杂费，修改都察院章程，定保举举主赏罚，核定官俸，裁汰冗员，清理田赋等等。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畏权势，铁面无私，不断弹劾各级不法官吏。先后被他指名道姓弹劾的官吏，经不完全统计有庆亲王奕劻及其子农工商部尚书载振，摄政王之弟、郡王衔贝勒载洵、载涛兄弟，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及其子、农工商部右参议袁克定，军机大臣铁良，考察政治大臣、闽浙总督端方，邮传部尚书徐世昌，两广总督周馥，两江总督张人骏，都御史陆宝忠，奉天巡抚出使大臣唐绍仪，江西巡抚冯汝骙，安徽巡抚朱家宝，署黑龙江巡抚段芝贵，学部侍郎严修，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邮传部侍郎沈云沛，大理寺少卿刘若曾，苏松太道瑞澂、蔡乃煌，候补知府何师吕，参将徐文科，统领袁坦、龙济光，管带袁明翼、李淑昌，农工商部左参议祝瀛元及在参议上行走袁思亮、邵福瀛，兵部候补郎中王益孙，莆田县令宁云汉，江苏即用知县李士田，署莆田知县林玉琪，邮传部丞参上行走梁士诒，唐山路矿学堂总办熊崇志，庐陵县清赋局委员赵彝鼎等近 40 人。而对其中的某些人，则先后弹劾达六七次之多，真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好御史。

更可贵的是，他能为平民百姓仗义执言。那时，社会黑暗，各级官吏均以欺压百姓、刻剥人民为能事。江春霖一面揭露贪官污吏，一面替百姓说话，尽力减轻人民负担。他当上御史的第一个奏折就是《奏劾莆田田赋不均请饬量为增减疏》，莆田是他的家乡，他对当地情况较了解，揭露莆田县在征收田赋时，递加数目包给柜书，柜书再递加征收以勒索百姓。绅富有所凭藉，还可以避免苛求，“而穷苦小民独受其害”，每两要交制钱五千余文。“苛征横敛，不可究诘。”他奏请饬下闽浙总督彻究参办，改正贫富负担不均，使“穷民不至重困”。他还附片请重定税则，尽除杂费，税吏有私加征收者以贪赃论处，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朝廷饬闽浙总督查办，但一年余仍未奏报查办结果，而“浮收且更



甚于昔，刻剥情形，深堪痛恨”。于是他再次上奏，请饬限期办理，速将钱粮定价，“出示勒碑，永禁加派”。在他的努力下，莆田田赋除照章每两交纳2元之外，仅加收3角征收费，大大减轻了贫民的负担，故当地百姓对他万分感激，“争歌颂不致”。

江西庐陵县因官府征收粮票加派过多，并在水灾之后、农忙之际，催收旧欠，百姓不堪其扰，扶老携幼进城向官府要求缓征和酌减钱数。官府竟指为“聚众抗粮”，派兵镇压，前后死伤乡民四十余人。江春霖得知实情，又替老百姓说话，上奏朝廷澄清事实真相。他说老百姓只不过“呼号称冤而已，聚众有之，始终并未执械抗官也”。而参将徐文科、防营统领袁坦“欲见好同僚，邀功上宪，捏称匪徒啸聚”，“虐杀无辜”。他怒斥地方官“同官相护，诬良为匪，纵兵杀人，言之深堪痛恨”！请旨饬下江西巡抚查开有关官员职名，交部议处。

三、批龙鳞，捋虎须

江春霖一生只佩服三个人：一是诸葛亮，二是包拯，三是海瑞。崇敬他们刚直不阿，敢斗权奸，不顾身家性命为国为民的高尚气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并以他们为楷模，身体力行。他嫉恶如仇，凡见不平之事即予以揭发，尤其勇斗权贵，不顾及自身的安危，冒死与权贵力争高下。自称：“余自任言官，即已置此身于度外。”



诸葛亮画像



包拯塑像



海瑞画像



他当上御史只半个月,就把矛头直指自己的顶头上司都察院的首长、都御史陆宝忠。揭发他违反禁烟命令,一味吸毒,私自立法钳制言官,多占饭银津贴等,不宜当御史台长。这一炮打响,当即使贪官"闻者耸慑"。

紧接着他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参劾袁世凯和庆亲王奕劻中去。因为他们二人互相勾结,包藏祸心,危及国家。他认为只有打倒这两个人,国家才有救。所以他竭力弹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袁世凯因出卖维新派而获得慈禧太后的宠信,青云直上,不久即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更升任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恩遇之隆,并时无两,又与庆亲王奕劻朋比勾结,树党营私,气焰熏天,炙手可热。"京内外官员巴结唯恐不及,江春霖则看穿袁心术不正,势力越大,对国家的危害也就越大,所以抓住他不放。

日俄为争夺我东北权益,在我东三省开战,俄国战败议和,表面上虽仍保持东三省为中国领土,实际上俄国私自将其所侵占我东三省权益转让给日本。清廷还派庆亲王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和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完全承认日本继承俄国在我东三省的权益,并额外给予日本某些权益。这件事自始至终都是丧权辱国的,而袁世凯反而向清廷大肆请功,"奏保异常劳绩"文职多至一百四十余人,武职一百五十余人,显然是要借此机会培植党羽,扩充势力,而清廷竟朱批"著照所请"。

此事激起江春霖无比愤慨,立即上折参奏,指出"以祖宗开基之域,为两雄角逐之场,土宇名为保全,主权实多丧失,此海内忠义所疾首痛心,而身任封疆者,尤当引为疚责者也"。袁却反以此邀功,所保奏"异常劳绩者"的理由是"主权无缺,疆土复安"。江春霖驳斥道:"疆土获安,由于日俄之议和,非由于在事之出力,其不得攘以为功也,无庸多辩矣。至云主权无缺,则东省自俄日和后,干预之多端,交涉之棘手,什倍于曩时,谓为无缺得乎?""以按兵不动,散失主权为异常功绩",若将此事"登之报纸,传之外国,其贻笑非浅也"。若照准袁世凯之无理要



求,将使二魁柄下移,大权旁落。

清廷对江的奏折留中不发,次年反而升任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要职,故江又上《劾军机大臣袁世凯权势太重疏》,列举他"交通亲贵"、"把持台谏"、"引进私属"、"纠结疆臣"、"遥执兵柄"、"阴收士心"、"归过圣朝"、"潜市外国"、"僭滥军赏"、"破坏选法"、"骤贵骄子"、"远庇同崇"等十二项罪状,证明其权势太重,预言其后果不堪设想。他说:"自古权奸窃弄,始未尝不以忠顺结主知,洎自威名日盛……跋扈遂至不臣。"因此,权臣"大者贻忧君国,小者祸及身家",必须予以裁抑。江春霖的这些预言,后来果然应验,袁世凯果然最终走上祸国败家的道路。

宣统帝继位后,其父载沣为摄政王,见袁世凯势力太大,威胁到他们的统治,令其开缺回原籍。学部侍郎严修上折请清廷收回成命,"而其党徒又造为排袁即排汉,袁去拳匪将再起等谣,煽惑中外",为起用袁世凯造舆论。江春霖又上折拆穿他们的阴谋,指出袁虽下野,但各部和各省长官还有很多是他的党羽,应该重用勋旧大臣,把持重要位置,取代和抑制袁的势力,以防死灰复燃。

奏折递上后,未被采纳,历经三个月,不但未革除袁的党羽一人,甚至还增加委任。故江春霖又上《请罢黜袁世凯党羽疏》,指出"巨奸虽去,邪党尚多",对奸党绝不能姑息,应当机立断,罢斥其主要党羽。

事隔不到半年,京都谣言又起,说什么"二国交涉,非袁世凯断不能了"。江春霖又上《请防奸党藉外交束手挟制起用袁世凯片》,提请朝廷不要上奸党的当,绝不能起用袁世凯。

江春霖先后弹劾袁世凯的奏折共六件,其中三件是袁被免职后,为清除他的党羽,防止袁东山再起而上,颇有痛打落水狗精神,可惜未被清廷所采纳。

最令人敬佩和赞颂的还是他敢于一再弹劾庆亲王奕劻。奕劻是清末元老重臣,其权势居百官之首,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连摄政王都要让他三分,权倾朝野,煊赫一时。但他为人贪鄙昏庸,结党揽



权，正直之士敢怒不敢言。御史赵启霖即因弹劾他而被免职。

江春霖明知势单力孤，要搬倒他极不容易，要冒丢官甚至杀身的危险。但他为了国家的利益，决心要尽一名谏官的神圣职责，义无反顾地坚持批龙鳞，捋虎须，与权奸抗争到底。



奕劻像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春，奕劻之子载振，与天津色艺俱佳的著名歌妓杨翠喜打得火热。直隶候补道、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段芝贵，出重金为杨翠喜赎身，把她进献给载振，从而连升三级，以候补道加布政使衔署理黑龙江巡抚。此事立即引起朝野哗然，御史赵启霖专折奏参，暴露了载振的丑闻，牵连庆亲王，轰动京师，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影响很大。清廷不得不派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鼎查办，吓得载振慌忙把杨翠喜偷偷送出京城，由王益孙顶领，并贿赂胁迫各报更正报导，以掩人耳目。载沣等为保庆亲王名誉，极力为载振洗刷罪名，反坐赵启霖言事不实之罪，予以革职处分。



奕劻之子载振

江春霖对此愤愤不平，连上二奏折。第一折《劾庆亲王父子疏》，指责他们迫使报馆更改杨翠喜的报导，请饬查报纸前后报导不符的原因。第二折《奏劾王大臣查案疑窦疏》，指出王大臣查证的结论说杨翠喜是二月间被王益孙以3 500元买去当使女，此说不合常理。他列举了六点疑问，怀疑王大臣查案不实。对江的两件奏折清廷置之不理，而载振却不得不被迫辞去农工商部尚书之职。

次年宣统帝继位，加恩庆亲王“世袭罔替”，其党羽弹冠相庆。京内外人士虽“啧有烦言”，却无人敢出面反对。江春霖认为责无旁贷，上折坦言给庆亲王世袭罔替加恩过优，指出“小人甘言谀色，每觉易



亲，君子严气正性，或多难近”。不可因此远君子而近小人，应“严防事权旁落”。

宣统二年（1910年）春，江春霖再一次向庆亲王发射重型炮弹，上《劾庆亲王老奸窃位多引匪人疏》，指责奕劻独揽大权，凡他的党羽被参，他就极力为其开脱，凡有空缺，他就引荐其党羽填补。除了袁世凯之外，主要有江苏巡抚宝棻、陕西巡抚恩寿、山东巡抚孙宝琦，此三人都是他的亲家，山西布政使志森是他的侄女婿，浙江盐运使衡山是他府邸的旧人，直隶总督陈夔龙是他的干女婿，安徽巡抚朱家宝之子朱纶是他儿子载振的干儿子，邮传部尚书徐世昌是袁世凯推荐的，两江总督张人骏、江西巡抚冯汝骙是袁世凯的亲戚，此三人都因袁而依附奕劻。此外，“阴相结纳者尚不在此数”。若再听任奕劻引荐私人，大局不堪设想。

江春霖所奏事实确凿，不料忠言逆耳，上谕反斥责江“牵涉琐事，罗织多人，朝廷早鉴其诬妄”，“实属莠言乱政，有妨大局”，“似此信口雌黄，意在沽名，实不堪言官之职。江春霖著回原衙门行走，以示薄惩”。所扣政治帽子大得吓人，据此“罪名”，都可以治死罪了，江能回原衙门行走算是捡了一条命。

此上谕一公布，引起御史全台的巨大震动，御史胡思敬、赵炳麟，给事中陈田分别上奏，请收回成命，令江春霖留任效用。同时全台御史和给事中五十多人联名上奏，吁请收回成命。朝廷却一意孤行，断然拒绝他们的奏请。

免去御史之职，对江春霖是一次致命的打击，使他清醒地认识到清廷不顾事实，不纳忠言，徇私枉法，颠倒黑白，一味袒护皇亲权奸，政治腐败，气数已尽。他回原衙门翰林院已完全不可能有所作为。于是江春霖奏请辞官还乡，奉养老母。清廷也巴不得他离开京城，便批准了他辞职，从此结束了江春霖的宦海生涯。次年武昌起义后，清廷想利用他的声望，起用他为宣慰使，接着福建都督府要聘他为顾问官，袁世凯当总统后又请他出山，他都一一坚决拒绝。



四、名垂青史

江春霖事件引起很大的轰动效应，不仅京都震动，而且“全国舆论哗然”，掀起轩然大波。他虽受清廷斥革，却赢得人们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为他深表愤愤不平和婉惜。这使他的声威更高，他的气节更为人们所崇敬。人们称赞“有清三百年间谏官奏疏殆未有如君言之切直者”，说他是“光宣以来谏官第一人”，乃至是“有清御史第一人”。

据当时天津《大公报》报道：当他回翰林院时，正赶上清廷令各部院推选资政院议员，江春霖获得绝大多数人的热烈拥戴，成为各部院得票最多的人选。该报还发表了《江春霖之声望》的报道说：他回原衙门行走后，许多衙门都争着要调用，京都一时出现“江春霖热”，刮起一阵江春霖旋风。同僚之以诗酒慰饯者日必数起，致使门庭若市，应接不暇。京外人士也有打电报来慰问的，如汤寿潜来电说：“非为公惜，为大局惜也。”“时人以为确论。”

当他要返乡时，同僚知道他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全台御史集资2 000两白银为他送行，他辞谢不受。在京同科进士聚会于松筠庵为他饯行，科道同官也会议于松筠庵与他话别。有人受到江的感召，建议学习江春霖精神，访查京内外大臣劣迹，联名上奏，以尽言官之责。吓得奕劻请假数日，以避锋芒。最隆重的一次集会，是政、学、商各界联合于虎坊桥湖广会馆所举行的饯行大会，据说到者万人。

江春霖热的另一个高潮，是他离京那天的送别。“送人者倾城而出”，达数千人，致使前门火车站一带的道路为之堵塞，场面十分壮观。众人目睹江“行李萧然”，除了几件旧衣服和几箱书籍之外，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更使人们无限感叹。

人们竞相以诗画相赠，“都人士送诗者以千百计”。画家罗一士选择花卉中可与江春霖高尚品德相比拟者，如梅、菊、莲等绘成四册，并于每幅画题诗咏赞。如咏梅：“高枝谁可屈，古干独称雄。纵被冰霜妒，应知意气宏。”咏菊：“人淡如菊，心坚似石。晚节高风，谁堪比拟？”咏



莲:"濯清泉而自洁"等,是借咏花以咏人的杰作。

陈衍赠诗有"四海争传真御史,九重命作老翰林"之句。张元奇诗云:"五载逐臣头已白,也曾亲捋虎须来。"李维藩诗曰:"胆破权奸芒在背,身担道义铁为肩。寒蝉杖马惭无地,赢得芳名万古传。"陈笃初诗赞:"伟行足垂千载后,直声已震九霄边。"都给江春霖以充分的肯定,同时鞭挞了权奸。

在千百赠诗中,除了亲朋友好之外,也不乏素不相识、慕名而作的诗篇。如湖南刘羲炎说:"余与先生无平生交,乃一念其为人辄私心景仰而不能自置",故也赋诗四章相赠,称赞他"不惜此身成碎玉","赢得声名到处传"。尤为难得的是一些闺阁诗人也竞相唱和,尤以李迦云、李凤先诸女士的诗作为佳。还有号称八埠名妓的姚蓉初也作诗送行,并登诸报章,传为佳话。京内外许多报章还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广为宣传,可见江春霖精神感人之深。

江春霖也作留别都中知己诗七律三首,其中云:"葵藿有心空向日,刍荛无力可回天。"无限感叹自己枉费一片忠心向着朝廷,却无力挽救清廷的衰败。此诗被广为传诵。

随着江春霖的南返,江春霖旋风也刮往南方。当他路过上海时,上海 14 个团体在张园安垲第开欢迎会,与会者5 000 人。当他回到故乡莆田时,该县各界人士于府学的明伦堂召开热烈的欢迎大会,据说与会者逾万人。人们说这是 300 年来未有之盛会。江春霖所到之处广受欢迎,足以代表民意。清廷弃之,人民爱之,是非自有公论,贵为朝廷却无法一手遮天,反而使自己陷于孤立。

1918 年2 月15 日,江春霖与世长辞,享年64 年。虽然他辞官隐居已八年,人们却没有忘记这位清末第一御史,对他的逝世无比悲痛。北京、上海、福州、厦门、晋江、台湾、莆田等地各界人士纷纷举行隆重公祭。旅闽知名人士陈宝琛、萨镇冰、林纾等 27 人联名于福州公祭的祭文中曰:"鲠言正议,世称梅阳,梅阳有君,名动九阍。"给予极高评价。

莆仙同乡会代表莆田、仙游二县人民举行公祭,祭文称颂他"气节



可以重河岳，文章可以泣鬼神。……年不及七十，而寿于万世，官不过五品，而荣于王侯”。厦门各界设牌位于鹭江之南普陀岩，素服哭祭，黄琬撰祭文曰：“立德、立功、立言，并称不朽”，而先生“于三者亦何所不有”。台湾新竹人士公祭，祭文惋惜“砥石沦亡，太史星沉”。此外，海内外各地人士也竞先设位祭奠，不胜枚举。

至于以诗文寄托哀思者就更多了，如孙雄的感逝诗云：“抗疏批鳞泣鬼神……辣手文章字字新。”黄绶所作长换联更是充满感情：“乡里赖公得安全，奸佞惟公能揭破，丰功伟烈，岂徒历史荣光，看当年北美西欧，共仰高风，且为立传绘图，流传寰宇；持躬教我以勤俭，作吏勉我为循良，小子后生，方冀随时请益，讵一旦山秃木坏，仅存化雨，不禁椎胸踯足，痛哭门墙。”

以上种种，足以为江春霖盖棺定论，使之名垂青史，万古留芳。



江春霖的传奇故事

一、科举考试的“三殿军”

清代科举考试分为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个等级。童试在府或州县举行，参加考试的是童生，考取后称为秀才，取得入府、县学为生员的资格，考取第一名叫案首。考中秀才便取得了参加乡试的入场券，乡试在省城举行，考取后称为举人，第一名叫做解元。会试在首都由礼部主持，参加考试的是举人，考中后称为贡士，第一名叫做会元。贡士们还要参加最后一次考试即殿试，在皇宫内的太和殿前举行，这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一级考试，考中后称为进士，第一名叫做状元。

一个人要在乡试、会试和殿试中，连续考中解元、会元和状元三个第一名是十分困难的，也是非常荣耀的，这就是当时人们梦寐以求的所谓“连中三元”。但是，若要在各级考试中连续考取中选的最后一名即殿军，也是十分凑巧和难得的，而江春霖恰恰就是其中的一人。

江春霖自幼聪颖好学，刻苦自励，文章也写得不错，平时考试成绩都很好，深受历届学使的赏识。偏偏在各级关键性的科举考试中，他未能取得应有的名次，虽未名落孙山，却连续三次考取了最后一名，差一点就落第了，真玄啊！他在童试中名列案末，考中最后一名秀才。光绪十七年（1891 年）辛卯科乡试，他又考中最后一名举人。接着在光绪二十年（1894 年）甲午科殿试，他又考中了三甲最后一名进士。于是，当

时的士林就戏称他为“三殿军”。

在参加殿试之前，江春霖信心百倍，原想争取考中状元。考试开始也写得很顺手，他“精心结撰，写作俱得意”。中途去上厕所，边走边构思，不料等回到座位上，正要继续写作时，突然发现试卷上有两处拇指大的墨迹，而且连墨壶也不翼而飞，不禁大惊失色，显然是有人故意用拇指蘸墨涂在卷子上，并偷走墨壶。殿试不仅重视文章内容，尤其重视书法和卷面整洁，所以殿试要名列前茅，必须要有好墨。当时有一个叫涂海屏的太史最善于制墨，他制的墨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浓淡相宜，故每逢殿试，希望考在前列的都争先购买他制的墨，每壶竟值四两银子，他也因此出了名。因同乡关系，他在考前把一壶墨送给了江春霖。在考试点名时，邻座有一位姓郑的考生，过来认同乡，见墨壶是涂海屏所制，便拿起来观看，连声称赞是好墨，并说有此好墨，你老兄考取鼎甲有如探囊取物。江春霖见墨壶丢失，马上怀疑是邻座郑考生所为。

但殿试最为隆重，考场秩序森严，若此时找郑考生理论，必致争吵喧哗，构成大不敬罪，两人都将同时被赶出考场，取消考试资格。故江春霖只好忍气吞声，等墨迹干后再进行挖补，耗费了不少时间，更重要的是因心中气恼，扰乱了思绪，又怕时间来不及，只好草草完卷，因此考了三甲的倒数第一名。

二、御史考试的冠军

在科举考试中，江春霖虽然连中“三殿军”，但在御史考试中却一举夺魁，荣登冠军宝座。他年轻时即立志要当御史，当他考中进士，被钦点为翰林之后，平时即好谈时务，议论政事得失。尤其三杯酒下肚，更是点名道姓怒斥权奸贪官，以至破口大骂，毫不忌讳，往往使在座的人为他捏一把汗。

光绪三十年（1904 年）清廷下令考选御史，江春霖认为机会难得，积极准备报考。那些贪赃枉法的大臣耳闻他痛恨贪官污吏，他们心中有鬼，怕江当上御史会揭发他们的罪行，故都不愿他考中御史，在考前



军机大臣便嘱咐考官们千万不要录取江春霖。

那时考试一律是密封卷，只有在考后揭去密封才知道姓名，故要知道考者是谁，只能靠辨认字迹。江在翰林院为官已十年，所写文稿很多，他的书法瘦硬，自成一体，考官们大多能认识他的字体，因此想故意不选他并非难事。江春霖对大臣和考官们的阴谋略有所闻，暗中采取对策，在考前几个月就开始练习悬腕书写，完全改变了原来的字体。终于瞒过了所有考官，以他对御史职责的深刻认识，议论宏通，而考中了第一名，成为名副其实的冠军。

发榜时考官们见第一名竟是江春霖，无不目瞪口呆，莫明其所以然。军机大臣们也都“相顾失色”。江春霖就这样当上了梦寐以求的御史，成为权奸和贪官的死对头。

有知内情者和他开玩笑说：“你一向以诚实坦白闻名，从不作伪骗人，怎么这一次考试也作伪呢？”江十分得意地说：“我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略施一点小骗术；何况字体虽然变了，但字还是我自己写的，怎么能说是作伪呢？”

三、台谏的“三菱（霖）公司”

在光绪末年至宣统初年，福建莆田的江春霖、湖南湘潭的赵启霖和广西全州的赵炳麟，三人同时担任御史台谏官，彼此志趣相投，关系不错。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正直不阿，“均以鲠直负清望”，敢于弹劾权贵重臣。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当时的言官大都挂名台谏，却噤若寒蝉，明哲保身，不肯得罪人，形成万马齐喑的沉闷政治空气。唯独以上三人敢于虎口拔牙，自然显得很突出，引起京师人士的瞩目，称他们为忠言极谏的真御史。

赵启霖文辞很美，性情温文儒雅，不随便与人交际。但他当御史不到一年，便挺身而出，弹劾庆亲王奕劻父子，并因得罪权贵而被革职。江春霖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有了赵启霖的前车之鉴，他仍冒着生命的危险，继起连续八次弹劾奕劻父子及其死党袁世凯，他也因此

被免去御史之职。赵炳麟比起他们二人略逊一筹，但也是个正直之士。

当时上海洋商开办了一家很有名的公司，叫做“三菱公司”。以上三名御史的名字都有一个“霖”字（麟与霖同音），“菱”与“霖”谐音，所以人们就把他们叫做台谏的“三霖公司”或“三菱公司”。认为“有清一代之谏垣，实以三霖公司为尾声”，给予极高的评价。从此以后，不论是各道监察御史还是各科给事中，就都是“巧趋曲媚，响寂音沉”，无人再敢忠言极谏了。

四、给袁世凯祝寿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八月二十日，是袁世凯的五十大寿，这时的袁世凯已是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同时是北洋军队的头子，又与庆亲王紧密勾结，狼狈为奸，掌握清廷军政和外交实权，权倾朝野，如日中天。慈禧太后为了笼络他，赏赐给他不少寿礼，计有无量寿佛、金佛各一尊，御书“福”、“寿”字及寿额各二幅，玉如意四柄，内库纱、江绸各八卷，蟒衣一袭，御酒二尊，双龙贡烛二对等。如此厚赏在大臣的寿辰中是极罕见的。京内外百官趋炎附势，也争先恐后送厚礼致贺，袁府门庭若市，冠盖如云，盛极一时。

正当袁世凯热热闹闹大庆生日的时候，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就是江春霖。此人前来祝寿特别引人瞩目，不但大出众宾客的意外，也大出袁世凯本人的意外。因为江为人正派，从不阿谀奉承，讨好权贵，而且嫉恶如仇，他与袁世凯不仅平日素无往来，还对袁结党营私，揽权纳贿，图谋不轨，十分痛恨，所以他的到来引起人们的诧异。

俗庆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江春霖来祝寿，确实是以祝寿为名，为收集弹劾袁世凯及庆亲王父子的材料的。故仅过了 18 天之后，他便递上《劾军机大臣袁世凯权势太重疏》，疏中列举他祝寿所见：“上月世凯生日……大小臣工献颂贡谀，以百千计。”“向时亲王书款，皆称某王，无称名者，至结拜兄弟，则更未之前闻矣。乃世凯寿辰，庆亲王奕劻去爵署名为祝，贝子载振则称世凯为四哥，而自称如弟，对联两合，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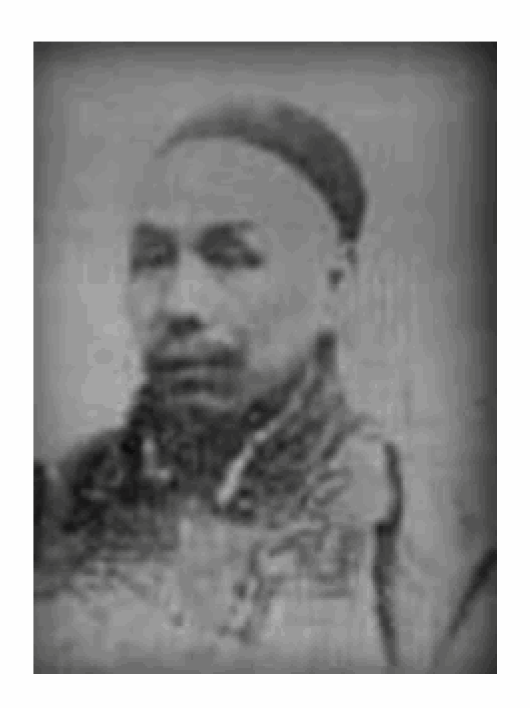


众目所共瞻。”

他以亲眼目睹的事实,揭露袁世凯勾结权贵,拉拢百官,发展下去,势必祸国殃民。同时指出庆亲王的寿联,不署亲王而直署自己的名字,自降身份,违背成例。尤其是他的儿子贝子载振与袁世凯结拜为盟兄弟,违背满族宗室不得与汉人联谱的例禁。揭露了他们相互勾结,沆瀣一气的事实。这次奏参虽然留中不予处理,但在朝廷召见时袁却“饱受懿训严斥”,致使他丧魂落魄,在谢罪出宫时,“惊惶失足,从殿阶坠地,跌伤右腿”。也成了次年以“足疾”而被遣返原籍“养疴”的借口。

五、巧救妓女

京师妓院林立,公开挂牌营业,分为三等,即清吟小班、二等茶室和三等茶室。妓院大多集中在南城虎坊桥一带,号称八大胡同,故嫖妓也叫做逛胡同。当时在京官绅很少有不涉足妓院的,江春霖却自称“平生不二色”。既不讲究美食,生活俭朴,又不求声色之娱,虽在京多年,从未进过妓院。发妻去世后,有人劝他续弦,他也坚决拒绝,是一个有名的“正人君子”。



林纾像

然而,有一年夏天,他与好友林纾一起往南城应酬,夜里很晚才踏上归途。恰巧路过虎坊桥时突遇暴雨,衣服被浇得湿透,一无雨具,二无车辆,下大雨的深夜,街上根本雇不到车。不得已只好和林纾走入附近一个二等茶室,随便叫了一名妓女,开房取火,一边烘烤衣服,一边和妓女闲聊。该妓女见他平易近人,便向他大吐苦水,倾诉自己的悲惨遭遇。因她不善于兜揽客人和撒娇献媚,很少得到嫖客的光顾。因此屡屡遭到鸨母的打骂和虐待,说到伤心处,满眼含泪,实在可怜,博得江春霖的同情。

一场暴雨过后,已是雨过天晴,衣服也烤干了,江春霖付了钱就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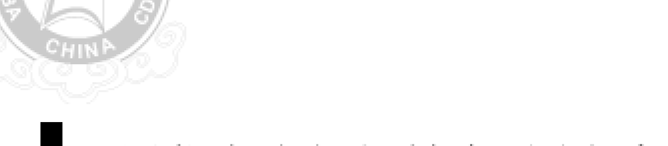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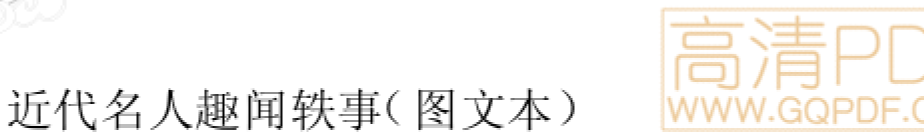
走。妓女好容易接待了一位客人,若不能留宿,又要遭到毒打,便苦苦哀求他好歹留宿一夜。江春霖说:“我知道你的苦楚,但留我一夜,并不能解决问题,今后你还照样要受苦。不如我给你过夜的钱,你可以把钱交给鸨母,她就不会责怪你了。过几天我一定想办法救助你,你只管放心。”妓女见他态度认真诚恳,便很高兴地一再感谢。

江春霖和林纾离开妓院后,就对林纾说:“这个妓女太可怜了,要超度她出苦海,权在我们手里,只要我们各作一书一画给她,就足以提高她的身价,你同意吗?”林纾表示赞同,过了几天,他们的书画都准备好了,又请了一些朋友分别书写了若干楹联和屏幅。他约林纾再次去那个妓院,把字画和联幅送给那妓女,该妓女把这些墨宝张挂起来,顿时蓬荜生辉。那时江春霖已是声震天下的名御史,嫖客们见此妓女为江春霖所赏识,必非等闲之辈,都争着要一睹其丰采,从此夜夜客满,艳色大噪。江春霖听到这消息,高兴地说:“想不到区区书画,果然有此效力。”但他却再未踏进该妓院半步。

宣统二年(1910年)春,江春霖辞官归里,路过上海,受到热烈欢迎,住在迎宾旅馆。忽有一位江苏候补道求见,江以素未谋面而拒见,该候补道说:“如不能相见,我将无面目见小妾。”江觉得很奇怪,想必另有隐衷,便请他入见。行礼后他便开门见山说:“小妾嘱咐我向大人请安,并恳请大人去敝寓,小妾将面谢大人再造之恩。这里有湘绣四幅,是小妾献给大人的,请赏收。”

这些话说得江春霖满头雾水,不知所云,他自知与女人极少往来,更何来再造之恩?便问:“尊宠是怎么认识我的,愿闻其详。”对方笑而不答,却一再恳请屈驾光临敝寓,说到了那里就知道了。江产生了好奇心,想去探个究竟,便随他同去。一到他家门前,他的小妾立即出迎,江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当年避雨时所见到的那位妓女。她恭请江上座,跪下叩头呜谢说:“再造之恩,终身不敢忘。”

原来她走红后,被这位候补道赎身,而成了他的妾,若没有江当初的帮助,她怎能跳出火坑,而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江有恩于人从不求报

答，他谦逊地笑着说：“那是你自己交的红运，我哪能给你幸福，哪儿有什么恩？”说完就起身告辞，尽管他们夫妇坚决恳切挽留他吃饭，他还是走了。这件事当时有人把它编为传奇。该候补道恐怕招惹娶妓女为妾的是非，托人竭力阻止才作罢。

六、结交青衣孟小如

江春霖没有什么别的嗜好，除了喜欢饮酒之外，有时也去看戏，他很喜欢青衣孟小如演的戏。那时演戏是“贱业”，“戏子”被人瞧不起，社会地位很低，演员被称为“优伶”，往往和妓女一起被称为“娼优”。有地位的人爱看戏，却不肯和不屑与戏子交朋友。江春霖没有这种世俗观念，他很尊重爱护孟小如，和他成了好朋友。

孟小如非常崇拜江春霖敢于弹劾权贵的气节，以及平等诚恳待人的品行。只要有空就到江所住的莆阳馆去为江烹茶磨墨，擦试几案，整理书籍，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好像他的贴身忠仆。彼此感情深厚，亲密无间，以至有人怀疑他们是同性恋。同仁中有人开玩笑说：“你一向是正人君子，怎么竟和戏子结缘呢？”他正色答道：“我爱小如，只是爱他的气节罢了，哪有其他的歪念头？”

孟小如在戏剧界本不是一流演员，混得并不好，后来只好改唱须生。当江春霖辞官返乡时，孟小如依依不舍，犹如失去了精神支柱。那时演员演戏用的戏服等行头，要由演员自备，戏班概不负责，临别时江春霖为他购买了崭新的行头，作为分别的赠礼，并语重心长地说：“好自为之，前途有进步，要告诉我，好让我高兴。”

那时北京的火车站在正阳门(前门)，江春霖出京时，孟小如一直送他到正阳门火车站，洒泪而别。火车已开走了，孟小如还呆呆地站在站台上，凝望远去的列车，可见其感情之深。



端方的人生百态

一、贪污好色

端方为官多年，贪污成性，尤其是担任两江总督三年间更为严重。更恶劣的是，他曾一次即侵吞赈灾款银达二百余万两之多，虽经言官揭参，因朝中有内援，卒以查无实据了事。如有一个知府叫许星璧，从端方手中得到综理财政局差，事后孝敬他白银二万两。当时官场贪污方法有直接、间接两种，前者是直接收取银两，后者则收受书画、古玩、珠宝等馈赠品。端方是两者兼而有之，而以后者为主。他自称名士，人们也推崇他是满族官僚中的风雅者。他擅书法，识金石，酷好书画古董，广为搜罗。吴兴有姓陆的兄弟二人，是著名的大藏书家，他们为谋官职，便投端方所好，挑选了价值二三十万两白银的珍本古书一百多套送给他，果然哥哥当了军械所总办，弟弟到了宝应厘局，都是能赚大钱的美差。



端方像

端方还常用巧取豪夺的伎俩，凡他属下官员的家中藏有古物者，一旦被他探知，便以借来观赏为名，一借不还，属下谁敢讨要？于是便被他据为己有。他的书库中琳琅满目尽是书画古董。他在江西数年间，采用这种间接手段贪污来的赃物价值不下白银百余万两。故当时有人



撰一对联予以揭露和讽刺。联云:

卖差卖缺卖厘金,端人不若是也;
买书买画买古董,方子何其多乎。

将端方二字嵌入联中,十分巧妙,由此联可见其搜刮民财之一斑。



端方常用印鉴

好色是端方的另一劣根性。端方的发妻很丑,且醋劲极大,既妒又悍。端方曾物色两名极艳丽的汉族少女,纳为小妾,被妻子知道,其妻对二女成天大加凌辱,打得体无完肤,最后折磨至死。端方惧内,对之无可奈何,从此不敢纳妾,还恬不知耻对人自夸"平生不二色"。其实他风流成性,尤其是 1909 年被罢免直隶总督后,无官一身轻,行动更自由,也更放纵,虽年近半百,淫兴更浓。江南多美女,他经常至江南各地寻花问柳,尤其留恋镇江,曾对其亲信陈庆年说:"我尝遍南北名花,只有镇江妓女风骚有别趣,是其他地方所无法相比的。"

后来他被任命为汉粤川铁路督办,在武汉黄鹤楼请客,酒至尽兴时,忽发感叹说:"我署理湖广总督时常登此楼,调任告别此处已八年,这里的风景依然这么壮丽。"座中有某太史问:"端公任总督与前任张之洞相比如何?"端方竟厚颜无耻地说:"我在好色这一点上不亚于张之洞,其他方面就望尘莫及了。"可见他也不讳言自己好色。

二、诙谐滑稽

端方与荣庆、那桐号称北京旗下三才子,工诗词,恃才傲物,常以语言或文字戏谑他人,引人发笑,以为逗乐。例如工部侍郎桂祥胸无点

墨，常写错别字，有一次写“開”字，中间少写一横，引起众人窃窃而笑。端方说：“他是叫咱们到他门儿里去造二十。”更引得众人笑得前仰后合。因为当时京城把最卑贱的妓院——土窑子叫二十，端方这句话是说到桂祥他家去开土窑子，可说损人损到家了。



那桐像

有一次，翰林院侍讲王壬秋登门向他借三万两银子急用，他正在与朋友打麻将，正好手上有一张“三万”牌，顺手就把这张“三万”递给王壬秋，弄得王哭笑不得。

端方恃才喜欢作对联嘲弄人，工部赵有伦，出身京师富家，目不识丁，花钱捐为郎中，因他舅舅张翼的提携，不数年竟连得要差，并充任会典馆纂修，端方很不服气。正好赵以千金买了一个妓女回家，他夫人也是个醋坛子，立即将她驱逐出门，赵很惧内，不得已在外面另租房子藏娇。不久又被夫人探知，从此限制赵的行动自由，无事不得出门，回家晚了就要受到辱骂，使赵感到十分苦恼。端方特作一联大加讽刺，联云：

一时逞豪华，原来大力弓长，不仅人夸富有；
千金买佳丽，除是明天弦断，方教我去敦伦。

横额是：“大宋千古”。大宋的皇帝姓赵，以大宋代赵，这样就把赵有伦的姓名嵌入联中。端方欺赵有伦文化水平低，看不出他的讽刺，故意把这副对联拿给赵，并说，我昨天偶作一联一额，请你批评指正。赵果然看不出来，极口称赞不已，还拿去给别人看，说这联作得好，以夸耀自己懂文采。人们一看都知道是讽刺他的，只是不当面揭破，暗中觉得好笑。

当然，端方有时也被别人占了便宜，有一次他和同僚聚饮，几杯酒下肚，他便借酒骂座说：“现在旗人做外官，一事不懂，一字不识，所有

的事都要请教属下的门政,门政即是他爸爸。”在座的有一位工部旗员叫长光甫,当即肃然起立,一本正经向端方屈一膝行礼说:“给老爷请安,老爷外放时,千万将奴才带去当门政。”大占了端方的便宜。



端方书法作品

1911 年春,赵尔巽由四川总督调任东三省总督,日俄两国对我东三省垂涎已久,正竞相把侵略魔爪伸入我东三省。当赵入京陛见时,端方正闲居京师,一日赵向端方辞行,端方见面的第一句话就问:送礼的帖子写好了吗?赵感到莫名其妙,就问是什么帖子,端方诙谐地笑着说:“当然是谨具东三省土地人民政事孝敬日俄两国啦!”赵也不是省油的灯,立即反唇相讥说:“如此厚礼,愚兄担当不起,这担子保举贤弟去送如何?”端方本想戏谑他人一番,反倒讨个没趣。


赵尔巽像


三、宦海沉浮

端方举人出身,起初做过几任小官,1898 年任直隶霸昌道。戊戌变法改革官制,新成立农工商总局,因他追随维新运动,被光绪帝升任为该局督理。变法失败后,差点被牵连治罪,他贿赂荣禄和李莲英,并赶忙写了一篇《劝善歌》刊登于报上,对慈禧太后歌功颂德,才免予追究,反被任命为陕西按察使。次年,端方获授护陕西巡抚并升任陕西布政使,从此跻身于大官僚行列。

1900 年,义和团运动掀起高潮,遍及北方各省,端方在陕西严厉镇压,并贴告示严饬各州县认真保护洋人和教堂,从而激起义和团的愤恨,有人在抚衙照壁和三堂贴出匿名揭帖曰:“端不端,方不方,八月十五杀端方。”不久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和光绪等逃到陕西的长安(今西安),端方护卫有功,更加得到信任和重用,次年即升任湖北巡抚。



1905 年端方奉旨率团考察欧美政治，回国后更不可一世，把朝廷各大员都不放在眼里，他已不满足于当封疆大吏，更想跻身朝廷中枢。他对军机大臣瞿鸿禨说：你应该专心当你的军机大臣，保举我当外部尚书（外交部长）。结果他却被派任两江总督，败兴而去。1909 年，端被调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又幻想进朝廷中枢，过天津时对署理直隶总督那桐说："我推荐你代替我担任直隶总督如何？"那桐看穿了他的心思，答道："你是想当军机大臣兼外部尚书，而让我替你在这里守这个摊子，谢谢啦！"于是一时谣传他将入枢府当军机大臣。他进京见了军机大臣世续，世续坦诚告诉他："那是传言，纯属无稽之谈，你还是老老实实赶紧去天津当你的直隶总督吧！"

是年慈禧太后的灵柩下葬东陵，隆裕太后等举行隆重奉安礼，端方也去参加，还派摄影师，拍摄了典礼盛况。这件事在今天看来是一件好事，可在当时却是不允许的，被农工商部左丞李某所参奏，隆裕太后大怒，将他交吏部议处。端方发现自己闯了大祸，吓得屁滚尿流，赶紧去找总管太监小德张，长跪屈意相求，正好被贝勒载涛看见，他又一并乞求他们相救。他以为有他们救援不会有什么问题，表现得若无其事，不料吏部却奏请将他革职，军机大臣也没有一人替他说话，终于以大不敬罪被革职。次年九月两广总督出缺，他四出活动，以金钱名画贿赂，想谋取粤督位置，但未能如愿。

四、魂断资州

1907 年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与清军激战被俘，在审讯时奋笔直书："本拟杀恩铭后，再杀端方、铁良、良弼，为汉人报仇。"一时满族大臣如惊弓之鸟，谈虎色变，人人自危，端方更被吓破了胆。从此不敢单独出门，夜里在重兵把守的总督衙门内睡觉，都要叫侍卫手执武器守住四周，内室也要有保镖在侧，顷刻不离，使夫人甚感不便。

一天下午，天气很闷热，提学使陈伯陶有事来见，端方穿夏天便装

摇着纨扇和他说话。陈也俯身向靴里去取折扇，端以为他取武器，十分惊慌，倏地站起来，脱口大喊："你要干什么?"吓得脸色都变了。陈知他误会，一边打开扇子，一边慢条斯理地说："天气太热了，我只是取把扇子扇风而已。"端方为自己的失态感到很尴尬，脸都羞红了，忙坐下借过陈的扇子来看上面的字画，借以掩饰，然而这一丑闻很快便传遍遐迩。



在北京谋炸五大臣未果，身殉革命的吴樾

端方上任直隶总督不过百日，即因照相之事而丢掉乌纱帽，他不甘心退出官场，千方百计图谋东山再起，1911 年初夏，他以重贿被起用为汉粤川铁路总办。这时保路运动正如火如荼，尤其是四川省广泛成立保路同志会和同志军，展开武装斗争，烽火遍地。9 月，清廷命端方入川镇压保路运动，授予指挥四川军队的全权。端方路过武汉时，湖广总督瑞澂与端方素有过节，不肯亲往迎接，端方原本就看不起瑞澂，便大怒而当面责备，并责成他派兵两旅护送其入川。瑞澂挟怨故意挑选军心不稳、军官不服统领的第三十一和三十二标护送。时军中已欠饷二日，他又别有用心地谎称端大人从北京带有恩饷来，企图借刀杀人。

端方率军入川，行至重庆，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见大事不妙，转而主抚，奏请朝廷和平解决四川问题，清廷于 11 月 6 日命端署理四川总督，仍令率兵入川平乱。他不得已继续前进至资州(今资中)，实际上已陷入保路同志军的重重包围，不敢再深入，驻军观察。军中因欠饷不满情绪日益强烈，端方为解决军饷曾派人向银行借款，但款项迟迟未能解到，士兵已忍无可忍。军中革命党人利用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的有利形势和士兵的激愤情绪，发动起义，轻而易举地杀死了端方和他的弟弟端锦。

端方以贿赂东山再起，以为从此又可官运亨通，没想到还没到任，便在途中死于非命。他花钱为自己寻找了一条死路，可说是自掘坟墓。







文盲办义学的刘钊



武训塑像

武训“行乞兴学”的动人事迹，早已家喻户晓了，然而无独有偶，在清代后期和武训一样以文盲兴办义学的还有一位，却鲜为人知，而且他兴办义学的时间比武训要早数十年，这个人就是刘钊。

刘钊（1814—1885 年），字德佑，别号兰庭，福建省仙游县人，世居城内之凤井。父亲早死，生子三人，他是老大，老三还是个遗腹子，他母亲带领三个孤儿，生活十分艰难困苦。因家贫无法求学，刘钊从小即跟人学习经商，由于他的勤俭，积二十多年，家产渐富，后来成为该县首富。他还以捐助饷银而挂名浙江县丞，三弟也任闽县学训导之职。

刘钊身为富豪，却终生保持勤俭美德，“自奉甚约，而待人极丰”。生平乐善好施，凡见有孤寡无依无靠的人，按月给予周济，尤其对寡妇，必于每月初一日拄着拐杖把钱亲自送到她的家去。每逢年底，他见有家贫难以过年的，就在夜里亲自率领子侄，偷偷把钱米送到他们家里，而不留姓名。他平时也经常给贫病交加的人送衣、送药，并建立“则



善”、“积善”两个慈善机构，力行善事。刘钊还独资或集资修建富洋、仙岭道路，金凤、石马两座桥梁及疏浚南湖和芦竹池，造福桑梓，赢得众人的啧啧称赞。凡提起刘钊，人们无不竖起大姆指，称其为第一大善人。

然而他终生的最大遗憾是小时不能读书识字，因此他特别重视教育，极力扶助教育事业，决心要让贫穷的孩子能够来上学，有培养前途者得以上进。他一方面创办义学，一方面拨款资助该县童子试和金石书院的经费。而他最关心的还是办好义学，让那些无钱上学的穷孩子到他的义学来免费接受教育。他不辞劳苦，每天必到义学去视察，发现有学生贪玩，不好好学习，必定严加督责和教育，把他们看做自己的亲子弟，务使他们勤奋学习而后已。他对自己的子侄、孙子和曾孙更是严格要求，绝不溺爱。在他的严格督责下，长子乔龄是增生，任福建县学训导，次子彭龄是附生，三子浩龄也是附生，任广东盐政使，四子庆龄是副拔贡，任工部主事、浙江知府。从此以后他的家族便从世代文盲变成以儒学传家的世代书香门第。





活财神胡光墉盛衰记

胡光墉，字雪岩，浙江杭州人。出身贫寒，自幼在钱庄当学徒。他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救人于危难之际，并因此得到回报，使自己走上富贵之路。以下两件事就是典型事例。



胡光墉像

第一件是，有一个官家子，叫王有龄，随父亲到浙江任道台，父亲死后穷困潦倒。有一天胡光墉在钱庄见到他，见他相貌堂堂，便惊奇地问他："看你的样子并非平庸之辈，何以落得这般田地？"王有龄长长叹了一口气，便把自己的遭遇如实相告，并说曾经捐起盐课大使，因缺乏盘费，无法入京就任。胡决心资助他，约他次日在茶馆会面。次日胡出门为东家收账，将所收银五百两全部赠送给王有龄，请他速速进京赴任。王怕连累胡，推辞不肯接受，胡却说：我没有家室，光棍一条，没什么可怕的，东家也无奈我何，只求你日后得意时别忘了我。王见他态度真诚，便接受了银两束装北上，到天津时，碰见同窗好友何桂清，何乃是王父的弟子，从小与王相伴而读。他对王说：浙江巡抚是我的朋友，你拿我的推荐信去拜见他，必受重用。王持函返回浙江，果然被巡抚委任为粮台。王将胡赠送他的五百金还给他，并给他本钱让他辞掉旧职，



自己办钱庄，名叫“阜康号”。后来王有龄官运亨通，保知府，升道员，接着又升任臬司、藩司，不几年竟当上了浙江巡抚。为了报答胡光墉赠金之恩，他保举胡任牧令，并接管粮台，钱庄和粮台互相扶持，从此日益大发起来。

另一件事是：有一个姓李的人在浙江候补官缺，落拓不得志，经济拮据。有一天他到胡光墉当伙计的钱庄去借钱，店中所有的人不但不理他，反而加以非礼。只有胡光墉一人对他殷勤备至，因钱庄不借给他钱，胡便把自己全部积蓄借给他。李某深受感动，发誓日后但有出头之日，必以重报。后来他终于担任了知府，那时胡也已自开钱庄，李刚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传令所属各县，凡解粮饷者必须由胡光墉的阜康钱庄汇兑，促使阜康钱庄生意更兴隆，存款日增，信誉卓著，为胡光墉迈向巨富推波助澜。

短短几年间，胡光墉便从一个钱庄小伙计一跃而成为巨富，财源滚滚而来，势不可挡，终于跃升为全国首富。在这过程中尤得力于左宗棠的重用和扶持。咸丰十年（1860 年），太平军攻占杭州等地，左宗棠由曾国落保举，以四品京堂襄办军务，率军开往浙江与太平军作战，次年升任浙江巡抚。因胡光墉受前任巡抚王有龄重用，管理粮台而暴发，很多人嫉妒怀恨，在左宗棠继任时纷进谤言，使左对胡印象极坏，刚上任就给他出一个难题，故意限他十天之内筹办十万石米，这是一般人不可能做到的，想以此难倒他。不料胡光墉很有心计，早有准备，他胸有成竹地说：“大军正等待军粮下锅，何能等待十日？此事我筹备已久，若等到大人吩咐再去筹办是万万来不及的，我只要三天即可如数办妥。”果然不出三天，十万石米全部交齐。左宗棠大喜过望，知道他忠于职守，重信用，又很精明能干，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从此对他更加信任和倚重，一切粮饷均交胡筹办。以至凡江浙诸省的大役大赈“非他弗克举”。他还设左军上海购运局，购买各国新式枪炮、军火及药材供应左军。

后来左宗棠升任陕甘总督，率大军镇压捻军和回民起义，接着西征



新疆阿古柏反动政权，其军需枪械粮饷也都委托胡光墉筹办，得以源源接济，“毫无缺误”。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宗棠在奏折中叙述他当时军需困顿的情形说：陕甘一带多是荒瘠苦寒之区，历年兵燹，无可筹措军饷，各省关又欠解协饷，致使每年只能发两个月的军饷，后来甚至只够发年末一个月，即“束手悬盼”，情况十分严重。幸亏有胡光墉出面，屡次向华商筹借，如期解到，以解燃眉之急，上年因华商借款不敷，他便竭尽自己的资财并劝亲友助借，达十万两之巨，并不取利息。在收复新疆过程中，他捐款捐物及水陆运费共计约白银二十万两之多。左宗棠因得力于胡光墉的大力支持，才得以屡建军功，他曾多次上奏清廷大力褒奖。称他“素敢任事，不避嫌怨”，“实为缓争可恃……深明大义不可多得之员”。还说：“新疆底定，核其功绩，实与前敌将领无殊。”在左宗棠等的一再保举下，胡光墉竟官至江西候补道、布政使衔，头品顶戴，赏黄马褂，并累次赏给御书“福”字等。

胡光墉尽心尽力为清军筹办粮饷、军械、药材等，当然不都是无偿劳动，他获利丰厚。由他担保向外国银行借款，也得到不少利益，如有一次左宗棠向外国银行借款，利息七厘，由银行发股票，仅付利息四厘，所余三厘，由胡光墉和银行对半分。可以说清军需要胡光墉这样有经济实力、有信用、能办事的富商为其筹办军需粮饷，而胡光墉也在其中获暴利成巨富，彼此互相依赖。

当胡光墉拥有巨资后，胃口越来越大，无利不趋，生意越做越红火，他的阜康钱庄在京师和几乎全国各行省都设立了分号。同时还经营丝茶药材等行业，开展对外贸易，出口丝茶，购买洋枪大炮等。其鼎盛时期资产达数千万两。同治年间足以操纵江浙商业为外国人所信任者只有胡光墉一人，他称霸商界，操纵物价，驰名中外，声势煊赫。因他资本雄厚、守信用，又与官府通声气，得到朝廷的青睐及军政要员的支持和倚重，身价百倍。庆亲王奕劻、文武大臣、湖军将领、富商显贵以及各界人士都争先在他的钱庄存款，大者动辄千万，使他的资金更加雄厚，名声更大，有人说他“富可敌国，资产半天下”，虽属夸张，但他确实是无



可争议的全国首富,人们都称他为“活财神”。就连给他抬轿子的轿夫,因跟随他的时间长,居然也发了财,家中养有奴仆和婢女,夜里抬完轿回家,奴仆们传呼“老爷回来了,快烧汤给洗脚”。如此轿夫真是千古奇闻。

左宗棠称赞胡光墉是“商贾中奇男子”,他很精明,懂得经营之道,认识到要搞好商业,关键在用人,要使店伙齐心合力,尽职尽责,全力以赴才能搞好。故他知人善任,关心职工生活,所雇用店伙都是年轻精明强干的人,每雇用一个人,首先询问其家庭经济情况,先发给他们一年的费用,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他在一些店中还实行“阳奉”和“阴奉”制度,即人老退休后仍发给退休金养老,死后再发给最后一笔钱,作送终治丧费用。如此有人情味的举措,使店伙大受感动,甘心情愿为他卖命工作,从而大大提高了效率。

他还特别重视树立企业形象,倡导商业道德,集中体现在他于杭州所创办的胡庆余堂中药店。他别出心裁,在这个药店的营业大厅中,特设一座紫铜大香炉,凡是顾客不满意的药剂,都当众投入炉中焚毁,另换给好药。

有一次,一位姓章的花甲老人,人称“老德宝”,因买了庆余堂的避瘟丹,服后使老伴的病情大有好转,故再次前来购买。当他拿到药后,细心的老人打开药盒闻了一闻,觉得有点不大对,就说:“这个药的味道,好像和上次买的不大一样啊?!”胡光墉听了便问伙计是怎么回事,店伙计说:“药是不错的,只是因为刚改换新药柜,可能有点新柜子的味道。”胡一边命伙计去后边取新的药,一边把“老德宝”搀到香炉旁说:“老人家,把你手中的药丢进香炉烧了吧!”老人正在疑惑之中,胡便从他手中拿过药投入炉中,并说:“老人家,这个香炉就是专门让客人烧不满意的药用的。”他就以这样的实际行动赢得顾客的信任。

他常教导店伙计说:“顾客乃养命之源。”以此树为店规,要求他们童叟无欺,绝对不可欺骗顾客。光绪四年(1878 年),在庆余堂创业初期,在制造虎骨追风膏时,因虎骨难寻,一时缺货,专门负责采购原料的



二掌柜邹文昌便以豹骨代替，以免无米之炊。此事被老药工叶子耕发现，报告胡光墉，胡认为这是违背办店宗旨、欺骗顾客的行为。他立即严肃处理，辞退二掌柜。为了从这件事上吸取教训，避免再有欺骗顾客的行为，他亲自写下“戒欺”两个大字，并在左边用小字详加说明：

“凡百贸易均著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不可欺。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获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余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也可。光绪四年戊寅四月，雪记主人跋。”

他把这些题跋制成匾额，面向内高悬在营业大厅后边，让掌柜和伙计们每天都能看到这个“戒欺”匾，引以为戒。

由于庆余堂“采办务真，修制务精”，货真价实，赢得广大顾客的青睐。同行是冤家，其他药店竞争不过，看着眼红，就有许广和堂、仲德堂等药店老板，散布谣言，说庆余堂的大补全鹿丸是假货，还雇了一个叫“阿皮”的地痞到店中造谣生事，对众顾客胡说庆余堂的大补全鹿丸是假货。一时顾客议论纷纷，没有人敢购买。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用语言还是文字进行辟谣解释都是徒劳的。胡光墉想出一个绝招，亲自挥毫写下：“本堂谨择×年×月×日黄道良辰，虔诚修合大补全鹿丸。雪记胡雪岩主人启。”将此告示刻牌挂出，届时命人抬鹿游街，敲锣打鼓，使百姓周知，并吸引来众人围观，便当众宰杀。这一招真灵，谣言不攻自破，庆余堂重新取得公众的信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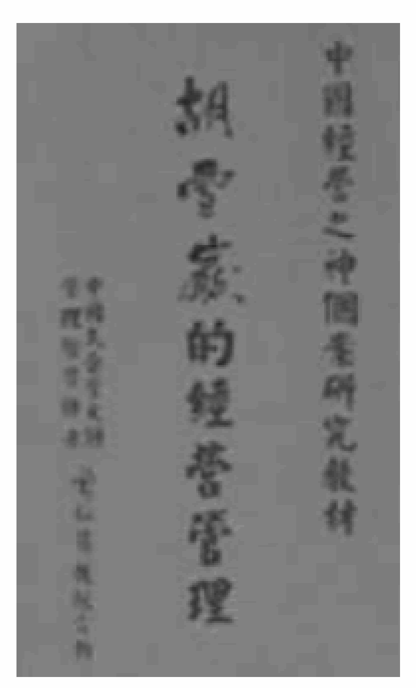
胡光墉非常重视广告，而他的广告从不哗众取宠，危言耸听，更不作夸大不实的虚假宣传，以欺骗顾客，而是让公众亲身体验，传为口碑。所以他凡制新药，先不出售，命人背着雪记胡庆余堂的“太平药袋”，走街串巷送人试用，而用连续奉送达三年之久，以至花银十万两而在所不惜。他的举措，因此牢固地争取了人心，其所制药品成为公众信得过的药品。

以上胡光墉的经营之道，他的商业道德和敬业精神，是一般商人望尘莫及的，许多人没有他这样的胆识和气魄，这也就是他在商界能够迅













胡光墉经商、人生之道,为后人所重视

速发达的奥秘之一。

胡光墉虽是一个商人,却有豪侠气概,富而好义,乐善好施,慷慨疏财,多做善事。每逢天灾兵荒,他必捐资救济。例如同治十年(1871年)直隶(今河北省)闹水灾,他捐棉衣1.5万件,牛具种子银1万两,制钱2万串。同治十二年(1873年)胡母七十大寿,令胡捐棉衣2万件送给边荒地区的穷人,胡亲率家属逐件检查,不合格者立予更换,左宗棠为此奏请朝廷赏其母匾额。光绪三年(1877年)陕西省大旱,他捐银5万两;又捐山东省赈灾银2万两,白米五千石,制钱3 100串,劝捐新棉衣3万件;捐山西赈银1.5万两,河南赈银1.5万两;捐江苏沭阳制钱3万串。这一年他对各省捐赈灾款共达十余万两。此外他还常设难民局收容难民,设善局捐款办善事,设粥厂为饥民舍粥,办义塾免费收穷人孩子入学,办医局免费为穷人治病,并施舍棺木衣物,出钱修复名





胡雪岩故居

胜古迹和寺庙等。总之,“凡养生送死,赈财恤穷之政,无不备举”。故累获官府嘉奖,百姓赞颂和尊敬,甚至有官拜翰林的人在他面前自称“门人”,街巷穷人、白屋寒士,等待他的救济为生的,更是感激不尽。

但胡光墉致富后也日益奢侈浪费,一掷万金,毫不可惜。他在杭州、上海大肆营造豪华巨宅,以细瓷碗捣烂,研末涂墙,可百年不朽。他的豪宅,不仅富丽堂皇,而且兼有仿西洋建筑。在花园中的地下,还造一仙人洞,陈设齐备,以供避暑,凉爽之极。他生活上比拟王公,偶一出游,车马塞途,仆从云涌。其排场胜过封疆大吏,引得围观群众啧啧叹羡,称为是神仙中人。他为母亲祝寿,借用西湖云林寺,达官贵人所送寿文寿联从山门至方丈室道路两旁都摆满了,祝寿者摩肩接踵,热闹非凡。有一次他去观剧,名角周凤林登台,他与另一富户李长寿座席遥遥相对,比着多给赏钱,胡竟命人以大竹筐盛银子倒出作赏钱,使观众瞠目结舌,叹为观止。

胡光墉爱好古董,古董商多登门求售,以至门庭若市。历来古董总是有真有伪,赝品不少,他也不仔细鉴别,只挑价钱昂贵的买。他的厅堂四壁都摆满了古董,大多是秦汉古物,每件都价值千金。有一天,有人送来一铜鼎,要价八百两,并声称这是实价,并不赚钱。他听了很不

高兴地说:你在我这儿不赚钱,还到哪里去赚钱?如数付款后,挥手命他以后不必再来。

每天早晨起床后,胡光墉便用翡翠盘盛青黄赤白墨各色宝石,端坐凝神注视约一小时才开始盥洗,这叫做养目。

酷好女色是胡光墉一大弱点。为了猎艳,他经常微服巡行街市,凡见有姿色的,立即命人前往做媒提亲,势在必得,身价由女家任意索要,从不计较。有一次路过一成衣店,见一年轻女子倚门而立,有几分姿色,胡正注视,该女发觉,急闪入门内。胡很生气,便叫人去提亲,以7 000元成交,选择吉日成亲,宴请宾客,席散进入洞房。他令该女脱掉衣服,裸体躺在床上,叫仆人拿特大蜡烛侍立在她旁边。胡故意来回仔细察看她全身,然后得意地对该女大笑说:你前几天不让我看,躲入门内,今天怎样?还不都让我看个够?在羞辱她之后胡匆匆离开洞房,去找别的美妾睡觉。次日,胡令人告诉该女可把洞房中所有的东西都拿去,改嫁他人,这里没有她的位置。该女如言拿走了价值2万两银子的东西成了富婆。此事实属荒唐可笑。

还有一次,他故意穿着破旧衣服去逛妓院,那些妓女只认衣装不认人,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活财神,见他一副穷酸样都不理他,只有一个老妓女殷勤招待。胡感觉到她的诚意,第二天派人送给这个老妓女一个蒲包,打开一看,里边装的都是黄灿灿的金子,使众妓女万分后悔,纷纷央求那老妓女再去请胡老爷大驾光临。胡知道后只是拈着胡须微笑,并未再去,使众妓女大失所望。

由于胡光墉历年不断罗致,终于姬妾成群。有人说有数十名,有人说有百名,每一美妾各住一间精美居室,金屋藏娇,供其享乐。因为姬妾太多,恐怕连胡本人也认不全她们的芳名,特制很多象牙牌,每牌刻一美妾姓名,每天晚上专有一名婢女手捧银盘,盛着他所有妻妾姓名的象牙牌供他挑选,拿出刻哪个妻妾名字的象牙牌,婢女便通知她今夜前去侍寝。胡因荒淫过度,力不从心,有人献上京师特制的春药,贴于涌泉穴,每次贴一块,从此他每年都派人进京以巨款为他监制春药。



每逢花晨月夕，胡光墉必令所有姬妾穿戴各色华丽服饰，一个挨一个坐下，胡光墉则左顾右盼，像赏花一样欣赏她们以为乐事。他又曾令32名美妾分为两组，一组穿红马甲，一组穿蓝马甲，上面书写中国象棋上的车马炮等字，作为活棋子，筑一个大台子作棋盘，让众妾各就各位面对面站立，他和夫人高坐在阑干内，用长竿指挥她们作下棋游戏，称为下活棋。

正当胡光墉如日中天、达到鼎盛时，却出人意料像冰山倒塌似的迅速垮了下来，一败而不可收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他后期耽于淫乐，对商业经营已不大用心，疏于亲身督导，对外地各分号更是鞭长莫及，各店经理中饱私囊，一些有裙带关系的店伙，恃有内宠，恣肆诓骗、无所不至，一般店伙计因得不到过去那样的照顾，也不肯再尽力卖命，因此不少店铺经营日渐亏损。加上他挥霍无度，后期已常入不敷出，外强中干，只因他名气太大，又有大量储户存款，故资金周转还不困难，也无人对他产生怀疑，得以继续维持。

给他致命一击的是外国商人。丝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大宗，因外商资本雄厚，生丝市场向来为外商所把持，并压价收购，谋取暴利，中国商人无力与之竞争。后来胡光墉投资丝茧市场，每年出巨款将各地丝茧订购一空，由他一家垄断居奇。外商只能向胡买丝，不能再操纵中国生丝市场，造成很大损失。外商对此很不甘心，对胡恨之入骨，终于串通一气，联合起来要打垮胡光墉，约定一年内都不买中国丝，结果胡收购的丝茧堆积如山，卖不出去，以至腐烂变质，血本无归，损失惨重。更要命的是有人传出胡光墉经济亏损的消息，风声一出，各地储户都拿银票争先恐后蜂拥到他的钱庄兑现，不到一天时间银号的现金被兑换一空，而欲取存款者仍如云集潮涌，无法应付，钱庄只好关门宣布破产。胡也被清廷革职，查封全部财产，拍卖还债。

胡光墉的失败，引起各界的极大震动，商界更是首当其冲，一时引起经济混乱，商业衰退，出现危机，像刮起十二级台风。如京城最大的四家著名商号“四大恒”，也跟着被挤兑得差点破产。很多大商店都关



了门,致使"京师无富商大贾,内外货贝不通,司农仰屋之筹益无可为"的严重局面。江浙诸省商务也大为减色。

树倒猢狲散,胡光墉破产时,遣散所有姬妾,允许她们带走其所住房中之物,价值不亚于一个中等人家的资产。所有宾客亲友纷纷避匿,店中伙计挟资远遁。幸好他在杭州所开的庆余堂药店,一向炮制精良,售价低廉,救济贫困,有德于民,未被充公,成为他以后一家生活的依靠,至今这座建筑精美的百余年老店犹存。





浙江杭州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

时人评论说,一个人的成败兴衰没有像胡光墉这样迅速的,他败得这么快,这么惨也是他本人始料不及的。他像一颗彗星划过近代商界的夜空,一时耀眼灿烂,但很快即毁灭了。他身败名裂,忧愤之极,不久即与世长辞,其老母也继之而逝。而胡光墉的兴衰却并非偶然,它留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

陈朝赞的远见卓识

清代末年,江西省南安府有一个叫陈朝赞的富翁,他继承了先辈的丰厚产业,加以自己善于经营,到了晚年,拥资达三十余万两,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款”。

他只生一子,并已有了孙子,他对子孙十分疼爱,家庭和睦,子孙孝顺,生活十分幸福。但随着年老体衰,悟到人终有一死,如何处置自己巨大的财富,使身后子孙生活更有保障,并有益于族人邻里,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吸取了古往今来无数富豪后代败落的惨痛教训,经过深思熟虑,终于下了决心,作出具有远见卓识的英明决定。



晚清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俞樾

据俞樾《右台仙馆笔记》记载,陈朝赞乘庆祝自己生日的机会,大摆寿宴,广泛邀请族人前来共饮。酒过三巡,他当众郑重宣布:我托祖宗的洪福,今天已拥有三十余万的资产,我不愿把这么大的产业留在我一人一家名下,只愿留下零头来供养我的家人,把整数30万拿出来,其中20万归始祖祠堂支配,10万归支祖祠堂支配。请分



别由众人共同推选有德有才的人来经营管理,主持此事者不得中饱私囊,"虽一垄之地不得私鬻"。以此为本金,每年祠堂收入的利息,三分之二供祠堂及所属族人共同享用,可用于祠堂春秋祭祀,补助族人结婚、丧葬等费用,帮助孀妇、老人、孤儿、残废以及贫困不能生存者维持生活;另外三分之一仍归我子孙所有。因为我怕日后我的子孙不能守住我的产业,每年有这笔固定收入,"仍可藉以为生也"。

众族人听了这番话深受感动,异口同声称赞:"此盛德事也。"但又恐怕他儿子不同意,便问:你儿子意下如何?他儿子也当众"矢言惟父之命是从"。于是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了,并且立即实行。这个做法类似于现代的建立基金会。

陈朝赞能够这样做,在当时是很难能可贵的,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仍颇有启发,怎样才是真正爱护子孙?怎样才是为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着想?现今的百万、亿万富豪们,能做到这一点的恐怕也是凤毛麟角吧!



清朝遗老梁鼎芬

梁鼎芬，广东番禺人，字星海，号节庵。久居张之洞幕僚，深受赏识和重用。张任湖广总督时，先提拔他担任武昌知府，不久擢升湖北按察使，署湖北布政使。他为报知遇之恩，一切忠于张之洞，无条件贯彻张的意图，成为张的主要谋士和得力助手。因此，凡崇拜张之洞的人必同时崇拜梁鼎芬，反之，凡唾骂张之洞的人也必唾骂梁鼎芬。甚至有人说：“鼎芬即小之洞，之洞即大鼎芬。”



梁鼎芬墨迹



梁鼎芬由于获宠于张之洞,有过硬的后台,便忘乎所以,目空一切,处事专断独行,引起同僚的不满,乃至切齿痛恨。有人撰一额一联讽刺他。横额是“梁上君子”,对联是:

一目当空开口便成两片;
念头中断终生难免八刀。

“额”和“联”合起来是“梁鼎芬”三个字。“梁上君子”是盗贼的代称,显然对梁鼎芬有贬损之意。“鼎”字上面是一个“目”字,下面两边各有一个正反的“片”字,所以作“一目当空开口便成两片”。这又暗指他目空一切,信口开河。“芬”字是个“廿”字头(实际上是个艹字头),下面是个“八”字和一个“刀”字,故作“念(廿)头中断终生难免八刀”。这是咒骂他终生要挨八刀,不得好死,骂得痛快淋漓。

梁鼎芬见了怒不可遏,必欲得其人而后甘心。后来被他查出来是门下士尹亚天所作,梁也作一额一联进行报复。横额是“伊内偷人”,对联是:

有心终是恶;
无口岂能吞。

“额”和“联”合起来也是“尹亚天”三个字。“伊内偷人”,即在“伊”字内偷去一个“人”字,便成“尹”字。暗指姓尹的不但是偷东西的梁上君子,而且偷人(奸淫),这就更丑恶了。“有心终是恶”,反过来“恶”字没有“心”字便成了“亚”字,暗指他良心极恶。“无口岂能吞”,“吞”字去掉“口”字就是“天”字,暗含斥责他自不量力,敢与上司作对。这两组额、联针锋相对,都作得十分佳妙,一时传为笑谈。

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梁鼎芬进京觐见慈禧太后,因参劾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奉旨斥责,丢了乌纱帽,但他对清廷仍忠心不贰。他

把自己的书斋改名为“精卫庵”以明志，表明“花可傲霜看晚节；鸟思填海有愚忠”。古代神话传说中，有炎帝之女在东海被淹死，灵魂化作一只小鸟叫精卫，常衔西山的小石和树枝去填东海。他把自己比作精卫，矢志忠于清王朝。



一代枭雄袁世凯曾被梁鼎芬参劾过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他悲痛欲绝，奔赴京师哭祭。因光绪帝生前没有为自己修好陵墓，他的棺材不得不被抬到西陵附近易州的梁格庄行宫暂时停放，等候修陵。每天照例由值班王大臣朝奠一次，其他大臣除节日外不再参加祭奠。唯独已罢官的梁鼎芬长期住在值班公所，每天随班朝奠，风雨无阻，有时甚至痛不欲生，跪倒在梓宫（棺材）前不起来。

他还不顾年迈体衰，为修筑光绪帝的崇陵到处奔走，付出极大辛劳。崇陵竣工后，陵园中没有树，工程合同中没有种树的规定，他一再强烈要求补种，均无结果。为了在崇陵植树，他命人去北京订购了二三百只陶瓷酒瓶，运到西陵。他亲自率领十余人将酒瓶装满崇陵“宝城”上的雪，封上红纸签，上写“崇陵雪水”四个字，再运回京城他的住处。他亲拟了一份说明崇陵必须植树的启事，每天以人力车载雪水瓶，挨家挨户去拜访清朝各亲贵和遗臣之家，送上崇陵雪水一瓶，动员他们捐钱买树苗去崇陵植树。若往访不遇，则留言约定日期再访，在他竭力募捐下，终于使崇陵植满了树，表现了他对清廷、对光绪帝的一片忠心。

更有甚者，在崇陵竣工后，光绪帝的棺材从暂安殿抬入崇陵地下宫殿安葬。梁鼎芬拖着一条病腿，由两个亲随左右搀扶，艰难地送他入地宫，并决心殉葬。当“奉安”之后，人们纷纷撤离地宫时，他却坐下不动，最后还是主管令亲随强背他出了地宫。殉葬不成，他自愿留守崇







光绪帝出殡图


光绪灵柩移入崇陵场景




崇陵是我国最后一座帝王陵墓


光绪帝崇陵明楼



陵，不忍离去。后来，他又亲自选定崇陵附近一块地，买下留做自己的坟墓，嘱咐家属在他死后一定要把他埋在那里，以便在九泉之下继续陪伴和效忠光绪皇帝。

清朝灭亡之后，鉴于他对清廷的一片忠心，废帝溥仪召他充任毓庆宫行走。并赐他“岁寒贞松”匾额，以表彰他对清朝的忠贞，更使他感激涕零，他又把书斋改名为“寒松馆”。1917 年张勋复辟，他虽卧病，仍强打精神，积极参加复辟活动。复辟失败，使他的幻想破灭，梁忧心如焚，不久即一命呜呼，去见他的光绪皇帝了，真是愚忠到死，死不改悔，可悲可怜可恨。

后来他去世后，人们遵从他的遗愿，把他埋在崇陵附近他选定的坟地里。



近代怪才辜鸿铭

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号召学生研究高深学问，不要追求做官发财；强调"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因此，他聘请了当时各方面知名的人才到北京大学任教，其中有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有学贯中西、醉心经史、十分迷恋封建帝制的辜鸿铭等人。



蔡元培像

辜鸿铭（1856—1928年），原籍福建厦门，1856年出生于马来亚。10岁时，随义父布朗赴欧洲，就读于英国爱丁堡大学，获文学硕士。后来又到德国莱比锡大学读工科，取得毕业文凭。接着，他遍游法、意、奥等国，不但英语造诣极深，并通数国语言，精通欧洲文学。并且，他娶的第一个妻子是日本人。



辜鸿铭像

1887年，辜鸿铭过而立之年才回到中国。回国后，他曾任张之洞、周馥幕僚二十余年，后来又担任过清朝外务部左丞。

民国建立后，他应蔡元培聘请，任北京大学教授，专门讲授欧洲文



学史。

辜鸿铭堪称一代怪才。他一生的经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颇具传奇色彩。

从他所受教育与爱好上看，早年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精通欧洲文学，归国后却转而爱好中国传统文化。他由欧洲留学返回中国时，虽已过而立之年，对汉学又缺乏基础，却仅仅凭着对语言文学的特殊爱好及禀赋，终于经过努力自修，居然成为汉学方面的专家。

由于辜鸿铭学贯中西，特别推崇孔子学说，认为这是“贤人的宗教”，因而致力于介绍给西方社会，这使得他在东方著书立说，却在西方备受青睐。他曾译《论语》、《中庸》、《春秋》等经籍为英文；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用英文写了《尊王篇》、《春秋大义》等，特别是他写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战争的出路》一书，认为中国文化较西方文化高，孔子之道可以把欧洲从战争的困境中拯救出来。这使得他的著述日益受到西方的重视，给他带来了相当的声誉与影响，辜鸿铭的名字因此也在西方有了较高的知名度。尤其是在德国，他的著作在书店随处可见。当时，德国文化界甚至认为能代表东方文化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在 1913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诗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泰戈尔（1861—1941 年）；另一个就是中国的辜鸿铭。



辜鸿铭吸引了许多外国著名人士慕名来访。图为 1924 年，印度诗人泰戈尔与辜鸿铭（右二）等人的合影


张勋

尤为奇特的是,这位在国外留学多年,饱受西洋文化熏陶二十来年的堂堂北京大学教授竟在回国后脱掉西装革履,换上前清装束,头发稀疏却硬要编成耷拉着的小辫子,而教的则是欧洲文学史。他还十分赞赏张勋复辟帝制的丑剧,确实是一个古怪的人物。

民国9年(1920年),张勋复辟失败已三年,辜鸿铭对他忠于清王朝、敢于复辟帝制的精神仍十分赞赏。这一年张勋66岁生日时,辜特赠寿联一副,表示祝贺。联云:

荷尽已无擎雨盖;
菊残犹有傲霜枝。

这副对联取自苏东坡七绝中的头两句。原诗是: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桔绿时。

苏东坡此诗本是写景,头两句是衬托后两句的,叫人们不要错过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辜鸿铭把它借来用以比喻政治环境,所谓“擎雨盖”,实际上是比喻清代官员头上戴的顶戴花翎。哀悼清代灭亡,复辟又失败,再也不可能有这种“擎雨盖”了。所谓“傲霜枝”,实际上是指辫帅张勋和他本人脑后的那条辫子,也是赞扬在清代灭亡之后,仍有敢于为复辟帝制而斗争的辫帅张勋。

他虽长期受到西方文化的洗礼,对西方的民主、自由、民权,以及男女平等等观念却不屑一顾。他不但主张复辟,而且鼓吹男人纳妾,并身体力行,自己带头纳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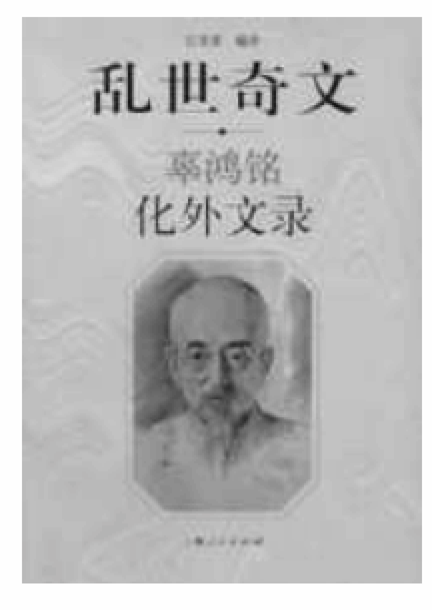
























后人对辜鸿铭性格的重视，不亚于对其学问的关注

有一次,他在英国出席一个上层社会的宴会,嘉宾云集。因他是极力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名人,又是远方来客,备受瞩目。在西方早已实行一夫一妻制,无人纳妾,如有敢纳妾者必成众矢之的。辜鸿铭旁边有一位英国贵夫人,知道辜纳妾,早已耿耿于怀,只是没有机会当面指责他。现在天赐良机,她便义正词严地批判辜的纳妾,指出这是对妇女的欺凌、践踏和犯罪,她代表全体妇女提出强烈抗议。不料辜鸿铭不但不认错,反而满不在乎地笑道:"请你不要激动,我纳妾自有道理。比如一辆汽车有四个轮胎,只要一个打气筒就够了,难道还需要用四个打气筒吗?"这位贵夫人听到他强词夺理的怪论,简直不可理喻,气得说不出话来。



怪人怪杰辜鸿铭



气死袁世凯的糊涂状元骆成骧

在清朝统治的 268 年中，曾进行了 112 次科举考试，产生了 114 个状元。其中第 110 位状元，就是人称糊涂一生、伟大一时的骆成骧。



骆成骧像

骆成骧是四川资州人。他 14 岁成为才童，光绪十八年（1892 年）考中举人，三年后，又考中了进士，成为清代历史上唯一的四川籍状元。

传胪之后，他被授予翰林院修撰。1898 年戊戌变法期间，他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提调。他上台后，热情很高，很快和川籍京官一起创办了蜀学，并企图在文化教育方面搞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骆的行为引起了慈禧太后的怀疑：一方面是由于骆成骧考状元时是否列为第一，考官们意见不统一，最后是由光绪帝定为金榜的；再加之他上台后那么积极地从事兴学活动，这不能不引起刚通过政变再次垂帘听政、且疑心很重的慈禧的注意，并怀疑他是支持光绪帝一派的人物，因此私下里派人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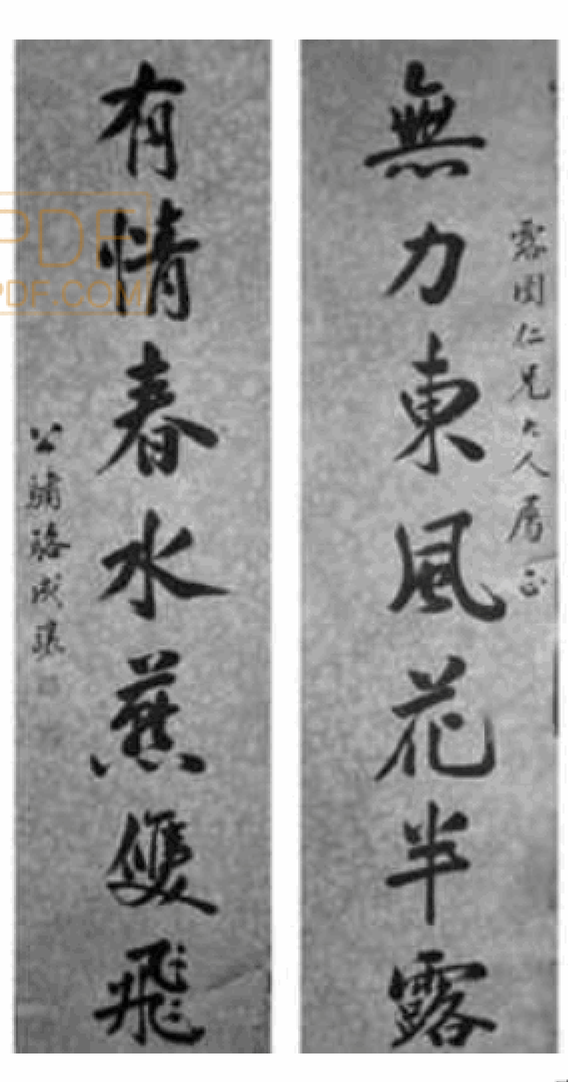
现在文庙里的骆成骧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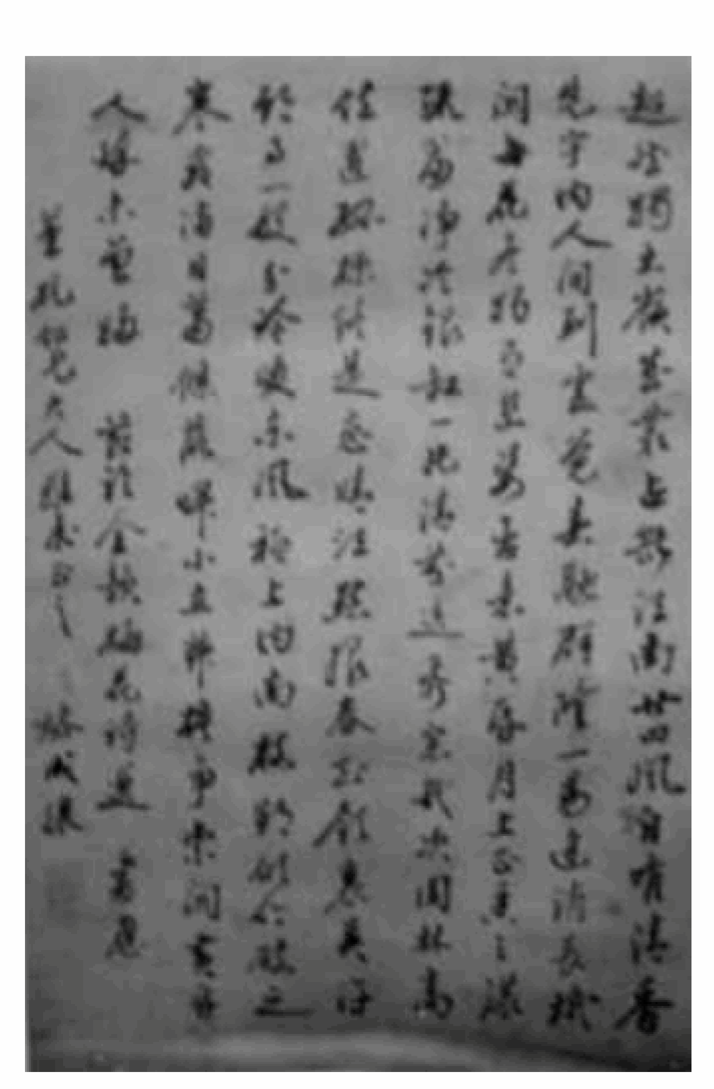
其告退。但骆成骧对慈禧的暗示装作糊涂，不理不睬，这更引起了慈禧的不快。不久，她就以全国举行乡试之名，私下指使人把他放到远离北京的贵州去当主考官。贵州是个穷地方，在当时许多官员看来，根本没有什么油水可捞，所以，把他放到那里，实际上是一种发配。但骆成骧并不就范，而是耍了个小小手腕，告假回乡服丧。三年丧服期满后，他又返回了京师。于是，对其更为不满的慈禧太后又将他派往广西去当主考官，并再次暗示他要自己知趣，主动告退。骆成骧又耍起糊涂来，不说可否就申请了官费，考上了赴日留学生，干脆离开了清朝到日本攻读法律去了。

当骆戴着法学家的桂冠返回祖国之时，慈禧太后已经死去，他的后顾之忧终于解除。由于他善于以糊涂作掩护，人们对其非常敬服，故称其为“糊涂状元”。

他回国后，受宣统帝特旨担任了山西的学政。他认为遇到了明君，决心要报知遇之恩。出乎意料的是，不久清廷就被推翻了，骆成骧悲痛欲绝，几次要投井自杀，都因家人阻拦而未能成功。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携家眷回到成都，做起了寓公。但因经济来源的日益困难，他最后又不得不放下状元的架子，到中小学去教书餬口。但他在所有的活动中仍按清廷的礼仪行事，常被人们当成笑柄，讥为迂腐。







骆成骧墨迹

由于骆成骧的学问和状元的身份，后来相继有人请他出来为官。有一个曾任东三省总督的张享波，邀请他出山主持民政，他婉言谢绝；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也让人劝说骆成骧出来主持四川军政，他又慷慨拒之。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急需党羽，不甘心第一次失败，又让成都令带着他的特旨去邀骆成骧出面相助，并许以更高的官位。骆成骧对袁世凯企图窃国当皇帝的野心十分痛恨，见此纠缠又慨然大怒，对其特使吼道：“我乃堂堂的状元，清国之大臣，怎么能拜倒在你一个野路的皇帝身边！”这位特使落了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虽然这样，袁世凯还未死心，又指示骆成骧的弟子、四川封疆大吏陈某来竭力相劝。陈某不仅没有说服他，反而被骆成骧所说服。骆成骧起草了三道讨袁檄词的电文，并由陈某送袁。袁世凯本想依靠陈的军队、骆的谋略，稳定他在西南的统治局面，没想到骆未笼络到手，反而又使陈反目，真是羞怒至极。当时，袁世凯已内外交困，忧虑成疾，现在又看到了陈某转送而来的骆成骧的讨袁电文，更激起了盛怒，结果，一口气未上来，竟梗阻而死，这件事发生在1916年6月。骆听说袁世凯已死，拍手称快，高兴地说：“我总算为光绪帝杀了一贼，了却了心头的大恨！”



从此,骆成骧隐居成都莲花池街,闭门谢客,以酒消磨时光,终于在悲观和徬徨中死去。他死时身边无一亲人,穷得无棺木,还是依靠社会救济才料理了丧事。

骆成骧是清代状元中唯一的一个留学生,最后的命运竟如此不幸,这完全是他在政治上"不识时务"所造成的。



康有为与爱妾何旃理的罗曼史



康有为像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理论上主张一夫一妻制，但在自己的感情上却是“博爱”型的。他一生中先后共娶了妻妾六房，感情都不错，而情有独钟的是第三夫人何旃理。他与何氏的结合富有传奇色彩，现述其始末以飨读者。

康有为1895年发动举世瞩目的公车上书、1898年领导震惊寰球的戊戌变法，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世界各国华侨聚居的地区。华侨历来有爱国传统，非常关心祖国的命运兴衰，对于救国救民、为祖国富强而拼死奋斗的志士仁人莫不钦佩。对康有为的爱国精神和维新事迹十分感动，他们视之为英雄。

单表美国旧金山附近的非士那，有一位种植果园的何姓老华侨，原籍广东开平，与康有为是广东的大同乡，对康有为更是敬仰。他在家中悬挂康的画像，经常说起康的事迹，感慨系之。他的爱女何旃理，字金兰，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对康有为尤崇敬仰慕，心想若能亲睹这位伟大人物，真乃三生有幸，死而无憾了。

无巧不成书，真是机缘凑巧，康有为自变法失败后，九死一生逃出虎口，流亡海外，到处深入华侨群众中，为救“圣主”光绪帝和继续维新



事业而奔波,成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又叫“中国维新会”。1907 年春,康有为来到美国,同仁在异国他乡为他庆祝五十大寿。他应邀到美国各地讲演,鼓吹君主立宪,在华侨中产生很大影响,赢得不少崇拜者。有趣的是他年届半百却意外地交上了桃花运,演出了一段自由恋爱的罗曼史。

日夜翘望康有为的何旃理,终于盼到了机会。有一天,康有为应邀莅临旧金山讲演,何旃理闻讯喜出望外,怀着对祖国的关心和对康有为的景仰深情,不辞辛苦,跋涉数十里前往旧金山听讲。她见康有为神采奕奕,口若悬河,慷慨激昂,爱国之情感人至深,更加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晚她与康有为单独约见,亲切深入交谈,竟一见钟情,相见恨晚。



何旃理像(徐悲鸿画)

何旃理生于 1891 年,时年方十七。在美国长大的女性,思想开放,盛行自由恋爱,不久,她即主动大胆地向康有为求爱。康见她年轻漂亮,秀气的瓜子脸上有一双会说话的迷人大眼睛,聪明过人,热情开朗,温柔善良,活泼机灵,而且善画花鸟,兼工抚琴,朴实可爱,若能与她永结秦晋之好,自是艳福不浅,不由得心花怒放。康原已有一妻一妾,大夫人张云珠留在香港照顾老母、二夫人梁随觉陪他出游。何小姐与原有的两位夫人相比,更胜一筹。那时中国的男女关系仍十分封建,男女授受不亲,婚姻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康的前两次婚配也未能超脱此模式。但康有为毕竟是革新派,容易接受新事物,出国近十年,受欧风美雨的洗礼,思想更加开放,便入乡随俗,学起西方人谈起自由恋爱来。康与何双双坠入爱河,或花前月下,心心相印,情意绵绵,或鸿雁传情,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不到半年时间已写情书近百封,感情不断升级,已达到如胶似漆、难舍难分的地步。相聚光阴苦短,11 月康将赴欧洲,何正式提出,愿以身相许,陪同前往,



永不分离，康也求之不得。对这门亲事，何氏家中并不十分赞成，主要顾虑双方年龄相差太多，何小姐只有 17 岁，而康有为长她 33 岁，老夫少妻怕难以和谐。何旃理十分坚定，终于说服家人，正式举行婚礼，然后比翼齐飞。

婚后夫妻感情极笃，“日夕相对，舟车偕行，航海梯山，问学议政”，形影不离。他们一起望海观山、闻花赏月，“步海沙、攀松石”，共享爱的欢乐，使康忘却客居异国的寂寞。何氏不但在感情上给康最大的满足，而且她通晓英、法、德、中四国语文，康虽出国多年仍不懂外文，她便成了康的随身翻译和秘书，佐夫交际应酬，开展事业，成为得力的助手。共同的事业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原来随行的梁夫人，自然退居“二线”，以料理家务、照顾起居为主。

次年（1908 年），梁、何二夫人先后有喜。康早年曾生两个男婴，可惜均早夭折，故此膝下尚无男儿，切盼她们能生下儿子。10 月，他们特地前往冬季温暖的槟榔屿待产。11 月，把居住香港的老母劳太夫人接来同住。12 月，梁夫人生下第三子同篯。次年 1 月，劳太夫人要回港，何夫人也将临盆，便一同回港，于 1 月 25 日生下第四子同凝。康有为老年连得二子，喜出望外，也给康家带来无限欢乐，家人无不额手称庆。

1911 年 6 月，康携梁、何二位夫人重游日本，住在梁启超的双涛园，并在临海的地方自筑小楼一座，名曰“天风海涛楼”。新居落成，乔迁之夕与何夫人“倚窗望月”，怡然共乐。11 月，何夫人又生一女。据说她梦火入窗而生，故起名同琰，是康晚年最钟爱之女。同琰不幸于 1928 年因车祸惨死在上海愚园路家门口，年仅 18 岁。1923 年冬康携眷归国为母治丧，随后定居于上海新闸路辛家花园。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料何旃理随康回国定居仅一年多，竟于 1915 年 1 月 19 日患猩红热而与世长辞，年仅 24 岁。这对康有为是极大的打击，他抚棺痛哭，肝肠寸断，悲伤欲绝。他茶不思、饭不想，追忆喜结连理短短不满八年的恩爱深情，历历在目。何氏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眼前，使他精神恍惚，夜难入眠。至第十天子夜，刚就寝，忽



梦见金光满室,现出一尊金身女神,愈走愈近,定睛细看,竟是日夜思念的爱妾何旃理,突然惊醒,当即写下《金光梦词》,倾吐相思之苦。下笔千言,述其爱情经历曰:“卿年十七我五十,岂意婚合耶输罗。……中国女子廿龄者,知识阅历惟卿多。……吾乃文魔多伤者,触我慧想度爱河。”词情哀婉。

何氏生前所绘国画多有康之题词,她死后康睹遗画,更勾起他的情思,继续为其画题诗,以寄托哀思,其中有一首云:

浓艳凝香带叶妍,粉痕墨晕态犹鲜。
而今落尽残红后,读画题诗更惘然。
一枝浓艳发遗香,剩粉残笺空断肠。
色相华严常示现,殿将画谱拾群芳。

与其说题画赞画,毋宁说题人赞人,抒发他的无限恋情。此后每逢何氏的周年忌日,他必亲临祭奠,涕泣跪拜,终生不渝,足见他们感情之深。起初将何氏的棺木葬于杭州西湖附近,1920 年移葬于江苏茅山之成村。



康有为的妻妾

在近代中国，有一些人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言行不一。主持维新变法的巨人康有为也是其中的一个。

别的不说，单从他所主张的男女平等自立、妇女解放这方面来看，就是如此。他极力赞美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坚决反对“一夫可娶数妇，一妇不能配数夫”，说这与“公理不合，无益人道”。可是，他自己却先后娶妻妾达六个之多，并且在晚年竟“挟妓游湖”，惹出不少风流韵事，被人们传为笑柄。在他 62 岁时，还娶了一个刚 20 岁的黄花少女为小妾。因此，连他的弟子在其死后也批评这种言行不一的坏作风，指出：“先生日美戒杀，而日食肉；亦称一夫一妻之公，而以无子立妾；日言男女平等，而家人未行独立；日言人类平等，而好役婢仆；极好西学西器，而礼俗器物语言仪文皆坚守中国；极美民主政体，而专行君主；注意世界大同，而专事中国。凡此皆若甚相反者。”

康有为一生共有 6 位夫人，14 个子女，其中自育 12 个，收养 2 个；男 4 个，女 10 个，长大成人的 8 个，夭折和早逝的 6 个；有外孙子女 24 个。因他得子较晚，去世时两个儿子均未成亲，他临死时为不能亲抱内孙而深感遗憾。

康有为于 1877 年 1 月成家，当时他 19 岁。发妻张云珠（1855—1922 年），字妙华，是候选同知张玉樵之女。这是一桩由双方父母包办





康有为全家照,1921 年摄于上海愚园路游存庐。中排右起:五夫人廖定征,四夫人市冈鹤子、元配张云珠、康有为、二夫人梁随觉、六夫人张光、女儿同环;前排右起:同令、同錢;后排右起:女儿同复、女婿潘其璇

而成的婚姻。张夫人比康有为大三岁,但性情温顺贤惠,“终日勤勤,无稍暇”,尽力支持康有为的事业。夫妻感情融洽,婚后生下四女一男,仅存活长女同薇(1879—1974 年)和次女同璧(1881—1969 年),其他三位不幸早逝。元配张夫人于 1922 年 6 月 16 日去世,当晚她还去看戏,“夜半忽坐化而终”,享年 68 岁。康有为与结发妻相随近半个世纪,感情很深,亲自为其执拂送丧,亲自撰写祭文和墓志铭。

在 1897 年当康有为 40 岁时,元配张夫人已 43 岁了,眼看生子无望,为了传宗接代,康有为便纳梁随觉(1880—1969 年)为妾,年方 18 岁,貌美且颇通文墨,深得康有为庞幸。但新婚两个月,康有为就赴北京领导变法,经年难归。戊戌政变后,康有为逃亡香港,在友人的帮助下,亲属也分别被送到港澳,康有为才得以同家人团聚。在安顿初定后,康有为便携带年轻的爱妾梁夫人出游日本等地,而张夫人则在香港照料康家老母、二姐和儿女们。康有为的第二位夫人梁氏,为康有为生育二子二女,其中一子未弥月而夭折。



1907 年春，康有为到美国各地演讲，鼓吹君主立宪，在华侨中赢得了一批崇拜者。特别是在旧金山附近的非士那，有一位姓何的果园种植主对康有为非常敬仰，他的爱女何旃理（1891—1915 年），字金兰，年方 17 岁，受父亲的影响，对康有为也十分崇敬。当康有为到旧金山讲演时，何旃理竟一见钟情，不久即结为连理，比翼双飞，这是康有为通过自由恋爱而结婚的第一位夫人。（详情见本书《康有为与爱妾何旃理的罗曼史》一文）何夫人为康家生了一子一女。

1911 年 6 月，康有为携梁、何两位夫人重游日本。翌年，雇了一个 16 岁的日本少女当女佣，她就是市冈鹤子。鹤子勤快知礼，服侍周到，深得康氏一家好感。1914 年夏，康有为举家迁回上海定居，但康有为念念难忘留在日本的鹤子。三个月后，鹤子接到康有为的亲笔信，邀她赴上海做客。在征得父母同意后，鹤子欣然赴沪。鹤子在康家住下后，康有为又恳切要求鹤子留下来，不要返回日本，鹤子也高兴地答应了。

不久，鹤子名正言顺地成了康有为的第四位夫人。康有为得到了这位年轻的东洋夫人后，常偕她游苏州，逛杭州，夏天到青岛去避暑，并一起去洗海水浴，一起到古寺参禅拜佛。但鹤子比康有为小 40 岁，夫妻生活不协调是可想而知的。鹤子与康有为的儿子同篾年龄相差不太大，两人朝夕相处，竟生情爱，终致怀孕。1925 年鹤子因此悄然返回日本，不久生下一女，取名绫子。后来，康家曾致信于她，她不仅不回信，反而隐姓埋名达 50 年之久，直到 1971 年她才将这段隐情告诉一位挚友，并被披露于世，这造成鹤子于 1974 年 2 月 19 日在家乡附近卧轨自杀身亡。

1913 年 8 月，康有为 83 岁的老母亲逝世，紧接着，在 1914 年 3 月与康有为感情最深的仲姐逸红又病亡，尤其使康有为悲痛欲绝的是年仅 24 岁的爱妾何旃理因患猩红热，于 1915 年 1 月 19 日在上海寓所与世长辞。康有为连遭三丧，肝肠寸断。特别是他最宠爱的何夫人的辞世，更使他万分悲痛。为了填补心灵上的空虚，康有为在 1915 年冬天又娶廖定征为第五位夫人，次年她为康生了一女，因患肺炎，女儿仅活



了 12 岁。

1918 年，康有为参与张勋复辟失败后，失意无聊，竟“挟妓游湖”。有一次在游西子湖时，他遇到一位花容月貌的杭州西湖船家女张光，小名阿翠，年纪十五六岁，父亲早逝，尚未婚配。康有为不顾年逾花甲，重金聘媒人尽力撮合，张家见康有为有地位又有钱，最终答应了。1919 年康有为在上海游存庐举行了婚礼，亲朋贺客不少，由于妻妾儿女们均不赞成这门亲事，以集体不参加婚礼相抵制。婚后，康有为对妖娆小妾倍加疼爱，遗憾的是康有为年事已高，结婚多年不能生育，便于 1927 年春，将刚出生数日的侄女认领为张光小妾的女儿，这便是康有为的第十女康静谷。



康有为晚年在上海愚园路

1927 年 3 月，康有为刚过完自己的七十大寿，于 3 月 31 日晨 5 时 30 分猝然长逝于青岛福山路寓所，其爱妾和子女们大多留在上海，因事出突然，弥留之际竟未能见上一面。



康有为的妙联

康有为文才出众，不但是散文大家和杰出诗人，同时也是作对联的高手。他的诗文多有传世，而对联却较少流传，现摭数联，以窥一斑。

早在他6岁时即已显露其才华，有一天，父辈们到书房了解他的学习情况，想考考他的才学，当时正是柳絮纷飞时节，便出“柳成絮”三字让他对对子。这个题目不大好对，不料康有为不假思索，便应声对以“鱼化龙”。对得极妙，不但字字对仗工稳贴切，无懈可击，而且思想境界很高，表达了他有远大的志向，这条小鱼正在努力学习奋斗，盼望将来有朝一日化为横空出世的巨龙。他的对子使在座的长辈们万分惊喜，他的老师康达棻更是极力夸奖说：“此子非池中物。”赏给他纸笔等学习用品，以示奖励。此事不胫而走，传遍南海县，康有为被人们誉为“神童”。

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逃亡海外，谭嗣同、刘光第等“六君子”遇难，噩耗传来，康有为万分悲痛，为他们撰写了挽联，其中挽谭嗣同联曰：

复生，不复生矣！
有为，安有为哉？



谭嗣同像


杨锐像


林旭像


刘光第像


杨深秀像


康广仁像

挽刘光第联曰：

死得其所，光第真光第也！
生沦异域，有为安有为哉？

康有为在此二联中把谭嗣同、刘光第和自己的名字都嵌入联中。上一副对联哀悼复生（谭嗣同字复生）为变法而壮烈牺牲；下一副对联赞颂刘光第为维新而死，是“死得其所”，无上光荣，足以光耀自己的门第。两副对联都感叹他自己“回天无术”，不能完成维新变法的伟大事



业，不能使国家富强，如今流落异邦，无所作为，深感遗憾。

这两副挽联都采用重复句式，每句中都有二字重复，而且前二字和后二字的读音完全相同，而意义却完全不同。前者都是人名，后者则不同，即前一个“复生”是指谭嗣同，后一个“复生”是恢复生命的意思；前一个“有为”是指康有为，后一个“有为”是有所作为的意思；前一个“光第”是指刘光第，后一个“光第”是光耀门第的意思。用得十分巧妙。

康有为晚年曾为袁督师庙和墓堂题写楹联，庙联曰：

其身势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
闻鼙鼓思东辽将帅，一夫当关，隐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



墓堂联曰：

自坏长城概古今；
永留毅魄壮山河。

袁督师即袁崇焕，他是明末著名的爱国将领，屡次击败后金的进攻，督师蓟辽，立下赫赫战功，使敌人闻风丧胆，故后人尊称他为袁督师。因明朝崇祯皇帝误中敌人的反间计，将他杀害，自毁长城，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康有为的弟子张伯桢与袁崇焕是广东省东莞的同乡，为了表彰袁的功绩和爱国精神，使后人得以瞻仰，在北京龙潭湖北岸，原袁军总部所在地修建了袁督师庙。康有为以崇敬的情怀为该庙题写了门额、门联和《袁督师庙记》，热情讴歌袁崇焕的爱国精神。赞扬他一身“系中夏存亡”，“死重泰山”，配得“千秋享庙”。并在墓堂联中慨叹崇祯帝“自坏长城”，诛杀忠良，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祸及国家人民。这些题联石刻至今犹存。

康有为晚年在上海、杭州、青岛等地大兴土木，建造别墅，并为这些建筑题写了许多楹联。他在杭州西湖边的丁家山上建造的大型园林叫

"一天园",湖光山色,风景极美,亭台楼阁错落有致,自认为是得意之作。历时四年,于1923年竣工,他为"一天园"题联曰:

褊性合幽楼,南山中看射虎;
谢事就闲旷,西湖上可跨驴。



他为园中的桃园亭题楹联曰:

花开花落可天意;
避地避世忘人间。

又为园中的"开天天室"撰写六十四字长联曰:

陵谷多贸,沧海多变,宗教多劫,国土多沦,高阁鸡虫看得失,无一物当情,觉来栩栩;
天地不大,毫末不细,大椿不寿,朝菌不短,微尘世界何爱憎,观我身自度,想入非非。

次年,又在上海吴淞江边杨树浦所建的一座小别墅题联曰:

微官共有田园兴;
晚岁犹存铁石心。

以上对联都反映了他晚年因政治上失意,看破红尘,消极厌世,躲避现实,营造"安乐窝",追求田园情趣的思想情绪。他以不问世事、隐居山林为乐,与早年的奋发向上、以国家为己任的精神完全相反。然而他在表面上欢乐陶然的背后,仍然浮现出无法解脱的政治上失意的阴影,实际上是无可奈何的自我解嘲,难掩他失落的凄楚。

康有为爱好旅游，所到之处，就在许多名胜古迹上题对联。民国初年，他曾四次游览苏州，见名园多废，“不胜历劫之感”，庆幸拙政园安然无恙，高兴地题写对联曰：

松柏有本性；
金石见盟心。

至今仍悬挂在拙政园小飞虹桥堍亭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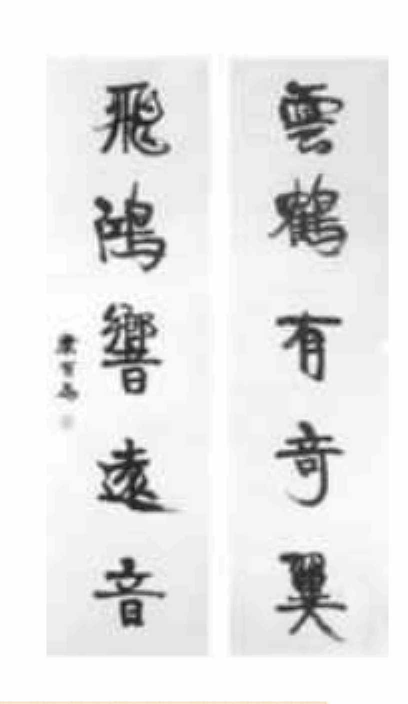
1920年，他为杭州西湖三潭印月的御碑亭题写了七十六字长联曰：

岛中有岛，湖外有湖，通此九曲画桥，览沿湖老柳，十顷荷花，食莼菜乡，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尝见；

霸业销烟，禅心止水，阅尽千年陈迹，当朝辉暮霭，春煦秋阴，山青水绿，坐忘人世，万方同慨更何之。





康有为手迹

联中描写了从湖心岛御碑亭纵览西湖美景，那柳浪闻莺，曲院风荷，九折画桥，山青水绿，风景如画，真是“四洲游遍未尝见”，令人陶醉，使人“坐忘人世”。康有为通过一副对联把西湖美景写得淋漓尽致，令人向往。



1923 年,康有为游览了七朝古都开封,在游龙亭时,撰联曰:

中天台观高寒,但见白日悠悠,黄河滚滚;
东京梦华销尽,徒叹城郭犹是,人民已非。

他哀叹朝代更替,如黄河滚滚东去,无可挽回;借咏叹建都开封的宋、金等故国的沦亡,感叹清王朝的覆灭。

1926 年,康有为在上海创办了"天游学院",自任院长和主讲,他特地在教室内悬挂亲自手书的对联:

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
知周乎万物,仁育乎群生。

此联体现了他的大同思想,并要以这个思想来教育培养学生。他既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失意,也只好寄托于诸天之游和天下为一家的理想。

康有为最后一副对联,是 1927 年 3 月 8 日(二月初五日),在庆祝他七十大寿时所撰的自寿联,联曰:

天乎百亿千万劫;
丘也东西南北人。

此联概括了他历尽千难万劫的坎坷一生,表示要学习孔丘孔圣人做一位东西南北人。可惜过完生日后,只活了 23 天,便在 3 月 31 日(二月二十八日)逝世于青岛福山路寓所。



康有为 1923 年到青后购此屋居住,题名为"天游园",1927 年他病逝于此

康有为、梁启超脱险记

1898年戊戌政变前夕，北京城里气氛十分紧张，种种谣传四起，光绪帝急忙传密诏要康有为等维新志士火速离京出逃。

康有为是9月20日凌晨4时乘火车逃离北京城的，当日黄昏抵塘沽，拟乘招商局的海晏轮南下，因无上等舱了，而且此轮要到次日下午4时才开航，康有为便决定改搭英国太古公司的重庆轮，于21日上午11时就起锚南下。这时，北京城里正为搜捕康有为整整闹腾了一天。后来，方知康有为已离京，将由天津乘船南下。慈禧太后当即电令停开京津火车，并急电天津，令荣禄严密查拿；又令烟台、上海等地方官员“于轮船到时，立即捕获”。

21日下午，荣禄得到抓捕康有为的消息后，马上调集人马遍搜津沽各码头客店，但康有为已随重庆轮启程多时了。



荣禄像

重庆轮在烟台港要停泊几个小时，康有为从容登岸，远眺海景，怡然自得；俯拾海滨五色石，兴致盎然；还选购了几篓上好的烟台苹果，悠闲自乐。当时，拘捕康有为的电令已到烟台，碰巧驻烟台的道员因事外出，留守的官员不便擅自译出电旨。当道员获电令赶赴港口时，重庆轮早已南下了。这时，荣禄自天津派飞鹰快艇追逐而



来,时速超过重庆轮一倍,本可追上,因燃料不足,无法继续追赶,只得中途折回,康有为又一次侥幸地从死亡线上挣脱。

重庆轮乘风破浪驰向上海,康有为一路上兴趣很高,时常挺立于船头甲板上,观景吟诗,殊不知上海早已撒下了天罗地网。



刘坤一像

上海道台蔡钧在接到慈禧密电后,洗印了许多张康有为的相片,分发给缉捕人员,并悬赏2 000元;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刘坤一又悬赏3 000元,定要生擒康有为。这样,每艘抵沪的船只均受到了严密搜查。同时,蔡钧又请求英国驻沪代总领事白利南准许他派人搜查自天津开来的所有英国轮船,却遭到了拒绝,白利南只答应自派巡捕查缉,蔡只好将康有为的相片给他,请其配合抓捕。



李提摩太像

重庆轮定于24日抵沪,上海的军警差役、中外捕探一齐出动,如临大敌,整个码头早已被围得水泄不通,静待康有为自投罗网。

幸亏在京的梁启超和徐仁镜在21日下午,就去找一向拥护和支持中国维新变法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他设法援救处于危难中的康有为,李的中文秘书程清也从旁劝说,李提摩太终于答应了,并致电白利南,请他务必设法相救。因此,白利南就以“希望避免因政治犯康有为倘若在英国船上或上海租界被中国官员捕获而可能引起的困难问题”为由,征得英国政府同意后,于24日清晨派上海工部局职员濮兰德乘驳船前往吴淞口,拦截将抵沪的重庆号。濮兰德借助上海道台蔡钧留下的康有为相片,在旅客中顺利地找到了康有为,当他把蔡钧请求协助拘捕康的信件出示后,康有为才知大祸临头,并想投海自杀以殉“圣主”光绪帝。在濮兰德的劝说和帮助下,康有为转乘驳船,被送到停泊在吴淞口外英国轮船公司的“巴拉勒特”号轮船上,两天后乘该轮逃离了上



海。29 日晚 7 时平安抵达香港。

24 日下午 2 时，重庆轮抵沪，码头上守候多时的军警蜂拥而上，却只找到了康有为留下的几篓烟台苹果和一只装杂物的篮子。

对于这一场精心的安排，梁启超曾说：“先生（康有为）与英使馆及上海英领事无一面之识，英人之相救，非惟出中国官吏之意外，并出先生之意外。”

康有为离京后，梁启超怕老师在途中遇险，曾多方托人给予救援。当他特地到日本使馆求援时，谈完了话就准备离去，日本公使问梁：“你还能出去吗？”梁启超轻松地答道：“政府痛恨的就是康有为，我们其他人无所谓。”日本公使说：“错了，据我所闻，这回政府对于维新党人要一网打尽，你暂在这里听消息吧。”梁启超才意识到情况不妙，只好躲在日本使馆。



青年梁启超像

几天后，日本人为他剪发易服，化装一番，送往天津日本领事馆，再由一位武官陪同，用舢板送往停在塘沽的日本商船。清廷获悉梁启超出逃，急忙派杨以德带兵乘一条小轮船追赶。小轮船终于追上并拦住了舢板航道，杨因为没见过梁启超，指着梁问日本武官：“他是谁？”武官不动声色地答道：“是我的学生。”又问：“你们到哪里去？”又答：“往塘沽打野鸭子。”杨半信半疑，决定把他们押回天津问讯。他用一根绳子把小舢板绑在小轮船上往回拖。碰巧遇到退潮，逆流而上，行船十分艰难。日本武官趁机对杨说：“你真笨，往下驶一点就是塘沽，到塘沽搭火车回天津多好。”杨一想，认为不错，乃令小轮船向塘沽方向行驶。

当时，有一条日本兵船正驻防在塘沽。日本武官望见兵船，即暗地打了一个信号，兵船马上开过来迫令小轮船停驶，然后日本武官和梁启超一起上了兵船，杨不敢干涉。就这样，大名鼎鼎的维新派第二号首领梁启超在清廷官员的眼皮底下逃往日本去了。



康有为提倡保护文物古迹



《康有为政论集》收录有《保存中国名迹古器说《（1913 年 4 月）》一文

康有为一生酷爱文物，曾大声疾呼保护文物古迹。他于 1904 年写了《我国保存古物不如罗马篇》，1913 年又发表了《保存中国名迹古器说》，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保存文物古迹的重大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可以教育鼓舞人们向英雄贤哲学习，继承发扬他们的事业，使国家富强。他说："人之性，不感不发，不触不动。"保存有关英雄贤哲的建筑和器物，宣传其事迹，"足以启发国人之聪明，感动国人之心志"，使人才辈兴，所得多矣！他列举张衡的地动仪，诸葛亮的木牛流马，祖冲之的轮船等发明创造，不能传于后世，而使中国陷于落后。这是国人"不知崇敬英雄，不知保存古物之大罪也"。

第二，"可以著耀中国之文明"，维护国家的形象和国际地位。他称赞罗马重视保护古迹，"令大地过客皆得游观，生其叹慕"。中国也是文明古国，不知爱惜古迹，"令我国一无文明实据"，使外国人"尊称罗马，而轻我无文"。这是"国体攸关"的大事，"安可以堂堂大国之中华为人藐视乎"？

第三，可以开拓知识，提高审美水平、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他说文物古迹可使人们“增加文美，浚发智巧”，“明审美之原”，摆脱野蛮，而臻于文明，若文明竭尽，人民就会“盲瞽而无知”。

第四，它是极好的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可以增加国民收入。他介绍日本、法国利用古迹发展旅游事业的经验，说日本每年旅游收入达二三千万，法国巴黎一地每年可以从外国游客身上收入十万万。“所得金钱，以资国民，亦不少矣！”认为“今之新法，以饰名迹，盛游历，亦为国民生计之一道焉”。

他强烈谴责中国历代统治者破坏文物古迹的罪行，同时批评国人破坏文物古迹的野蛮行径：“地址则开之以增民居，文石则移之以为壁础，金则融之以为钱饰，纸则烧之以为炊爨”。当时有人拟将奉天（沈阳）宫殿所存古物售为国用，更激起他的满腔怒火，痛斥此举“实与卖国无异，我国人当以公愤而公保之。有售卖者，当视为公敌可也”。

他建议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在各省府县镇都设立博物院、图书馆和保存古迹古器会，作为保护文物古迹的机构。广泛收集，严密保护，加强宣传，设立导游，广招外国游客。尤其是古都北京，宫殿宏伟，“实万国之所无，其坊庙实为吾国数千年之大典，其苑囿窈窕，亦冠绝东亚，而为大地之特色焉。其他彝鼎图书……此皆吾国之瓌宝，数千年之精华”。应该修饰保护，选择一二处开博物院，翰林院、国子监之类，宜开辟为图书馆。其次的可开辟为公众游览之地，再次的也应保存空屋败墙，不卖不拆，不改作他用，不租给人，并雇人看守。这些主张颇具远见卓识，后来多被采用。



《康有为经典文存》书影





梁启超之死

梁启超早年与康有为等从事维新变法活动,被世人称为"康梁",成为著名的维新派首领之一。

晚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执教。他学识渊博,研究领域很广,谈论包罗万象,著作内容宏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哲学、新闻、艺术、语言文字、宗教等,融汇经史,贯古通今,学术上颇有造诣,深得学生敬重。



清华国学院导师王国维、梁启超(前排右二)、赵元任、李济等合影

在1929年的某一天,梁启超授完课后,偶觉腰部有疼痛感,决计去医院检查一下。梁启超素来崇信西医,所以就去协和医院诊病。医生让他去作肾囊造影,造影显示出左肾有黑斑一块,经过外国医生会诊,



确诊为右肾生瘤。当时,“伦琴”透视刚刚问世,经X线照射,犹如亲见肺肝,不要说崇信西医的梁启超,就是一般的中国人也坚信不疑。于是,梁启超就决定恪遵医生的诊断,切除有黑斑病变的左肾了。



著名医学家肖龙友

在手术前,梁启超特意先到其好友、著名中医师肖龙友家去,请肖先生一诊,征询意见。肖龙友医术高超,深孚众望,被誉为北京四大名中医之首。上至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下至一般平民百姓,无不对他敬重万分。就连那些轻视我国中医中药的洋医院、洋医生,对肖先生也都刮目相看。

经过认真切脉诊断,肖先生一味摇头,并斩钉截铁地对梁启超说:“肾脏无病!”并规劝梁启超切勿草率从事,不要听信洋医生的话,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深信西医的梁启超却不以为然,还戏谑地开玩笑说:“战士死疆场,教师死课堂,死得其所,何惜之有?!”不肯相信肖先生的诊断,也不听从其劝告。

接着,梁启超就去协和医院动了手术。果然不出肖先生所言,打开腹腔一看,只见肾囊完全健康。由于梁启超已年老体衰,动了这次大手术后,竟很快溘然长逝了。中国叱咤风云的一代英才就这样死于外国庸医之手。



两度死里逃生的徐致靖

1898 年 9 月 21 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将光绪帝囚禁起来，并逮捕了许多维新派官员。康有为、梁启超等逃得快，才免于一死。谭嗣同自愿抛头颅洒热血以唤醒民众继续维新变法事业而不肯逃走，于 24 日与徐致靖等人一起被抓进了监狱。

残酷的慈禧太后决心非处死他们不可，而第一个就是徐致靖。当李鸿章听到风声后，十分着急，决计设法营救徐致靖，因为李鸿章与徐致靖的父亲是密友，又是同科进士。他想来想去，只有去求助于慈禧的红人荣禄。荣禄见是李鸿章来托情，碍于面子，只得去请求慈禧太后开恩。不料，慈禧大怒，责怪荣禄怎么也敢来为帝党人士开脱。荣禄马上跪在地上，按照与李鸿章商定的主意，呈诉道：徐致靖是个书呆子，根本不懂得新政，只是同维新派在一起玩玩围棋、唱唱昆曲而已。在宣布维新后的三个月里，皇帝一次也没有召见过他。慈禧不信，立即派太监去查询。因皇宫中有规定，皇帝的起居和召见任何人等都有记载，一查便知。果然，太监回报说，三个月内光绪帝确实一次也没有召见过徐致靖。这下慈禧太后脸上才稍有转色，再加上荣禄是她最宠信的人，既然他都出面求情了，就赏个面子吧。因此，改判徐致靖为永远监禁（即无期徒刑），并阴沉沉地扔下一句话说："让他老死在狱底吧！"这样，1898 年 9 月 28 日，在北京菜市口斩决的帮助光绪帝推行新政的要犯，就只



有谭嗣同等六人了，这就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



张元济（1867—1959年），中国近代出版家、版本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家、藏书家

其实，徐致靖（1826—1918年）思想开明，积极拥护维新变法，曾向光绪帝上奏过有名的《人才保荐折》，秘密保荐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张元济等维新志士。由于他的保举，光绪帝一一召见这些维新志士，并加以重用。同时，徐致靖还上奏请求皇上“明定国是”，推行维新变法。并陆续奏请废八股，改试策论，裁汰闲官散卿，请开编书局等奏折多件。直到政变的前几天，他还上折保康有为等人为顾问。对于这一切，慈禧太后是知道的。因此，慈禧欲置徐致靖于死地之心一直未变，她虽然同意将处决的人由七个改为六个，仍总想找机会铲除掉这块心病。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慈禧在逃离京城时，下令要处决一批要犯，徐致靖的名字又被列入了名单之中。由于八国联军进军迅速，慈禧自己出逃得又太匆忙，来不及处置这批要犯。徐致靖才又一次逃脱厄运，反而得以“出狱待罪”，不久获赦免。

徐致靖出狱后，一直居住在杭州，并改名为徐仅叟，意思是在戊戌政变中没有同“六君子”一起被杀害，是从屠刀下仅仅存活下来的唯一老人。



严复的政治远见

严复，福建侯官(今闽侯)人，字又陵，又字几道。曾留学英国，以介绍和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而闻名于世，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但却较少有人知道他在许多重大历史关头，对重大事件颇有远见，极具洞察力，能预先透析其成败，其真知灼见非常人所能及，现举数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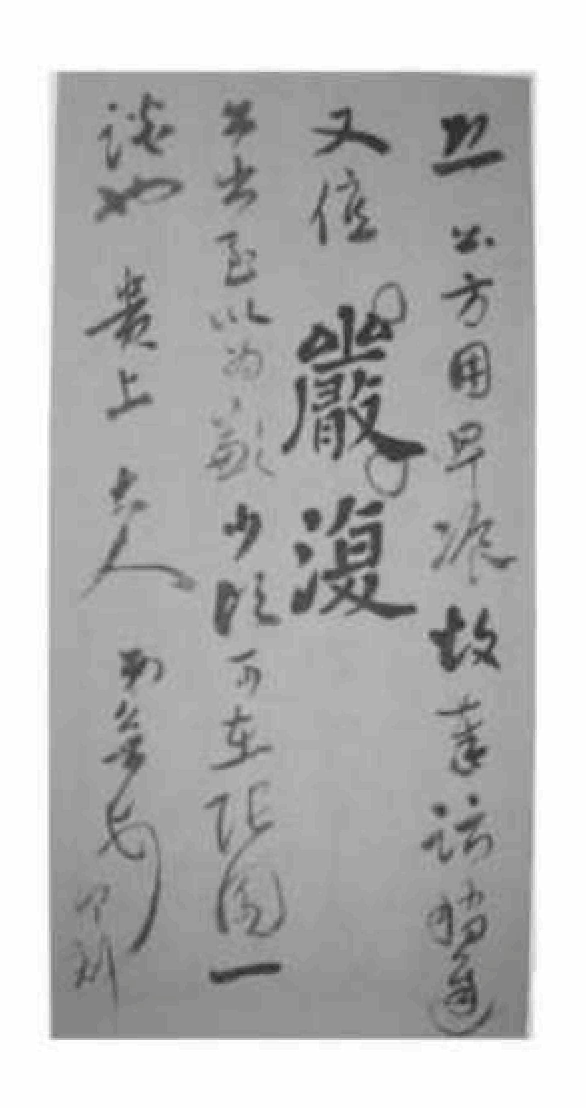
严复像

1915 年，袁世凯如日中天，一心要复辟帝制。杨度等发起成立筹安会，为袁恢复帝制效劳。为借重严复的声名，他们邀严加入筹安会，作为发起人之一。严洞察袁世凯称帝必败，故坚决拒绝加入鼓吹帝制的筹安会。杨度致书于严，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筹安会事，实告公，盖承极峰(指袁世凯)旨，极峰谕非得公为发起人不可，固辞恐不便，事机稍纵即逝，发起启事，明日必见报。公达人，何可深拒？已代公署名，不及等复示矣!”次日，筹安会启事，果然登诸各报端，杨度私自把严复列在发起人第三名。生米煮成熟饭，严复也无可奈何，只好从此称病谢客，杜门不出，不参加任何活动。事情的发展，果不出严复所料，短命的洪宪帝制，只维持了 83 天，便宣告彻底失败。但严复仍摆脱不了拥护袁世凯称帝的恶名，真是冤枉。

1917 年，张勋复辟，严复又坚决反对，并预见复辟必败。他精辟地



指出:“复辟非惟无补于苍生,抑将从诟于清室,名为爱之,实以害之……须知清室若可再兴,则辛亥必不失国。”事实又如严复所料,张勋复辟只 12 天,便以失败而告终。



严复的名刺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气焰极为嚣张,军事上也节节胜利,攻占了不少国家和地区。当时很多中国人都认为德国必胜,反对对德宣战。严复却不以为然,他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透彻分析道:“西方一个德国,东方一个日本,都像我国古代的秦国,只知道有权利,而不信有礼义公理。德国有少数人借《天演论》学说,自认为是优等民族,可以征服劣等民族,说战争是人类进化不可缺少的作用,这是一种谬论。”

他还说:“我国有如此灿烂的历史和众多的人口,如果有雄杰起而用之,可以无敌于天下。可惜长期以来同室操戈,残害人民,足令人痛心。”他预见像德国、日本这样违背公理、依恃强权对外侵略的国家,尽管猖狂一时,最终必遭失败。

严复为《天演论》写的序言(部分)

果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打了四年多,德国就垮了,遭到可耻的失败。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和日本又重蹈覆辙,同样以失败而告终。这些使人们不得不佩服严复的远见卓识。



洪宪帝制活动中的袁克定

袁克定是袁世凯的长子，在洪宪帝制活动中，是一个活跃非凡的人物。

1915 年时，袁克定已 37 岁。他对于袁世凯的帝制活动非常热心，甚至比袁世凯还积极。因为这是直接关系到他个人终身荣耀的问题，长子即皇储，这个多少汉族朝代的祖制，他是明白的。

为了实现帝制的企图，他在许多方面进行活动，首先在文人中把积极逢迎的杨度拉到了自己的一边。杨度在前清时期始终没有得到飞黄腾达的机会，这次从袁世凯的身上嗅到了帝王的气息，所以，对袁大公子的拉拢立即迎合。他称袁克定为当代秦王李世民，将来这位“李世民”当了皇帝，当然亦少不了自己的高官厚禄。正因如此，杨度很快成了袁世凯帝制运动的鼓吹手。



袁克定像



杨度像

除杨度而外，袁克定又拉拢著名学者、政治理论家梁启超。1915 年 1 月，袁克定约梁到汤山赴宴，只有杨度一人作陪。席间，袁克定大谈了一通共和制度不适宜中国国情的言论，话语之间



是探询梁启超的意见。可是,梁启超却言词婉转,左顾而言他,没有正面回答。等他从汤山回到北京,就率家移居天津,溜掉了。梁启超后来回忆这次谈话时说:“先是去年正月,袁克定忽招余宴。至则杨度先生在焉。谈次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求我赞同之意。余为陈内部及外交上之危险,语既格格不入,余知祸将作,乃移家天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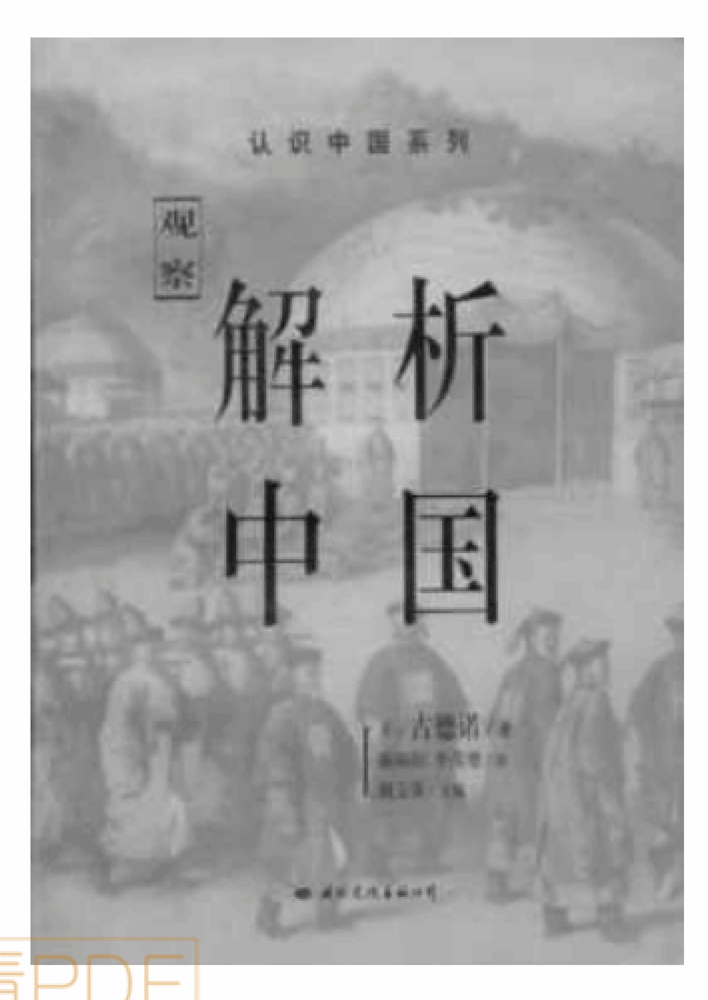
1915 年 1 月 18 日,日本方面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作为支持其称帝的条约。面对如此苛刻的条件,袁世凯一度产生了拒绝条约、停止帝制的想法。为了促使袁世凯坚定实施帝制的决心,袁克定开始了一次政治冒险活动——为袁世凯编印假《顺天时报》。当时北京有一份日本外务省出版的汉文报纸,即《顺天时报》,它是日本政府在华的主要舆论工具,当然反映着日本政府的立场和观点。袁世凯在空暇之余总喜欢翻阅它。为了影响袁世凯,袁克定纠集了一帮文人,每天编制一份假版的《顺天时报》,并严格地控制真版《顺天时报》进入中南海,然后发送他的假报。

后来,这份假《顺天时报》终于暴露了,事情出在从不出宫门的袁三小姐袁静雪身上。她回忆说:

> 假版《顺天时报》,是大哥纠合一班人(是否就是所谓“六君子”那一班人,那就不得而知了)搞出来的。不但我父亲看的是假版,就是我们家里别人所看的,也同样都是假版。大哥使我们一家人和真实的消息隔绝了开来。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去探望她的父亲(这个丫头是一个老妈子的孩子,是自由身子,所以准许她隔一些时候回家探望一次),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便让她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了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着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找二哥,

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我父亲说明。他接着便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等到当天晚上,我便把这张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我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一声:"去玩去吧。"第二天早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我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把大哥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大哥给人的印象是,平素最能孝顺父母,所以他在父亲面前的信用也最好。我父亲时常让他代表自己和各方面联系。可是从这以后,我父亲见着他就有气。无论他说些什么,我父亲总是面孔一板,从鼻子里发出"嗯"的一声,不再和他多说什么话,以表示对他的不信任。看来,我父亲对于帝制前途的不甚美妙,已经是有所觉察了。

的确,由于假版《顺天时报》的关系,袁世凯对这位嫡长子,开始表现出不信任了。这件假《顺天时报》泄露事件,大约发生在 1915 年底。



古德诺《解析中国》书影

袁克定没有拉拢来梁启超,但还有一张王牌——美国法学博士古德诺。1915 年 7 月,古德诺来京,主要是由袁克定接待,两人的私谊关系越来越好。8 月 10 日,古德诺在北京《亚细亚日报》上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大谈中国民智低下,只宜行君主立宪的论调。

袁克定的密友杨度,自不甘落后,按袁世凯的示意,急忙串联了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和严复,于 8 月 14 日发起组织了"筹安会"。筹安会的宗旨是"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





袁世凯为恢复帝制，挟洋自重，聘请了美国学者古德诺为宪法顾问。图为古氏（前排中）与中国官员合影

者何适于中国”。杨度在石驸马大街的住宅门口悬挂上了筹安会的招牌，并自任理事长。筹安会的出现，标志着袁世凯帝制运动的公开化。



严修像

就在筹安会大张旗鼓宣传帝制、袁克定正在兴头上的时候，曾做过袁世凯的家庭教师的严修（严范孙）老人从天津来到了北京。平时，袁世凯对严修很敬重。老人见了袁世凯，力陈古今，劝说勿搞帝制，不要允许筹安会胡闹。他言词诚恳，有理有据，袁世凯也颇有所动。随后，袁即于9月6日派亲家杨士琦到参政院宣读了自己对时局的宣言：“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宜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障碍，本大总统有保全大局之责，认为不合时宜。”

袁世凯这个宣言的发表，使杨度大为惊慌，他急忙去找袁克定，并把严修的谈话对其作了汇报。袁克定听后，非常恼火，本来正在做皇太子的得意梦，连“皇大储君”的玉印都刻好了，怎么能叫不识时务的老



头儿给搅了?于是,他从老巢小汤山驱车赶回京城,召集有关中坚人物开会。在会上,他大骂严修,扬言:"改行帝制是改定了,现在已是四海皆知,怎么能出尔反尔?那样结果不更糟?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谁要是能担保取消帝制,袁氏家族永远没有危险,则姓袁的不做皇帝!试问谁能担保?"说着用拐杖把窗户上的玻璃一块块全捅碎了。说到怒处,抄起大瓷器,把穿衣镜砸个粉碎。会后,有人将情况告诉了严修,严修于当晚就悄然回津。后来,袁世凯曾多次去书邀其来京,但他从未应命。

1915 年 12 月,袁世凯接受了推戴要当皇帝了。并且很快成立了登极大典筹备处,开始了登极的准备工作。袁世凯的家里也热闹了,妻妾们为争妃嫔问题闹得不可开交,兄弟们也为谁当"太子"而搞得人心惶惶。从血统上说,袁克定是唯一的嫡长子,而且随父从政多年,有政治基础,所以,人们认为他很有希望成为"皇太子",袁克定本人也觉得自己是当然的人选。但是,他"六根不全",曾因一次骑马时摔坏了一条腿,左手也受了伤。同时,假《顺天时报》事件泄露了,袁世凯对他很不满意,曾扬言要"择贤而立"。在众多的儿子中,除袁克定受到袁世凯的重视外,次子克文、五子克权也很受袁世凯的倚重。因此,在确立"太子"的这个关键时刻,为争当"太子"野心最大的袁克定,神经是非常紧张的。一次,大典筹备处为众"皇子"们各做一身"皇子服"。有一天,老四、老五、老六、老七和老八五个兄弟在"新华宫"内,各穿着"皇子服"合拍了一张照。大家一看,老二和老五的皇子服与众不同。别人的皇子服的胸部图案都是牡丹花图案,而他两个的胸部图案是麦穗形的。这个不同,反映了袁世凯对老二和老五的偏爱。这下子,袁克定醒悟了,老二、老五两兄弟也有可能做"皇太子"与自己平起平坐,或者把自己挤出"太子"之外。于是,袁克定就仇恨起自己的二弟和五弟。扬言:"如果大爷(对父亲的称呼)要立二弟,我就把二弟杀



复杂多面的袁克文




了！”后来，这话传到袁世凯的耳中。尽管袁世凯表面上没有表现出什么，但是，对于剥夺袁克定唯一太子资格的后果不能不使他有所考虑。

为了整掉竞争对手，袁克定就搜集二弟袁克文的黑材料，工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抓到了把柄。袁克文是一个热心文学而对政治并不太关心的人，现在为“太子”事几乎要出现刀刃相见，内心感到极为酸楚。于是，这促使了他对帝制事情的不满。一天，他与几个文人聚会，由于意气消沉，情绪低落，吟出了一首《感怀》诗，以讥讽洪宪帝制。事后，有人将这首诗呈给了袁克定，袁克定又把它送给了袁世凯。袁世凯一看非常生气，于是非要在家人面前立个规矩不可，下令把克文软禁在北海，不许与任何文人名士往来。

袁克定将假设的政敌二弟制服，而五弟为人极敦厚，于政事也不相通，自然不是他的对手，当上“皇太子”自认为没大问题了。于是，为避免夜长梦多，他就积极劝袁世凯先举行内部登极，以早日确定皇位和身份。在袁克定的上下撺掇之下，袁世凯终于决定于 1915 年 12 月 13 日在新皇宫内秘密接受了“皇帝登极百官朝贺”。登极以后，袁克定就以皇大储君的身份来对待一切，一些近臣和逢迎小人也前来拍马屁，有的对他行三跪九叩大礼，有的给他呈递上有“皇太子殿下”大名的奏呈。一时，袁克定神气非凡，并私镌了“皇太子之御”的宝印，以备日后钤用。

但好梦不长，1915 年 12 月 25 日，蔡锷在云南起兵掀起了护国战争，北洋军阀内部也很快分崩离析。袁世凯在无奈之下，被迫于 1916 年 3 月 22 日下令取消了帝制，并于 6 月 6 日在中南海居仁堂咽了气。还未正式被封“皇太子”的袁克定也结束了自己的“美妙前程”。他在袁世凯的灵前跪下，呼喊着：“我对不起爸爸！我对不起爸爸！”然而，袁世凯什么也听不到了。

冯国璋与袁世凯反目记

冯国璋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干将。到民国初年时，他已经做到了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雄踞东南，成了一位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但在袁世凯帝制运动时，他却与袁世凯反目，加速了帝制的垮台。



冯国璋像

1915 年 5 月，袁世凯以满足日本“二十一条”的卖国行径求得了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于是，袁世凯要复辟帝制的舆论不胫而走。就在此时，冯国璋于 6 月份风风火火地赶到北京谒袁，企图打听内幕消息。他满以为，不管是凭公谊关系，还是私交关系（冯国璋的前妻死后，后续的妻子是袁世凯的女儿们的教师周砥，而且是袁世凯作媒。周砥出嫁时，袁家负担了一切嫁妆，并陪送了一个老妈子，还由袁家人隆重地陪送到南京，与冯国璋结婚。此后，袁家女儿们都称周砥为“四姐”，称冯



中華民國四年六月一日

袁世凱

徐世昌

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批准书



国璋为“四姐夫”。周砥也视袁家为娘家，经常走动），袁世凯都会向他透底的。实际上，袁世凯对他已存有戒心，因为他久驻南京，俨然藩镇，已经渐渐不如过去那样唯命是从了。所以，袁演了一场双簧戏。冯国璋问：“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着手布置。”袁世凯装出一副很受委屈的样子说：“华甫（冯国璋的字），你我共事多年，情同一家，我不妨向你讲明我的心思。我绝无做皇帝的思想。我们袁家向来没有活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岁（虚岁），即便做皇帝又能做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身有残废，六根不全；二儿子克文假名士，整天与一班荒唐文人鬼混；三儿子克良是个土匪，不达识务。哪一个能继承大业？你尽管放心。”冯又说：“是啊！看来外界都不了解大总统的心迹。不过将来中国转弱为强，到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袁世凯勃然变色道：“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倘有人再逼我，我就把那里做我的菟裘，从此不再过问国事。”袁的表演，使冯国璋深信不移。



冯国璋夫人周砥的一帧瓷板像

当帝制公开以后，冯国璋大梦初醒，发现自己上了袁世凯的当，于是大骂道：“好哇！老子真会做戏，哪里还把我们当自己人。”他意识到自己已不被袁世凯所信任，假若他真的做了皇帝，自己的首领地位恐怕难保。自此以后，他对袁世凯的态度起了变化。在江苏，巡按使齐耀琳受北京之命，指派60人作为改国体、拥戴袁当皇帝的代表，冯国璋明令军署人员一不当代表，二不参与活动。



蔡锷像

当蔡锷在云南起兵后，冯国璋按兵不动，根本不助袁一臂之力。而且，他还暗地里串通江西

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和长江巡阅使张勋，密电袁世凯“速取消帝制，以安人心”。袁世凯接到了“五将军密电”，对内史夏寿田说：“完了！一切都完了！”1916 年 3 月 22 日，袁世凯终于在内外交困之中，下令取消了帝制，洪宪年号只维持了 83 天。

袁世凯虽然取消了帝制，但护国军还不罢休，并成立了军务院，要袁世凯下台。不愿退出总统之位的袁世凯，急忙派阮忠枢到冯国璋那里，希望他出面调停北洋政府与南方独立各省及军务院的关系，使其从中翰旋，保持自己的总统地位。但冯国璋并不卖命，反而逼迫袁世凯交出总统大权。他在给袁的密电中说：“南军希望甚奢，仅仅取消帝制，实不足以服其心”，希望袁世凯“亟筹自全之策”。

冯国璋的反目，对袁世凯是一极大打击，1916 年 6 月 6 日，袁世凯终于在忧愤之中死去，当时只有 57 岁。







袁世凯帝制丑闻

一、“真龙天子”美梦

袁世凯窃取民国大总统宝座后仍不满足，还想进一步黄袍加身做皇帝，成天做“真龙天子”的美梦。据说他年轻时，在老家河南项城水寨集曾请人批“八字”，说他的命极好，简直是“贵不可言”，隐喻有帝王之命。有人更露骨地说他家的祖坟地脉，一边是龙一边是凤，龙凤匹配，主袁家要出帝王。如此这般，均纯属附会，却反映了袁世凯的称帝野心。



密谋称帝的袁世凯（坐者）

龙，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帝王的象征，尤其是在改朝换代时，新的帝王总要自称为真龙天子。当袁世凯帝制自为刚露端倪时，因他曾纳三位朝鲜女子为妾，其中一位还是朝鲜皇室闵妃的表亲，朝鲜使者特地赠送袁一对极精致的雕龙金边饭碗。因它迎合了袁称帝的野心，故袁如获至宝，特别珍惜，每次吃饭都要用这对宝碗，祈求能早登帝位。

有一天，侍奉他吃早餐的婢女，不小心把碗掉在地上打破了，婢女自知闯了杀身大祸，吓得面无人色，战栗不止，幸好这时袁还躺在床上做皇帝梦，她从惊慌中醒过来，赶忙跑去跪求袁乃宽救命。袁乃宽是袁世凯的大同乡，认本家，跟随袁世凯多年，是袁的亲信，任侍从武官，实



际上也是他的家臣和大管家,很得袁氏宠信。袁乃宽听婢女所言,也感到问题严重,若实话实说,即使他竭力求情也救不了她。然而他摸透了袁世凯的心理,便教给婢女当老爷问起时,你只要说:“奴婢今早传早膳到老爷房内时,忽见床上卧着一条大金龙,奴婢被吓了一跳,一时失手把宝碗打破了,请老爷治罪。”如此便可转危为安,甚至可因祸得福。袁世凯起床后,正要吃早饭,看到所用的碗不是那对金龙宝碗,勃然大怒,责问婢女。婢女按袁乃宽所教的话照说了一遍,果然袁世凯转怒为喜,不但不加责罚,反而嘱咐她严守秘密,并承诺他登基后要封这个见到真龙现身的婢女为妃。

二、可笑的“民选”皇帝奇闻

袁世凯是一个既要当婊子又要立贞节牌坊的人,他自己梦寐以求要当皇帝,却又要制造出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实行帝制,并一致拥戴他当皇帝、而他不得不勉从民意出来当皇帝的假象。他常对属下说:“如果全国老百姓一定要我做皇帝,我就做。”为达此目的,他开动宣传机器,大造帝制舆论,强奸民意,在北京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大力在全国发动人们请愿变更国体,拥护袁当皇帝。凡列名请愿者便请吃饭、看戏、



1912 年 3 月 10 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和他的僚属在外务部合影



送红包，就连乞丐、妓女都被动员起来，组成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等，不一而足。请愿函电也从四面八方雪片般地飞进北京，异口同声宣称代表广大民众，为了挽救中国的危亡，吁恳袁俯顺民情，速即当皇帝。为了收买一则有较大影响的通电，还不惜花费数十万元。甚至未经本人同意，即以其名义发表请愿通电，如杨度请王闿运劝进，王未允，杨便以王的名义代拟发劝进电，说“共和病国，烈于虎狼，纲纪荡然，国之无日”，请袁“勿失万民归顺之诚”，早日荣登帝位，致使王闿运终生背黑锅。北京还拉了一批不三不四的人去内务部请愿。



王闿运像



朱启钤像

在这样大造舆论的气氛下，袁世凯认为还必须要有一个“合法”的正式程序，即举行国民代表会议，投票决定国体和选举皇帝。他成立了一个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来具体领导这一工作。同时命朱启钤等十人向各省发密电，传达



河南省城

朱启钤等请赵倜拥袁复辟密函



袁的命令，务必保证会议成功。他为达此目的，可以不顾国家法律，不择手段。具体做法是由各省选举参加全国国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在选举之前，先由袁及其心腹拟定各省代表名单，并留出一些名额由各省挑选亲袁人物补充，命令各省务必按照事先确定的这个代表名单选举，不得更改和遗漏。

为了确保"钦定"名单能全部当选，规定由每县县官推荐选举人一名，在指定日期到达本省将军衙门，由将军或巡按使担任选举监督，盛宴招待各县选举人，宴罢，派招待员与之个别谈话，若竭诚拥护本省代表名单，则将名单和盘托出，由选举人照抄无误，并立即陪同到选举厅投票；如有人闪烁其词或表异议，则下逐客令，不让参加选举，并密电该县官予以申斥，令速另派选举人来参选。这样一来，各省当然全都照单选出了所谓的国民代表。

所谓全国国民代表大会，实际上并不把各省代表集中在一起召开大会，而是在各省将军、巡按使监督下分别举行会议，于 1915 年 10 月



1913 年 11 月，袁世凯令组织政治会议为其御用工具，为袁世凯称帝帮了大忙，图为政治会议议员合影

25 日采用记名投票方式投票决定国体，11 月 20 日选举皇帝。决定国体的票上印着“君主立宪”四个大字，规定投票人要写上自己的姓名，在名字后再写“赞成”或“反对”二字。选皇帝的票上印着“选举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皇帝，传之万世”29 个字。国民代表只要签上自己的尊姓大名就万事大吉了。这样的表决，不言而喻必然是全体1 993名国民代表全部赞成君主立宪，全部选举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这幕民选皇帝的丑剧不伦不类，皇帝是专制独裁的象征，民选是民主制度的形式，二者风马牛不相及，皇帝而由民选，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三、年号、龙袍和登基梦

封建时代以帝王为统治中心，也以每个皇帝的统治时间纪年，故每个皇帝上台之后必须更改年号。为了取一个好的年号，皇帝及其智囊们往往煞费苦心，搜索枯肠。袁世凯既要称帝也必须有自己的年号，他曾召群臣集议年号，当时主张用“武”字的占多数，他们引用东汉开国皇帝用建武为年号，明代开国皇帝用洪武为年号，认为开国皇帝应以“武”字为宜，主张用“定武”为年号。但遭另一些人反对，他们说此次称帝乃俯顺民情，并非以武力定天下，故宜用“文功”为年号。

年号之争反映了未来太子党的权力之争，袁世凯有妻妾 9 个，儿子 17 个，长子克定是原配于氏所生，五短身材，因骑马摔成瘸子，不仅外貌不佳，尤其是性情暴躁，盛气凌人，野心极大，自认未来太子非己莫属。袁克定为了早当太子，以后好继承皇位，对帝制极为狂热，拉帮结派，广树党羽，四面联络，八方鼓吹，恨不得一夜之间实现帝制，当上太子。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人，这些人主张以“定武”为年号，巧妙地把克定的“定”字塞入年号，借以树立他为太子的地位。次子克文与之相反，他相貌儒雅，风流潇洒，聪明正直，多才多艺，对政治不感兴趣，终日结交文坛名士诗词唱和，反对帝制，更不想当太子。但仍有一些人支持他，寄予厚望，提出以“文功”为年号，也把克文的“文”字嵌入年号。



据说袁世凯对克定、克文立为太子均不甚满意,他最钟爱的是第五子克权,有意立他为太子,故对以上两个年号也犹豫不决。后来有人主张洪范五行之义,为帝王建号之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自明洪武至今正合五百年之数。前洪武帝驱逐元代的异族统治,后有洪秀全抗清,辛亥有黎元洪举义旗迫使清帝禅位,这些都有一个"洪"字,黄蘖禅师诗也说:"继续偏安三十六,洪荒古国泰阶平。"现在实行君主立宪,只有以立宪相号召才能为人们所接受,应以"洪宪"为年号。袁听了很高兴,终于决定以"洪宪"为年号。



袁世凯身着新设计的洪宪皇帝戎装

龙袍是中国皇帝专用的制服,是皇帝身份的表征,当皇帝自然要穿龙袍。袁世凯对龙袍非常重视,起初总统府命人给他特制一袭龙袍,上绣九条龙蜿蜒全身,呈送袁氏验收。他不满意,认为九条龙虽绣得生动,但却是九条散龙,龙气不团聚,令重新做一件九团龙的龙袍,每团绣一条金龙。龙袍制成后,袁试穿了两次,进行登基演习。可悲的是在全国人民反对帝制的巨浪冲击下,他心惊胆战,如履薄冰,在宣布承受帝位,接受百官朝贺时,没敢穿龙袍。原定1916年元旦在太和殿举行的登基大典也被迫取消,直至身亡,他始终没胆量举行正式登基大典,也



没胆量正式穿龙袍亮相。而那件袁不满意的散气龙袍，后来倒派上了用场，成了戏班子的行头。据说京剧名老生刘鸿声被袁叫去演戏，演《斩黄袍》，唱做俱佳，博得袁的喝彩，在高兴之下，袁对他说：“我这里还有一件龙袍，就送给你了。”后来刘每逢唱《斩黄袍》时，便穿这件真龙袍上台，因行头高贵，吸引了不少观众，使刘鸿声名噪一时，这是袁所始料不及的，也是对他极大的讽刺。

袁世凯及其爪牙筹备帝制已就绪，就怕夜长梦多，袁克定等查到农历十一月初六、初七两天都是黄道吉日，便鼓动袁世凯在这难得的好日子先称帝接受百官内部朝贺，次年元旦再正式举行登极大典。于是初六日袁向全国宣布承受帝位，初七日（1915 年 12 月 13 日）临时通知接受百官朝贺。朝贺典礼在中南海的居仁堂举行，上设龙案龙座，但袁并未就座，而是站在龙座旁，身穿大元帅服，朝贺的人先到先贺，也没司仪，故行跪拜礼参差不齐，显得很散乱、草率，是关起门来做皇帝。

12 月 19 日，袁正式设立一个四百多人的登极大典筹备处。21 日和 23 日，两次大封群臣，封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共 128 人。12 月 31 日下令改次年（民国 5 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发行纪念金币和银币，正面是袁穿海陆空军大元帅服的头像，背面是龙的图案和“中华帝国、洪宪纪元”字样，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袁大头”。故宫三大殿原准备为登基处，重新油漆装修一番，特制御极宝座、龙案及一切配套陈设。



袁世凯称帝登基图

袁世凯为圆皇帝梦，挥金如土，筹安会经费二三百万元，发动各路请愿，收买劝进书所费也巨。据《申报》民国 4 年（1915 年）12 月 27 日报导：截至此时帝制费用已达五百九十余万元。这个统计尚



1915 年袁世凯政府中央观象台印制的《洪宪元年历书》

不完全,而且以后费用更大,如拨给登极大典筹备处的经费即达一千四五百万元,但仍不敷使用,修大殿就花去 270 万元,御极宝座 40 万元,两袭龙袍 80 万元,五颗御宝金印 60 万元。据调查,仅大典筹备专款就花2 000万元。据民国 5 年 9 月 6 日《申报》报导,经民政部调查,各项直接、间接开销共耗资达 6 亿元。袁世凯竭





印迹为“中华帝国之玺”和“皇帝之宝”





袁世凯称帝时的纪念币



袁世凯银币

尽民脂民膏,筹备登极大典,但在全国人民反对下,始终不敢公然举行登极大典,只做了 83 天皇帝就被轰下台,身败名裂,换来千古骂名,加速自身的灭亡。

四、误用“二陈汤”一命呜呼

袁世凯称帝违背历史潮流,大失民心,不但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即使和他很亲近的稍有见识之人也反对他称帝。如受袁尊重并封为“嵩山四友”(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和张謇)之一的李经羲,他是李鸿章的侄子,就曾当面正色指出:“公甘冒大不韪,欲登九五之座,国家利害,人心从违,两不顾虑。”还说:“如果皇帝那么容易当,我先叔父早就在你之前做皇帝了。”袁的次子克文也一再反对父亲当皇帝,曾劝说:“既做了总统,全国军政大权在握,何必一定要做皇帝?清朝被推翻,共和深入民心,帝制决不可行,父亲何必受宵小蛊惑,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袁大怒,严加斥责,克文见劝说无效,无可奈何,心有感赋诗一首,其中有“乍著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绝怜高处多风雨,



莫到琼楼最上层”,借以表达他反对父亲称帝的心情。袁世凯宣布帝制后,激起各地的声讨,克文又流泪劝说父亲取消帝制,说:“真到众叛亲离时,悔之晚矣,儿请父亲三思。”袁世凯大发雷霆,怒喝:“快给我滚出去!”随即将克文监禁于新华宫后院屋内,以免他出去乱发议论。然而袁的下场恰恰被克文所言中,最终落得众叛亲离,自寻死路。

袁世凯敢于称帝的本钱是掌握了强大的北洋军队,革命党和人民反对帝制是他意料中之事,但他认为这并不可怕,强大的北洋军队可以把他们镇压下去,镇压“二次革命”就是前例。他最害怕的是北洋军队的瓦解,历来总是排斥有可能对他不忠的人,重用对他忠心不贰的人,并把他们安插在重要的位置上。他只知道北洋军队可以镇压人民革命,却没有认识到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强大也足以瓦解北洋军队。

随着蔡锷在云南高举反袁义旗,西南各省相继响应,形势急转直下,北洋集团各大小头目眼见袁世凯这棵大树就要倒下,便见风使舵为自己找出路,北洋集团出现了分崩离析,大有树倒猢狲散之势,使袁陷于众叛亲离的绝境,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这是袁做梦都想不到的,其来势之猛更叫他瞠目结舌。其中尤其是他认为最忠实可靠,是他一手提拔、委以重兵视为心腹股肱的陈树藩、陈宧和汤芗铭的背叛,使他格外痛心疾首,悲愤交加,促使病情急剧恶化,加速他早上黄泉路。因此,他死后有人讥讽他是误用“二陈汤”而死。所谓“二陈汤”,并非指中药处方的汤剂,而是以上二位姓陈、一位姓汤的背叛袁世凯的北洋将领。

陈树藩在辛亥革命中曾参加陕西起义,任东路招讨使。在袁世凯任总统后,他投靠袁,任陕西第一混成旅旅长,1915 年得到袁的赏识,升任陕西镇守使,袁称帝,他积极通电拥戴,还肉麻地称袁是“不祧之祖,共戴之尊”,表现得何等忠贞!袁视他为足以信赖的死党。不料,他于 1916 年 5 月 9 日通电宣布陕西独立,进兵西安驱逐陕西将军陆建章,自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兼陕西都督,倒戈讨伐袁世凯。这是北洋将领第一个公开倒戈反袁,给了袁当头棒喝。袁意识到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背叛,而是北洋集团堤岸崩溃的第一个缺口,给了袁极大的震惊。



果然，13 天后陈宧也公然宣传独立。陈宧在袁当权后，被任命为参谋次长。他曲意奉承，每逢袁咨询要政，他必先拟左中右三策，左策放左袖内，右策放右袖内，中策放靴筒内，与袁面谈时窥测其旨意，与所拟某策相同或相近，即拿出该策献上，使袁感叹陈“实获我心”，从而颇受宠信。袁称帝恐西南各省出事，特派陈率北洋三混成旅入川，督理四川军务。辞行时，陈长跪力劝袁早即帝位，以至口咬袁的靴头不放。为了向袁表忠心，他竟把老娘留京作人质。他的这些效忠举动使袁感动，倍加依赖。袁称帝时封他为一等侯爵。不料，他也通电反袁，并着重宣布与袁个人断绝关系。这样一个人袁都不能信靠，还能信靠谁呢？这事对袁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他怒不可遏，当即昏倒，陈之妹急扶起服侍，不料袁醒后竟迁怒于她，拔佩刀将她杀死。

又过 7 天，5 月 29 日，袁的另一心腹汤芗铭也宣布湖南独立。汤在民国初任海军部次长，因镇压“二次革命”有功，深获袁的信任，升任湖南都督兼民政长。他滥杀无辜，镇压人民，被称为“屠夫”，成为袁极为赏识的忠实走狗。袁称帝时封他为一等侯爵，故他的独立和反袁更使袁陷入绝境。

短短 20 天就有袁最亲信的三个将领相继背叛，宣告了袁所操纵的北洋集团的瓦解，袁至此已走投无路，自知末日来临。汤宣布独立仅 8 天，即 1916 年 6 月 6 日，袁即悲愤而死，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袁世凯的死举国欢庆，为死者写挽联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丧葬文化，人们纷纷以挽联的形式表达了对袁世凯的痛恨和嘲讽。例如流传极广的一副对联曰：

起病“六君子”；
送命“二陈汤”！

“六君子”即筹安会六君子，有杨度、严复、李燮和、胡瑛、孙毓筠、刘师培六人，受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的指使，大肆鼓吹君主立宪，为袁称帝



大造舆论，故说他们是起病。“二陈汤”原是中药一副汤剂，是半夏、桔红、茯苓、甘草四味中药材，加用生姜作引煎成。这里巧妙地用来指上述陈树藩、陈宧和汤芗铭三人，是他们的背叛，送了袁的老命。此联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此外还有一副不对称的怪联曰：

袁世凯千古；
中国人民万岁！

作联语的规则是，上下联的字数必须相等，这样才能有所对仗。而此联却以下联六言对上联五言，当然不是作者不懂联语规则，显然是别出心裁。当时人们也觉得奇怪，有人去问过作者，回答是：“袁世凯对不起中国人民。”果然寓有深意，可说是千古未有之怪联。

其实袁一称帝，即已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代表人民喉舌的上海报纸上曾刊登一上联，公开征集下联，上联曰：

或入園中，拖出老袁还我国；

这个上联要把“或”字，放入“園”中，把“園”中的“袁”字拖出来，恰好是个“國”字。寓意十分明显，是要打倒袁世凯，推翻帝制，还我一个民主的国家。应征下联者不乏其人，其中被评选为最佳下联的是：

余行道上，不堪回首问前途。

下联把“余”字放在“道”字上，把“道”字上的“首”字回掉，便是一个“途”字。指出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前途一片黑暗，不堪回首，自取灭亡。

这样一个窃国大盗，无耻的卖国贼，临死前为自己写了一副自挽联

曰：

为日本去一大敌；
看中国再造共和。

众所周知，他与日本签订的出卖中国的“二十一条”墨迹未干；而且帝制自为，破坏共和制度，更是有目共睹。他竟敢颠倒黑白，往自己脸上贴金。然而，这是徒劳的，人民不可欺，历史将给以无情的审判，袁世凯永远成为千古罪人，受到万民的唾骂。他的自挽联，人们都会反着读，若作如下修改庶几较为恰当：



为日本去一走狗；
毁中国再造共和。





袁世凯洪宪琐记



1915 年下半年，一心想当皇帝的袁世凯经过紧锣密鼓的帝制活动之后，终于在 12 月 19 日下令成立了登极大典筹备处，朱启钤为处长，正式拉开了皇帝登极的筹备工作。

为了做好正式登极的准备，据说在登极大典筹备处成立前的 12 月 13 日，袁世凯就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了一次正式登极的小规模预演。当时在袁世凯身边任武官的唐在礼回忆说：

> 十二月十三日早晨八九点钟，在我们毫无准备之下，由段芝贵临时通知皇帝即日在居仁堂登极，召集所有原总统府、政事堂、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及各部司长、局长以上和各军队师长以上各员，即刻准备依次分批参与朝贺。说办就办，一时忙乱异常。大家想，参与盛典需要整换衣履，但时间确已不及。当时在京城左近的大员有的也得到消息，赶着入京朝贺，但负有地方守土重责的大员则接到指示，应以职守为重，概免朝贺。
>
> 约在九点多钟，居仁堂大厅内朝贺典礼开始了。厅中上首摆设龙案龙座。由于一般意料的是龙座设在龙案前面，两旁并无仪仗，只有平日贴身伺候袁的几个卫兵排列在座后两旁。袁这天龙衮、皇冠并未加身，只穿着平时的大元帅戎装。他素来不欢喜上饰



叠羽的元帅军帽，平时很少戴用，这时也未戴帽。参加朝贺的人先到先贺。当时段芝贵传袁的话，说行礼要简单些，三鞠躬就行了。但大家朝贺时，仍旧跪拜，很多人还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只是旁无司仪，因之行礼时并不齐整。朝贺人下拜时，袁并未就座，只站在座旁，左手扶着龙座搁臂，右手掌向上，不断对行礼者点头。有时对年长、位高的人，袁就做出用右手搀扶的姿态，表现出一种内心受用而外表故作谦逊的难于刻画描写的复杂心情。朝贺者有的着戎装，有的着袍褂，有的着便服，形形色色，多种多样。当天引人注意的是黎元洪、段祺瑞等并未参加。总之，这次大礼使我这身与"旷世盛典"的人感到怀疑。为什么偏要赶在这天这样局促草率地突然举行？大有坐在家里称天子、不敢公开的模样。事后大家说："这样就算换了朝代了吗？"

的确，这样并不能算是换了朝代，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15 日，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表示不接受。21 日和 23 日，两次特封公、侯、伯、子、男共 128 人，其中，一等公有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还有被他毒死的赵秉钧也被追封为一等忠襄公。二等公为刘冠雄。一等侯有汤芗铭、李纯、朱瑞、陆荣廷、赵倜、陈宧、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一等伯有张锡銮、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雷震春。一等子有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陈光远、米振标、张文生、马继曾、张敬尧。二等子有倪毓棻、张作霖、萧良臣。一等男有许世英、张怀芝、何宗莲、潘矩楹、龙覲光、陈炳焜、卢永祥、江朝宗、徐邦杰等 37 人。二等男有王祖同、王怀庆、刘存厚、周骏等 19 人。三等男有何丰林、臧致平、马福祥、李长泰、杨以德等 30 人。还有一、二等轻骑都尉世职 70 人。此外，还封了孔丘 76 代孙孔令贻仍袭衍圣公，并加郡王称号。

为了取得满族王公亲贵的支持，袁世凯还企图把自己三女儿袁叔祯嫁给逊帝溥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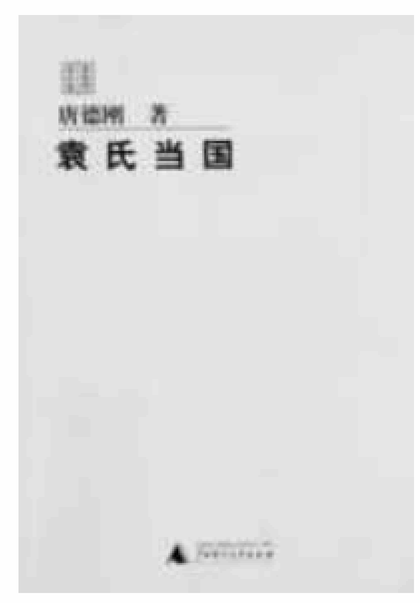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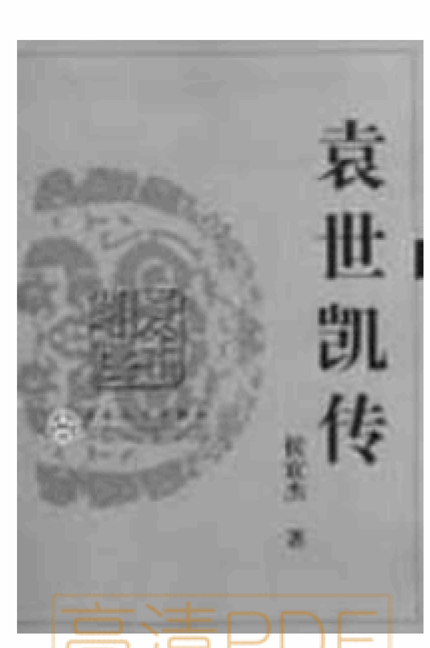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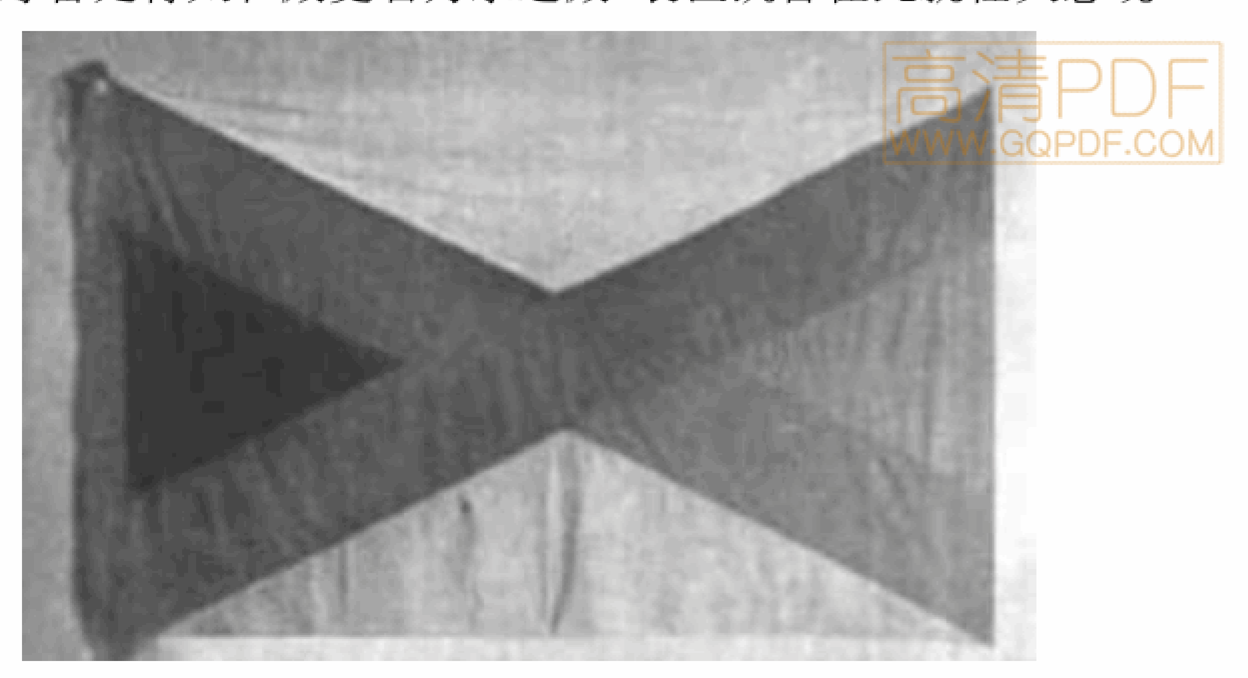




袁世凯对中国近代历史影响颇大，但他开历史倒车，梦想做皇帝，永远为后世耻笑



大典筹备处将太和殿更名为承运殿,袁世凯曾在此就任大总统



“中华帝国”旗

登极大典筹备处成立后,准备工作加紧进行。清宫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作为袁世凯登极的处所,并把三大殿分别改名为承运殿、体元殿和建极殿,还对三大殿一律用红色油漆进行油饰。在承运殿内设御极宝座,扶背各处雕有九龙并镶金嵌宝。宝座前设雕龙玺案,案前左右排列古鼎、古炉各三座。座后陈设雕龙嵌宝屏,屏侧各置日月宝扇一对。

此外,登极和祭祀用的吉服,即衮冕、玄衣、纁裳、大带、中衣、朱袜、赤舄等,都按章进行了制作。洪宪王朝的“皇帝之宝”、“中华帝国之玺”,以及国旗都已制作完毕。国旗是由前海军总长刘冠雄设计的,他根据英国国旗双十字架,加斜叠双五色条于原五色国旗之上,而且改原



国旗红黄蓝白黑为黄红蓝白黑。

国旗、金玺以及宫廷中细小的案衣、围顶、门帘、拜褥等物，也全部用黄云缎织成。

袁世凯还特简原总统府庶务司司长郭宝昌，赴景德镇烧制上等御用瓷。包括上等瓷皿、瓷砖。这些瓷器质薄透明，叩其若瑟，虽时代不远，却历来为收藏家珍视。

除殿宇、服冠和御用品之外，袁世凯还让有关部门筹备好了开国登极郊天大典，遣官祗告阙里至圣先师孔子之礼，遣官祗告清太庙之礼，遣官祗告关壮穆侯、岳忠武王之礼，以及其他祗告大典，并统一了皇子吉服、诸王吉服、职官吉服；演习好了丹陛大乐、中华韶乐、导迎乐；置办了天坛、孔庙、关岳庙、历代帝王庙的应用器物；安排好了法驾卤簿，进退宫殿的路线，应派执事人员，文武百官的班位，以及进玺、颁诏，各地朝贺的仪式等。



袁世凯称帝时到天坛行祭天礼

在袁世凯的家庭中，妻妾的名分也大致确定：袁的原配夫人于氏是当然的“正宫娘娘”。在姨太太中，大、二、三、五四个姨太太为“妃”；六、八、九三个姨太太为“嫔”（四、七姨太太这时已死）。女儿们为“公主”；儿子们为“皇子”。大典筹备处还派人来中南海教导“公主”们学习各种行礼、言谈的礼节等。当然，也都为这些不同身份的家眷们准备好了不同的服装、鞋子，以便在袁世凯登极时穿用。

真是万事俱备，只等御极登基之日的到来了。令袁世凯想不到的是，花了数千万两的洪宪登极筹备，因护国战争的爆发并没有派上用场。





袁世凯的生活习俗


袁世凯戎装照

袁世凯虽然生一副五短身材,但由于是军人出身,所以,无论站着或坐着,总是挺直腰杆。当他坐下的时候,总是一边由鼻子里发出“嗯”的一声,一边用手摸着胡子,然后慢慢地就座。他坐下后,也总是两腿叉开,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由于腿比较短,坐的时候两腿垂直,仿佛“蹲裆骑马”的姿势。他和人谈话时,总喜欢用手摸着胡子,而且神情严肃,语气斩钉截铁,从不絮絮叨叨。他谈话谈到某一段落时,总要用“嗯!你懂不懂”的口头语,来表示他“重言以申明之”意。他和人交谈时,嘴里也总离不开雪茄烟,走路的时候也是如此。

袁世凯平时很少有笑容,但也很少生气。对男女用人做错了事,他最后只是骂一声“混蛋”;真的气极了,也只是把一声“混蛋”,变成“混蛋加三级”而已。

袁的起居饮食,一年四季,比较刻板规矩。每天早上6时起床,6时半吃早点,然后到办公室办公或会客。11时半吃午饭,午休约一小时,下午2时起又办公或会客。5时以后,和家人一起散步,游玩。约7时吃晚饭。袁的主食变化无多,主要是馒头和米饭,同时还要有几种稀

饭，如大米的、小米的和玉米糁的，夏天另加一种用磨碎的绿豆熬成的“糊糊”。所吃的菜花样不多，而且菜的位置也从不变换。如他最爱吃清蒸鸭子，在入冬以后，就每顿必须要有这个菜，位置一定要摆在中央。又如，肉丝炒韭黄摆在东边，红烧肉摆在西边，只要不换这两个菜，位置就一直固定，一东一西。袁不爱吃咸菜、酱菜之类，因此饭桌上就永远看不到这类小菜碟。

早餐，他总是吃一大海碗鸡丝汤面，而且是由人送到他居住的楼上用餐的。吃午饭时，如果没有外客，一般是由当值的姨太太和一两个子女陪同吃饭。吃晚饭时，他总是和同其外出游园散步的家人们一起用餐。星期日的晚饭则是全家人在一起吃的，除了大厨房供应的菜以外，各房姨太太也都带来各房自做的拿手好菜。有的时候还叫外面有名饭馆的厨师前来做菜。这天晚上，袁世凯不像平时那样严肃。他和全家人随意说笑，也和孩子们逗着玩。

袁世凯夜间休息，并不到各个姨太太房里去，而是由姨太太轮流前去“值宿”。轮到哪一个姨太太当值的时候，就由她本房的女用人、丫头把她的卧具和零星用具搬到袁的房间里去。当袁世凯当上总统住进了中南海居仁堂时，大姨太太、二姨太太、三姨太太都已经不和他同居了，所以，轮值的只有五姨太太、六姨太太、八姨太太、九姨太太了（七姨太太已死了）。这四人，每人轮值一个星期。

袁世凯夜间休息的时候，虽然采用的是姨太太轮流值宿的办法，但一到第二天早晨，却让最宠爱的五姨太太到身边来伺候一切。因为五姨太太有眼色，处处想得周全，很合袁的意。如，每天早晨她见到袁世凯时，总是笑吟吟地叫上一声“大人”，然后再去为袁招呼吃穿一切。其他姨太太虽然也都是这样去做，但总是比不上五姨太太做的讨袁欢心。

袁世凯在穿衣服上，喜欢短装和黑色的。在做清朝的官时，除了上朝要穿袍褂以外，到家就要换上黑色的短装制服。这个习惯直到洪宪帝制时期也未改变，只有在祭祀祖先时才改穿袍子、马褂。夏天，他喜



欢穿一套黑羽纱制服,戴“巴拿马”草帽,脚穿黑色皮鞋。冬天,他喜欢穿黑色制服,制服的样式是短立领,四个暗兜的,头戴四周吊着貂皮、中间露出黑绒平顶的黑绒皮帽,脚穿黑色短筒皮靴。




任山东巡抚时的袁世凯


任内阁大臣时的袁世凯


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二届临时大总统时的袁世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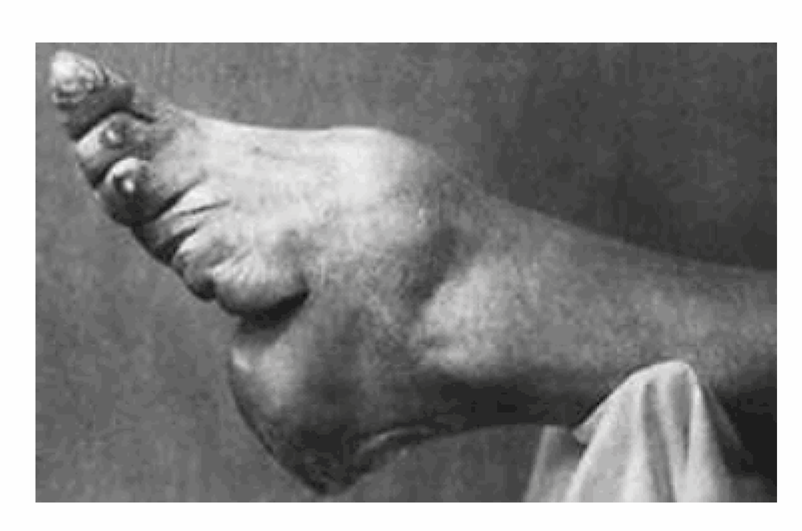
袁世凯也喜欢在嘴唇留沿口胡子,既不过长也不过短,但要求胡子末梢突出嘴唇。他吃饭速度快,又不讲求方式,所以,往往在喝汤或喝稀饭的时候,弄得胡子上、衣服上都沾了汁沥。但他又从不用手绢,遇到擤鼻涕的时候,若无人在旁伺候,他就用衣袖一擦了事。故此,他的衣服上经常有斑斑点点的痕迹,看起来很不雅观。为了他的仪容,姨太太们就得将毛巾沾湿,帮他擦拭斑点,而他自己是从不动手的。

袁世凯住的居仁堂,是安装了卫生设备的,但他除了每年过年时洗一次澡外,其余时间从不洗澡。每到炎夏酷热,汗自然流得很多,但他从不自己洗,而是让姨太太们给他擦背,就是他的下身也同样是让她们给擦的。他的子女们问他“为什么不上澡房去”,他总是笑着回答:“那个味儿不好。”袁世凯也从不用洋恭桶,却用一个定做的木制马桶,而且这个马桶比一般的要高,他可以坐在上面,就仿佛坐在一个凳子上似的。

袁世凯从来不抽水烟、旱烟、香烟和鸦片烟,但他却喜欢雪茄烟,嘴里经常衔着它。他不欢迎西医,亦不吃西药,但喜欢吃助消化的苏打片。他对中医感兴趣,平时有病吃药也是中草药。特别是对参茸等滋

补中药，更是爱不释手，常常一把一把地把人参、鹿茸等放在嘴里嚼着吃。

他喜欢缠足的女人，在他所娶的太太和姨太太中，除了朝鲜籍的二、三、四三个姨太太是天足外，其余都是缠足的。他喜欢的五姨太太，其得宠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她有一双缠得很小的"金莲"。二、三、四三个姨太太为了讨得袁世凯的欢心，想缠足已经不是时候了，于是只好依照过去京剧中花旦、武旦角色"踩寸子"的办法，做出缠足的样子来。直到袁世凯死去，她们的双足才离开"寸子"，获得自由。



三寸金莲的真实面目



袁世凯的家规

袁世凯是个满脑子封建思想的人物,他的家规也充满着封建的气味儿。他规定:新进门的姨太太要服从早进门的姨太太的管束,所有礼法仪节、起居言谈,都要由老的姨太太随时教导指点,新的不得有丝毫违拗。袁世凯先后娶了九个姨太太,前一阶段里,大姨太太对二、三、四姨太太进行管教;后一时期中,受宠的五姨太太就对六、八、九三个姨太太实行管束(七姨太太死的早),这些都是袁世凯规定的。由于这些规定,被管束的姨太太们自然少不了"领导"的责骂或毒打,但她们只能忍气吞声,因为袁世凯认为这是正当的,从不为其撑腰。



天津袁世凯故居

袁世凯对于女儿的管教,比较马虎,但对所谓的"男女之防",却十分重视。在彰德"隐居"时,以及后来住进中南海,他都不许女儿们走出大门。如果要外出,都必须坐人力车,而且,无论是冬夏天气,人力车的车篷上都要放下车帘,不允许外面的人,特别是外面的男性看到。在子女的学习方面,他要求男女分开,即分别设立男馆和女馆。当然,女馆的老师也都请女教师。在这里,袁世凯并不希望女儿们学到什么真



学问，只要求她们多懂得些封建社会中所需要的进退应付的规矩礼节即可。

袁世凯还要求子女必须驯服，每天按时向父亲请安。请安时，先由男用人高声传报：“×爷来啦！”只有得到袁的同意，才能进去。进门之后，先叫一声“爸爸”，然后鞠一躬，站在一旁，温声问道：“爸爸！吃得好，睡得好！”接着就恭恭敬敬地垂手低头，静候问话。等他问完，就说“去吧”。然后，几个弟兄依然再向他鞠一躬，倒退着蹭几步，然后才能转身出门。这种例行会见和公式般的问答，天天如此。

女儿出嫁后，按照袁家的“规矩”，她不能回家过年，如果回娘家，则不能和大家一起吃团圆饭，同时也不准看娘家的灯。据说，如果娘家的灯被她看了去，娘家那兴旺的势派便会衰落下去。一次，袁世凯的大女儿回中南海过年，结果，在除夕之夜，她住的那个院子的电线就剪断了，只好点着蜡烛，一派冷冷清清的景象。大年初一到初五，袁家还不准扫地，据说是怕把财气扫出去。

逢年过节，袁世凯总要让北京戏班子里的名角到中南海来唱“堂会”戏。为严“男女之防”，袁世凯总让女眷们坐在廊檐底下，而且，在廊檐的外面挂上极细的竹帘子，以防外人看到。

袁有三十多个子女，而子女的婚姻大事从来都是袁世凯自作主张，根本不考虑他们是否愿意。当然，对子女的联姻之事，他都是从政治角度来权衡的，所以，都必须是名门权贵。如袁世凯之子克定娶湖南巡抚吴大澂之女，克文娶天津道员刘尚文之女，克良娶工部尚书张百熙之女，克端娶天津盐商何家之女，克权娶直隶总督端方之女，克桓娶江苏巡抚陈启泰之女，克齐娶国务总理孙宝琦之女，克轸娶两江总督周馥之女，克久娶副总统黎元洪之女，克坚原订徐世昌之女，后改娶陆建章之女，克相娶前军机大臣那桐之女……袁家长女嫁两江总督张人骏之子，



黎元洪像

次女嫁出使大臣薛福成之子，三女嫁山东省省长杨毓珣，五女嫁吏部尚书陆宝忠之子，六女嫁孙宝琦之侄，七女嫁荫昌之子……这些子女的婚事，不少是袁世凯在与知己之交的官吏朋友中私室密谈而定的。如次女和五子克权的婚事，就是袁世凯和端方密谈时订立的。只要是他订立的，绝不容许子女悔婚。袁的独断专行，也的确给一些子女的婚后生活带来了不幸。





袁世凯的一妻九妾

袁世凯活了57岁，一生共娶一妻九妾。

袁世凯的原配妻子于氏，是河南乡间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为人朴实纯厚，但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亦不懂什么规矩和礼节。后来，随着袁世凯地位的上升和妾的相继纳娶，这位赶不上时代潮流的主妇，被逐渐地冷落。虽然袁世凯表面上对她客气，有时也到她的房间中坐一下，说句“太太，你好”的问候话，实际上，既不让她管家，又不和她同房。有时接待宾客需要这位太太非出场不可，就让其他善于应酬的子女陪同，并由其代为问答，以防她说出笑话或出现一些不合规矩的动作。所以，这位夫人只是一块地道的“牌位”而已。

袁世凯的长妾沈氏，是一个苏州籍的妓女。1881年，还未发迹的袁世凯离开家乡到上海去谋事。他带了不少钱，在上海活动了一个时期，但毫无成就。他因住在旅馆里感到寂寞，就去逛妓院，从此结识了名妓沈氏，二人情好日密。后来沈氏又资助袁世凯盘费，让其离开上海，另谋出路，并希望他努力功名，不要相负。袁世凯也不忘旧情，终于在1882年赴朝鲜之前，将沈氏赎身并纳为大姨太太。袁世凯非常宠爱沈氏，曾把她带往朝鲜，当做正式“太太”看待。后来，袁世凯还让她管家，并命令其他妻妾所生的子女都称呼她为“亲妈”。“亲妈”这种叫法，是仅次于“娘”的一种称呼。

在朝鲜期间,因袁世凯帮助闵氏集团复辟有功,基于感激之情,朝鲜闵妃送自己的表亲金氏作袁之妾。在金氏嫁过来的时候,还带了两个陪嫁的姑娘,即李氏和吴氏,袁世凯也一并收她们为姨太太,并按她们年龄的大小,排定李氏为二姨太太,金氏为三姨太太,吴氏为四姨太太。因这三人都是在大姨太太手里娶过来的,所以,大姨太太成了她们的领导者,对其担负起了教导和管束的责任。这三个姨太太因语言不通和风俗的不同,加之女人之间争风吃醋的心理支配,自然地,她们受到了大姨太太的不少虐待。特别是金氏,就曾被大姨太太绑在桌子腿上毒打,因打的厉害,以致左腿内伤较重,直到临死时还经常疼痛,难以伸直。





《袁世凯家事》书影

金氏是不幸的。她原是朝鲜贵族的一个金枝玉叶,嫁给袁世凯之前,她本人包括她的父母都认为是来当"正室"的。不料,过门之后,她不但不是"正室",而且,陪嫁而来的两个姑娘反而也成了姨太太和她排在一起,其中的一个还排在她的前头,使自己屈尊于第三姨太太的位置上,这自然使她十分痛心。此外,在她们的头上还有一个厉害的大姨太太的管束,这对于年仅16岁的金氏来说,确实太痛苦了。可是,她远离家乡,无亲人可援,除了逆来顺受外,一个弱女子有何办法呢?由于长期的精神苦闷的压力,金氏的性格慢慢地变得古怪起来——一方面,似乎脾气很好,对家里所有的人都很和气,也从不和人争长论短;另一方面,不高兴时,也会因某个偶然原因或不值一提的小事闹起气来,甚至闹到难以收拾的地步。有时,这种古怪脾气发作,女儿和丫头都难逃责打,特别是对女儿的责打上,比对待儿子

更为厉害。由于精神的压抑，金氏经常是神情木然，似乎永远没有高兴的时候，她不但对待儿女没有什么亲热的表示，就是对袁世凯也是态度冷淡。她没有回过娘家，娘家的人也从没有来看过她。每逢过年、过节或生日的时候，她总是躲在暗处痛哭一场。就是在这种伤感和精神恍惚之中，她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袁世凯的五姨太太杨氏，系天津杨柳青人，是袁氏长子袁克定之妾马彩云为邀袁世凯的欢心而买来献于他的。杨氏出身于一个小户人家，长得并不甚漂亮，但口巧心灵，遇事能决断又有料理家务的才能，所以，深受袁世凯的宠爱，可以说，她是袁世凯后期最欢心的一个。平时，袁世凯的日常生活，都由杨氏一手经营，该吃什么，该穿什么，该换或该做什么衣服，都安排得有条有理。所以，袁世凯倚重她，不仅把贵重的财物交其收藏保管，而且，整个家务以及各房的女佣和丫头，还有六、八、九三个姨太太以及众多的子女们都让她管理，哪个不服从她的约束，她即可随时告诉袁世凯，由袁为其做主。因此，全家上下都因为袁世凯的缘故而对杨氏抱畏惧心理，就是“正妻”于氏也不例外。

1901 年后，袁世凯当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又陆续“置办”了六姨太太叶氏和七姨太太张氏。六姨太太叶氏的“置办”十分荒唐。当时，袁世凯曾派老二克文到南京为其办一件事情，袁克文生性好在外面玩乐，故此，有空之机就常到钓鱼巷一带消闲，在此认识了以唱髦儿戏而出名的叶氏，两人一见倾心，并互相订了嫁娶的盟约。在袁克文临行之时，对方把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了他。袁克文回津复命，正在向父亲袁世凯磕头的时候，不料那张照片却从他的身上失落了下来。袁世凯看到这种情况，就指着地上的照片连声说：“那是什么，那是什么？”袁克文当时还未结婚，自然不敢在父亲面前透露出自己的荒唐行为。他急中生智，就说是其在南边给父亲物色的一个好看的姑娘，现在带回这张照片，为的是征求父亲的意见。袁世凯一看照片上的倩影，甚为美丽，于是就连声说：“好！好！”接着便派人带着银钱将她接了过来。这位叶氏原以为是袁克文践约派人来娶她的，所以，很高兴地收拾行装，

欣然北来。没有想到在“洞房花烛夜”时,发现的不是那个意想中的翩翩少年,而是一个满嘴胡须的老头,心中的哀怨之情可想而知。但生米做成了熟饭,只好随它而去。



《分金记》中汪笑侬(右)饰演管仲,袁克文(左)饰演鲍叔牙



袁克文常用印鉴





“民国四公子”之一袁克文,没当过大官,生命不长,却也引人注意,仅2004年上半年就出版了其两本传记

七姨太太张氏，河南人。她没有生过子女。1908 年后，袁世凯被载沣赶回河南“养病”，她也由北京到河南辉县暂住，并生病死在那里。另据袁家人说，张氏后随袁世凯从辉县移居安阳洹上村时，因与花园工人谈话，为袁所见而令其服毒身亡的。

1907 年后，袁世凯做了军机大臣，在此任职期间，娶了八姨太太郭氏。她原是苏州的一个妓女。1909 年后，袁世凯隐居安阳的时候，又“置办”了九姨太太刘氏。刘氏是天津人，原系五姨太太杨氏的使女。

除上述的一妻九妾外，袁世凯称帝时，又在各妾房内挑选使女四人，预定作嫔妃，因病重，不及同房。袁死后，由长子袁克定给资遣走。

在袁世凯的妻妾中，除大姨太太沈氏和七姨太太张氏未生育子女外，其他都有自己的亲生子女，少则 1 个，多则 6 个。她们共为袁世凯生育子女 32 个，其中儿子 17 个。

1916 年袁世凯死后，大姨太太、二姨太太、三姨太太、五姨太太、六姨太太、八姨太太先后带了自己的子女搬到了天津居住（这时四姨太太、七姨太太已死去），于氏在安阳住了两年多，后来也移居天津。九姨太太先住在安阳，后来搬到北京去住了。一个封建的家庭，终因大树的倒下而瓦解。





袁世凯是怎样死的？

据袁世凯的后人讲，他致死的病症是膀胱结石症。此症最初的症状是小便困难，如果早住院导尿或开刀，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袁世凯一向坚信中医，不相信西医，尽管府中亦有两位西医，但从不请他们看病。直到最后的几天，他不能吃，不能尿，尿毒渐渐地在全身蔓延开来，已危及到生命的时刻，才在长子袁克定的坚持之下，请来了法国医生贝希叶诊治。贝希叶大夫说，这个病需要住院动手术取出结石，但袁世凯不肯到医院里去。于是，就在府中治疗，决定先行导尿。贝希叶在袁世凯的后脊梁上扎了一针，接着便用 5 个玻璃火罐在后腰部位往外导尿，但导出来的尿中已夹杂着血。袁世凯痛苦地呻吟着，家人都非常惊慌。到了黄昏后，袁已逐渐地昏迷不醒。第二天，即 1916 年 6 月 6 日的早晨 6 时，就死去了。



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段祺瑞

袁世凯直到临死前，头脑还是比较清楚的，他可能认为自己不会死，所以，既未留下什么遗言，也没有对后事做任何安排。

袁世凯的死，病症是致命因素，然而，导致病症加重、难以支撑的原因还在于精神方面。由于袁世凯搞帝制，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

原答应支持袁称帝的日本等国又违背诺言，反而要他取消帝制，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几个掌握军权的亲信，如冯国璋、段祺瑞等也背叛了他，甚至连最信任的四川将军陈宧（袁克定的把兄弟）、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先后通电宣布独立。这一连串的打击，使袁世凯羞愤交加，再也难以支撑下去，致使内外夹攻，不治身亡。







袁世凯归葬洹上的经过

1916 年 6 月 6 日，袁世凯在北京死去。两天之后，直到袁世凯的五弟、六弟从彰德、项城赶来，尸体才开始入殓。当时，因天气较热，而且袁世凯死前昏迷的时间并不长，一直保持着饮食，所以，死后第二天肚子就膨胀起来，向外散发臭味，嘴角也流出了暗色的血。入殓之时，臭味更大，膨胀的身体也更加胖肿了。死前做好的所谓“十二辰”的阴沉木棺材放不进去，只好临时加工定做了一个普通的阴沉木棺材。大殓时，袁世凯头戴平天冠，身着祭天大礼服，俨然如大行皇帝。

当时，北京政府发布了一道命令，追怀袁世凯的所谓“首绩”及表达“同悲”之情。内容说：辛亥革命时，“前大总统赞成共和，奠定大局，苦心擘画，昕夕勤劳”。所以，要“由国务院转饬办理人员，参酌中外典章，详加拟议，务极优隆，用副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因此，国务院确定了治丧负责人，又通令全国下半旗 27 天致哀，文武百官停止宴会 27 天，民间喜庆哀乐停止 7 天，一切按清代皇丧规矩办理。

袁世凯的棺材先停在怀仁堂正厅，家人轮流守灵。堂内外挂满了祭幛、挽联、花圈等，门前有鲜花扎成的牌坊一座，新华门外有纸彩牌坊三座。同时，还有五棚道士、和尚在堂外念经祈祷，超度亡灵。

6 月 28 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停了 27 天的袁世凯棺材正式出殡，移往河南彰德（今安阳市）洹上村。灵柩出新华门时，继任大总统黎元洪




袁世凯生前曾在洹上养寿园隐居垂钓

率国务院以下各官在此恭送。灵柩由海陆军仪仗队约 2 000 人开道，80 名“皇杠”抬着。沿途密布军警，道路铺黄土。灵柩后面的送葬官兵五千多人。灵车从前门车站出发时，还鸣礼炮一百零一响。这一天，京汉铁路停止运营，专为袁世凯灵车放行。当时，开出北京的列车，除袁世凯的灵车外，还有两列车，一列上运载卫兵、消防队以及殡礼仪品和服务人员等，另一列上载袁世凯旧部和政府的高级官员。这两列车在灵车后面开行，但早半天到达彰德迎灵。

袁世凯灵车经过保定、邯郸等大站时，当地文武官吏都搭了蓝白布素彩的路祭棚，并举行路祭。

29 日，袁世凯灵车抵达彰德。在此之前，在彰德车站已搭好了蓝白素彩五门牌坊一座，路祭棚一座，内设锣、鼓、梆、点以及金执事、幡扇、伞、牌、祭席、五供等。“袁柩从火车抬下放入路祭棚，由彰德官吏致祭后，仍旧安放在 80 名大杠上，所有杠前一切执事仪仗，都从火车上搬下来照旧排列，还有和尚、喇嘛、道士和鼓乐以及杠后女眷坐的白轿”等。袁柩先抬到洹上村袁宅的最后一重院落的中间大厅里。在这个院落里，已经由北京的扎把匠搭起了一座高五丈、外加走廊、称为“一殿一卷”的灵棚，它的外观和真的木结构大殿一样。棚内上下两层装有窗户，内部四周用蓝白绸、布扎成各样彩子，花样极细。灵棚上层摆着从北京运来的各种冥器，下层悬挂着僧道诵经用的红、绿、黄、白四色的大幡 12 件。灵前，搭了一个月台，上设有灵几，灵几上面供着袁的大照片和魂牌，周围有瓷器五供以及祭桌、爵杯等祭器。

8 月 22 日，举行了下葬前的“点主”典礼，这是一种封建迷信的风俗，据说经过“点主”，可以使死者“早日超生”。点主，就是在墓主人的“主”上少写一点，写成“王”字，然后由身份高的人，最理想的是点过翰林、主考或学政的人来点这一点。袁家的点主官是袁世凯的生前好友徐世昌。






徐世昌像


徐世昌行书七言联

头一天，先由写主官写好袁世凯的主牌，内容包括袁的生卒时辰八字、子孙名字以及袁的官衔和名字，并把木主上的“主”字少写一点，写成“王”字。在写主牌之前和结束后，袁克定都要在下向写主官行三跪九叩大礼，以示跪谢。第二天，由徐世昌点“主”。徐世昌一到，袁家鼓乐齐鸣，仪銮执事，鸣锣开道，袁家内外披红挂彩。袁克定穿蓝袍黑褂，恭恭敬敬地在门口迎候，并向点“主”官行三跪九叩礼。徐坐定，袁克定再行三跪九叩大礼。然后，徐世昌拿起吸饱红色墨汁的朱笔，面向东方，吸取“生气”，一口嘘在朱笔上，先在桌子上袁的木主的“王”字上加一点，然后用同样办法，用黑色墨汁的笔和蘸有鸡血的笔，再复点一次“主”字上的一点。这样三次，才算把“主”点好。在点“主”的过程中，袁克定跪在下面，在音乐声中叩头不已。点“主”毕，袁克定再行三跪九叩首礼。

点“主”仪式结束后，徐世昌在丰盛的筵席上饱餐了一顿，而且还得了不少的现款和衣料等物的馈赠。

8 月 24 日，正式出殡、下葬。

袁柩先用 80 人大杠抬出大门，送至坟地。然后改用 24 软杠抬入墓内石室大殿，依照择定的时辰，到晚上才安放在正中石座之上。这时袁克定率家属和亲友向袁柩行礼，然后退出石殿，闭上石门，袁世凯才



与世间真正隔绝开来。这时，坟地上焚烧着大批的冥器，包括纸房屋、香幡、香亭、松亭、纸钱，等等。

在熊熊的烈焰中，袁克定率众兄弟姐妹，向他们黄泉路上的父亲最后行礼告别。

袁世凯的坟地，在洹上村东北隅的太平庄，距袁宅二里许。袁家人基于时局不太平和入土为安的想法，所以在原来勘定的墓址上先修了一个砖圹，就安葬了袁世凯。此后，由河南巡按使田文烈继续负责修建袁墓工程。到 1918 年 6 月，最后竣工。大致情况是：墓地从南向北，按顺序是：影照壁、石桥、牌楼门、大丹陛，东西两侧有对称的石柱、石马、石虎、石狮、武官、文官等。神路正中为墓碑，上有徐世昌手书的“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九个大字。石碑照例由龙的第九个儿子、善于负重的赑屃驮着。墓碑过后是“飨堂院”。飨堂院有大门、围墙，墙内修建了七开间的飨堂，取名景仁堂。景仁堂两边有东西配房。景仁堂内供奉袁的“神位”，同时还陈列了他生前用的一切物品。经过景仁堂，就是一道铁门，铁门上嵌有巨大的墓徽。铁门后是石桌和五供，然后是袁的坟墓。袁世凯安葬时只是先做了一个砖圹，现在又在砖圹外面加修了一层水泥铁筋的套墙，有一米多厚。在地面上还修了一座三层的墓台，在墓地四周还种了许多的松、柏、梅、槐，称为“袁公林”。为管理这个“袁公林”，还设有一个管理员，管理员以下还雇用了司事、打扫夫、夫头等十几个人，由他们管理各项事务。



袁林又名袁家林或袁坟，是袁世凯的墓



袁林牌楼后神路旁的石狮、石马等，都是短腿

袁坟共占地 139 亩，典置祭田 1 000 亩，共花费了 732 700 多元才最后完工。袁林落成后，代总统冯国璋还派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麟前来致祭。

从上看出，袁的陵园还是非常气派的，但是，陵园的气派并不表明一个人的伟大。这个“袁公林”不仅没有使人产生敬仰之情，相反，一看到它，人们总是骂不绝口。他生前作恶多端，祸国殃民，死后又浪费人民大量血汗，真是“骨朽人间骂未销”，正此之谓也。









青年孙中山趣闻

一、虔诚的基督徒

孙中山(1866—1925年),幼时母亲给他取名帝像,因母亲平日恭奉关帝(关羽)像,希望儿子将来能成为像关帝那样的人。稍长,名文,字德明,号日新,1886年改号逸仙(粤语日新的谐音)。1897年在日本取日本名山中樵,他常说,我是中国的山樵,后来便以中山为号。他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父亲是佃农,全家以番薯为主食,吃不上米饭,穿不上鞋。当孙中山5岁时,他年仅17岁的哥哥孙眉,不得不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去檀香山(即夏威夷群岛)做工。他也自幼上山砍柴、放牛,参加田间劳动,10岁时才有机会入私塾念书。

1878年,12岁的孙中山随母亲去檀香山,投靠哥哥生活。次年入火奴鲁鲁英国基督教监理会主办的意奥兰尼学校(男子初中)学习,课程除了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之外,还有英语和圣经,由韦礼士主教讲授基督教教义课,从此他开始系统接受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的教育,每个星期日都要到圣安德勒大教堂去做礼拜。不久,他便热衷于读《圣经》和参加基督教活动,并想受洗入教,因哥哥孙眉的阻止而未实现。

1882年,孙中山在意奥兰尼学校毕业,入火奴鲁鲁美国基督教公



理会设立的奥阿厚书院(高中)学习。在这里上学的都是同夏威夷福音会有关系的传教士的子女,在这个环境里他对基督教的感情越来越深。

次年7月,孙眉担心孙中山皈依基督教而把他送返家乡。孙中山在海外五年的学习和生活,大大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在思想上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一天,他和好友陆皓东等来到村庙北极殿,看到一些老人在拜神像,他跳上供桌,打掉"北极帝君"的手指,并说:"看你这样威风,能奈我何?"接着又毁坏了左廊"金花夫人"塑像。此一大胆举动震惊了全村,为地主豪绅所不容,他被迫离乡去香港,入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拔萃书室学习,攻读高中课程,同时开始跟基督教伦敦传道会会长区凤墀补习国文。



18岁时的孙中山



陆皓东少年时像

孙中山的父亲是一个基督徒,并曾任职于布道会,当然支持孙中山入教。1883年底,终于水到渠成,17岁的孙中山和陆皓东等人一起,在香港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喜嘉理牧师行洗礼,正式加入基督教,成为虔诚的基督徒。从此,他与基督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且在困难的时候,一再得到教会和教友的帮助。

哥哥孙眉对他毁神像和入教很不满,函召他去檀香山,严加斥责,并要他自力谋生。孙中山想回国继续学业,但身无分文,他便向基督教会的朋友求助,夏威夷布道会牧师芙兰谛文热情为他向朋友募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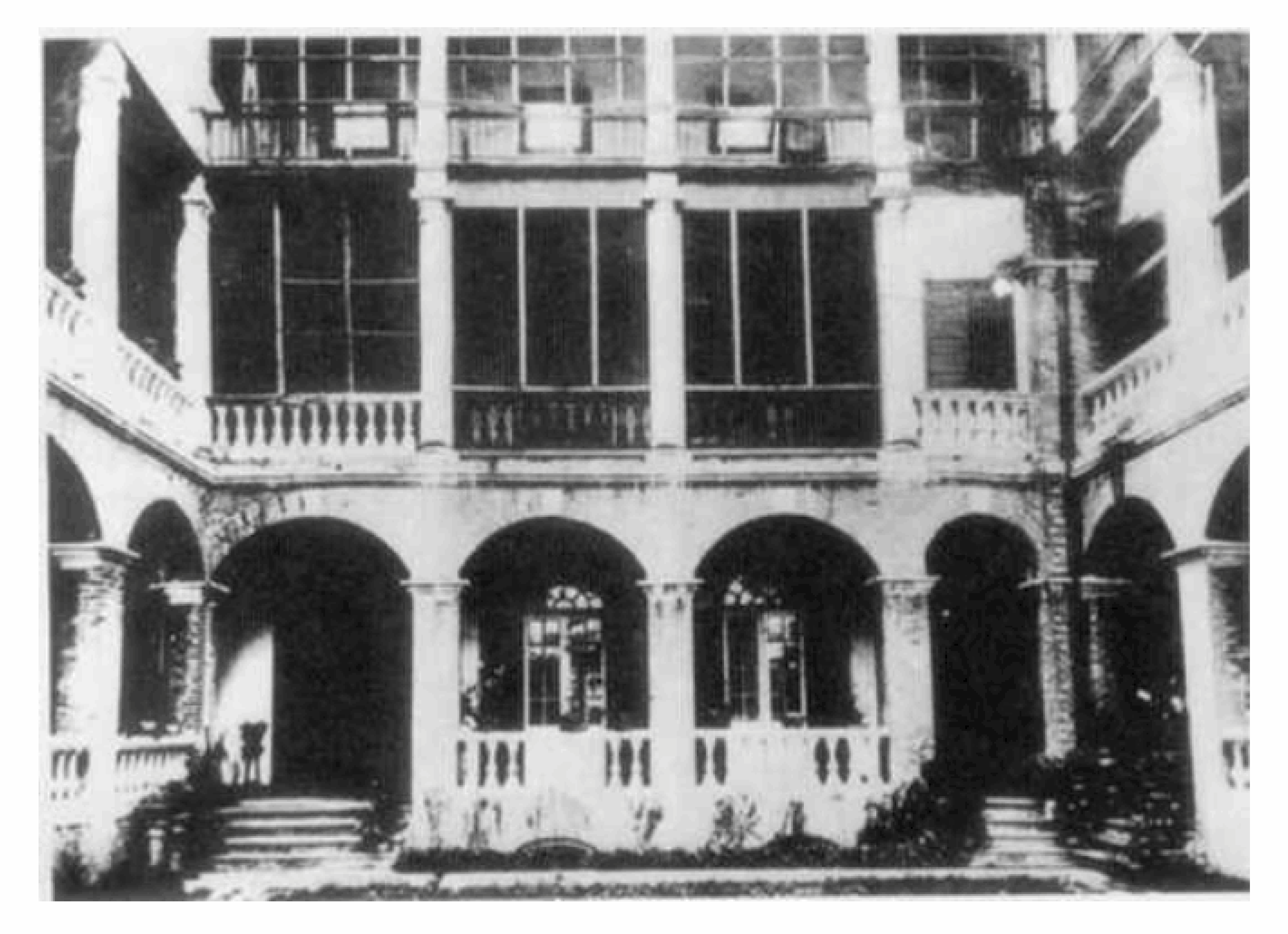


300 美元路费，在意奥兰尼的同学钟乙宇供他暂住，把一个月的薪金 5 美元相赠，最后让他在自己做工的裁缝店任意挑选所需衣物。这是孙中山入教后第一次接受教友的援助，使他得以顺利回国。



孙眉画像

1886 年，由喜嘉理牧师介绍，孙中山进入了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就读。这是一所由美国人嘉约翰博士主持的美英教会合办的



1886 年，孙中山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今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读书。图为南华医学堂旧址

学校。次年，香港伦敦布道会与香港议政局议员、著名的改良主义者何启等创办了西医书院，孙中山认为该校师资设备更优，便转学到该校。他在这里度过了愉快的五年，与该校的何启及首任教务长孟生博士、连任教务长康德黎博士建立了深厚感情，他们既是师生又是好友，使孙中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和帮助。

1892 年 7 月，孙中山结束了学生生活，在澳门行医。1893 年则转





1888年10月，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时与友人的合影(左起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关心焉、尢列)

赴广州行医，并在圣教书楼内设立医务分所。圣教书楼是一座宗教书店，也是广州最大的书店，它的后面是一个礼拜堂，书楼的业主左斗山是基督徒，经理王质甫牧师主持教堂礼拜仪式。孙中山和他们成了好朋友，他经常和进步青年在此礼拜堂聚会，纵谈时事政治，谋求救国方法。随着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孙中山积极筹划广州起义，又是以圣教书楼为秘密会议和贮藏军火的地方，以宗教为掩护，使筹备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兴中会的主要成员和起义的领导骨干如陆皓东、陈少白、谢缵泰、





1892年，孙中山回乡主持修建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孙中山故居”，孙中山和陆皓东常相聚于孙中山故居的书房，通宵畅谈，共商救国大计。上图为孙中山故居外貌及书房内景



区凤墀、左斗山、王质甫等也都是基督徒。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海外，1896年10月在伦敦被清朝驻英使馆囚禁，孙多次企图请使馆的英国雇员带信与外界联系，均告失败。在此生命攸关的危急关头，他相信上帝能帮助他脱离苦难。他在《伦敦蒙难记》中记述当时的情景写道：在绝望时，“一意祈祷”。宗教信仰成了他的精神支柱，一天他祈祷后，“竟觉方寸一舒，一若所祷者已上达帝听”。于是，他重燃希望，进一步说服英国雇员柯尔代为送信，这次竟然打动了柯尔，把信送给了他的英国老师康德黎，终于获释。他认为是他“祷告之诚，果上达于天也”，是上帝在默默“呵护”他。可见此时他对基督的虔诚。



1897年春，英国出版了孙中山用英文撰写的《伦敦蒙难记》，该书记述了他早期的革命活动及被难经过

二、“四大寇”与“孙大炮”

翠亨村有一位参加过太平天国革命的太平军老战士，他叫冯爽观，经常给村中的小朋友讲述洪秀全、杨秀清领导太平天国革命的故事。孙中山是最积极的小听众，百听不厌，兴趣极浓。当他听到太平军如何杀清妖、胜利进军、打得曾国藩投水自杀的动人情节时，不禁扬眉吐气，精神振奋，在他幼小的心田中播下了反清革命的种子。此后他一直很敬佩太平天国的英雄们，称赞洪秀全是“反清第一英雄”，立志向他学习，并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因他倾慕洪秀全，常常谈论洪秀全，所以，人们干脆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洪秀全第二”。

1890年以后，孙中山的思想有了较大的发展，对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官府的贪赃枉法极为痛恨，对人民的苦难极表同情，对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越来越不满，提出了“勿敬朝廷”的口号，这在当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大胆口号。他广泛结交进步青年，共同讨论时局，抨击朝

政,倡言革命,抒发救国救民的抱负。其中最亲密、最常来往和无话不谈的有陈少白、尢列、杨鹤龄等人。


陈少白像

陈少白(1869—1934 年),广东新会人,出身士大夫家庭,广州格致书院学生,思想进步。1889 年结识孙中山,一见如故,经孙引荐进香港西医书院就读,成为同校同学,并结拜为兄弟。此后一直是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得力助手和早期最亲密的战友,兴中会的领导人之一。


尢列像

尢列(1865—1936 年),广东顺德人,广东算学馆毕业生,是三合会的信徒,当时担任香港华民政务司书记,后加入兴中会,对后来孙中山联合会党有一定影响。


杨鹤龄像

杨鹤龄(1868—1934 年),与孙中山同村,生于澳门豪富家庭,与尢列同为广州算学馆毕业生,当时在香港自己家里所开的商店中工作,店内独辟一楼为朋友交往之所,孙中山在港时是他的常客。杨鹤龄后加入兴中会。

封建统治者总是把敢于反抗的革命人民说成造反者,诬蔑为盗寇。他们把太平天国革命说成“长毛造反”,诬之为“粤寇”。以孙中山为首的以上四人,年龄相近,志趣相投,敢于赞扬太平天国革命,敢于反对清朝的反动统治,因而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大逆不道,称为“四大寇”。

后来孙中山日益激烈倡导革命,到处鼓吹推翻清朝。因为当时革命还处在初期发动阶段,革命力量还比较弱小,很多人认为凭他们的力量要推翻根深蒂固的清王朝,简直是蚍蜉撼大树,自



不量力，是根本做不到的。因此把孙中山的革命宣传认为是说大话、放大炮，而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孙大炮”。他们做梦都没有梦到，正是这门他们瞧不起的“孙大炮”，经过十几年的奋斗，终于轰塌了清王朝的金銮宝殿，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

三、破除旧礼教

孙中山曾就读于香港博济医院，该院由外国人创办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 年)，开东亚西医西药之先河。后于光绪五年(1879 年)招生办学，兼收男女生，男女同校在中国也属首创。在孙中山入学时，班上有男生 12 名，女生 4 名。

该校在当时虽已比较开明，但破除男女界限等旧礼教仍很不彻底。故虽男女合班上课，却分开左右而坐，而且中间还挂着帐幕，把男女生分隔开。使孙中山更无法接受的是，到妇产科实习，只许外籍学生参加，不让中国籍学生参加。这引起孙与教师争执，去找校长评理，校长嘉约翰解释说:“中国人向来男女授受不亲，有礼教之防，我们西洋人则无须拘束。”孙问:“学医是否为治病救人?”校长点头称是。孙又一针见血反问:“难道中国学生学医就不是为治病救人吗? 中国妇女有病，中国医生能不救吗? 究竟是救命重要，还是不合理的旧礼教重要?”问得校长哑口无言，承认孙说的有理，从此不但允许中国学生诊查妇产科，而且撤掉了课堂中间的帐幕。

四、伦敦被囚，死里逃生

1895 年 10 月，孙中山亲临广州指挥广州起义，不幸事机不密，起义未发动即遭镇压，他被迫流亡海外。在日本横滨割断发辫留须，脱下长袍，改穿日本和服或西装，竟然面目一新，很多人误认他是日本人。次年，他游历美国各地，后于 10 月 1 日抵达英国伦敦。正好他的老师和挚友、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康德黎也从香港返回伦敦。他便住在康家附近的葛兰旅店，经常造访康德黎，过从甚密。



孙中山虽已出逃,清廷绝不善罢干休,广东地方官府悬赏花红银1 000元通缉,总理衙门更电欧美亚各国使馆,相机严加缉拿,故他的行踪常在清廷驻外使馆人员的追踪监视之下。当他从纽约乘“麦竭斯的”号轮船赴美时,驻美公使即已电告驻英公使,驻英使馆马上行动起来,派人严密监视,设法诱捕。

10 月 11 日,星期日,上午 10 时许,孙中山正从旅馆前往康德黎家,要和他们一起去教堂做礼拜。行至中途,突然有一华人前来打招呼,认同乡,走不多远,又来两个华人,热情邀他到住处喝茶,略叙乡谊,两人一左一右挽着他的胳膊,不顾他的婉言谢绝,连推带拉把他带进一大门内,当即大门关闭落锁,原来这就是清朝驻英使馆,以上三人均是使馆人员。此时孙中山顿觉不妙,但已无法脱身,被迫登上三楼一间窗户有铁栅的房间,从此即被囚禁在这里。使馆派人昼夜严密看管,并以7 000英镑的高价雇定了一艘2 000吨的轮船,企图把孙中山秘密解回广州处死;同时准备好若此计不成,即将他杀害于使馆,尸体运回国内戮尸。


孙中山在英被囚禁处

孙中山被囚禁于使馆,完全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心急如焚,处境艰险。他知道只有与外界取得联系,让他的老师康德黎知道他被囚,才有可能设法相救,这是唯一的希望。他所能接触的只有使馆雇来搞卫生和送饭食的两名英国工人,他写了求救信,企图让他们转达康德黎,结果失败了。因为使馆参赞、英国人马格里早已命令他们,如孙中山有书信要他们传递,必须把书信交给他,所以孙中山的书信都落入他手中,而他即是诱捕孙中山的主谋之一。此计不成,孙中山便把偷偷写好的求救信,包着铜币,乘看守不注意时用力丢出窗外,希望能有人拾到转给康德黎。可惜窗户离街太远,纸条多落入使馆院中,被使馆人员所得,干脆把窗户封死,监视也更加严密。至此,孙中山无计可施,“自忖必死,无再

生之望”。10 月 16 日，孙中山决心再作最后的尝试，说服来搞卫生的英国工人之一柯尔，告诉他自己是基督徒，力谋政治改革而遭陷害，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衷恳他代为送信。柯尔终于被说动了，答应次日给予答复。当晚柯尔将此事告知豪夫人，她对孙极表同情，劝柯尔代为送信。同时，她即于当夜写一便条，送到康德黎家，告知孙中山被禁于使馆，将被押解回华处死，请其援救。康德黎得此消息，立即夜访使馆参赞马格里，不遇，又先后到梅尔蓬巷警署和苏格兰场警署报案，均不得要领。

次日，柯尔将孙中山书写在两张名片上的信送达康德黎，康找好友孟生一同奔走营救。他们前往使馆、警署和外交部一再交涉，并把孙中山被使馆诱捕的消息告知媒体。21 日《地球报》以《革命家在伦敦被诱捕》、《公使馆之拘囚》等为题发表消息，这一爆炸性新闻，立刻为其他各报所刊载，轰动了伦敦舆论界，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英国外交部和警署派代表向清朝驻英公使馆提出交涉，直至 23 日，使馆抵赖不过，不得不把幽禁了 12 天的孙中山释放。孙中山得以死里逃生，转危为安。从此孙逸仙的名字不但英伦家喻户晓，而且传遍全球，大大提高了知名度，博得了人们的广泛同情，享有了国际声誉，坏事变成了好事。



孙中山伦敦脱险后，致香港友人区凤墀叙述经过的信

五、“纳妾”陈四姑



孙中山的平妻陈粹芬女士像

陈四姑（1873—1960年）名陈粹芬，又名瑞芬或香菱，人们多称之为陈四姑。1892年9月在香港与孙中山认识，她容貌秀丽，生性活泼，追求新思想，对孙中山很仰慕。次年孙中山在广州一边行医一边从事革命活动，陈四姑一直和他同居，住在河南，她虽无婚配正式纳妾之名，实际上已成了孙中山的一妾。后来孙中山到日本、南洋等地活动，陈四姑也追随左右，照顾孙中山的生活起居，并成为他的助手，为革命



孙中山与陈粹芬合影，据推测可能是拍于船上

党人传递讯息，印刷宣传品，乃至接送军火等，廖仲恺、胡汉民等人也都受到她的照顾。她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尽力，是颇有功劳的。

1914年陈四姑住南洋避乱，并投资橡胶园。1931年回香港，住在九龙弥敦道黄惠龙家。黄是台山人，是个彪形大汉，又工拳击，还能两手开枪，是孙中山的卫士，追随孙中山出生入死。陈四姑与他认识，故住在他家。后来她又奔走于广州、澳门之间，为孙科照顾两个孩子，即孙中山的两个孙子，1960年病逝，享年87岁。

中山装的由来

统观当今斑斓纷呈的服装世界，流派众多，款式日新月异。但究其根底，只不过是中式服装与西式流行装共享天下。而在形形色色的中式服装当中，中山装在其间则一枝独秀，并且经久不衰，至今仍被众多中老年人与青年人所钟爱。

具有如此巨大魅力的中山装，是由辛亥革命元老黄隆生（1870—1939 年）先生设计的。他原系广东省台山县斗山洞洋村人，早年赴南洋谋生，学到了一手精湛的裁缝技艺，成为颇有名气的裁缝师。后来，在越南河内行蕉街经营一间洋服店。他虽然长期身处异邦，却一向关心祖国的兴衰，总想报效祖国。



身着“中山装”的孙中山先生

1902 年，孙中山来到河内开展革命活动，黄隆生立即前往拜会孙中山，并加入了兴中会，成为孙中山在越南发展的第一个兴中会会员。后来，他被推举为兴中会河内分会的负责人。此后，他就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事业。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经常举行各种集会,会后总要合影留念,只见照片上革命同志间的服饰繁杂,有的西装革履,有的长袍马褂,给人一种陈旧杂乱之感。因此,就有人建议应该统一服饰,以焕发革命者的朝气。孙中山表示赞同,并提出:新的服装应立意于创新,既要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特点,又要适合当今世界的潮流。他就委托黄隆生负责设计制作。

黄隆生受此重托以后,按照孙中山的身材尺寸,参阅了中外众多的服装款式,运用自己多年的裁缝经验,认真设计了几种较为满意的式样,并亲自动手缝制好,送到孙中山住处。孙中山一下子就看中了其中的一件,马上试穿起来。这件服装显得十分庄重典雅又大方,在场的人都连声称赞。此后,孙中山在公开的场合,总是穿着这种新设计的服装,革命党人纷纷争相效仿,一时间就使这种服装流行开来,并被称呼为"中山装"。这样,中山装就成了中国的国服。直到今天,中山装仍然受到众多男士的喜爱。





邓世昌和他的“太阳犬”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黄海大战中，邓世昌率领致远舰全体官兵 250 人，英勇作战，重创敌舰，最后全部为国捐躯，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



黄海海战前“致远”号部分官兵合影，图中站在梯口的军官即为邓世昌，在他右侧站立的外国人为该舰英籍轮机长珀维斯，照片中所有人均在海战中阵亡



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今天，在风光秀丽的山东省威海市环翠楼公园大门前的花坛中，耸立着一尊高大的清军爱国将领、致远舰管带（舰长）邓世昌的铜像。在铜像的左脚边，铸有一条伏卧着的狗，这条狗就是邓世昌生前十分宠爱的“太阳犬”。



山东威海环翠楼公园邓世昌像

邓世昌（1849—1894 年），广东番禺人，福州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邓世昌在威海卫刘公岛北洋水师供职时，豢养了一条良种狗，取名叫“太阳犬”。太阳犬整日陪伴着邓世昌，不论是出海还是驻营，总是形影不离，而且颇通人性。每逢邓世昌的战舰远航归来，刚刚抵达港湾码头，太阳犬总是先跃上岸，疾奔回家中去报信。邓世昌需要召唤何人或要给人传递消息时，太阳犬总是忠实而准确无误地照办。据传说，太阳犬还容不得任何人讲邓世昌的一句坏话，它似乎懂得人语，只要听到有人稍微讲到邓世昌的不是，总是气得发抖而暴跳。



中日甲午海战中致远舰与日本吉野舰战斗时的情形

在9月17日中日黄海大战中，致远舰多处受重伤，一直战斗到弹尽炮毁，邓世昌就指挥残舰全速朝敌舰撞击，不幸被日舰发射的鱼雷击中，全舰官兵被震入汪洋大海之中。落水的士兵将救生圈递给邓世昌，他拒不接受，表示要与战舰共存亡，誓不独生！这时，他的太阳犬急速游到身边，一而再，再而三地拼命扯拽着邓世昌的衣襟和发辫，要拖他浮出水面逃生，而且还大声哀嚎不止。邓世昌几次挣脱，可是太阳犬硬是死死拉扯住不放，邓世昌只得忍痛先将太阳犬按入水中溺死，随后怀抱爱犬，沉入茫茫大海之中，以身殉国。







革命“怪人”章太炎


章太炎像

章炳麟,浙江余杭人,因崇拜顾炎武而自号太炎。他是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又是国学泰斗。他革命意志坚定,不为任何恶势力所屈服,学识渊博,为后人所景仰。但他生性怪异,且常有惊世骇俗的言行,流传下来不少趣闻,被称为革命“怪人”,甚至被讥为“章疯子”。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孙中山派代表迎接他去日本主编《民报》,他在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大发宏论道:“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者,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这大概可以作“章疯子”的注脚吧!

章太炎曾三次去日本,留下许多趣闻,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他初到日本,对日本的习俗不了解。有一天去澡堂洗澡,忽然看见一日本女子脱光了身子,一丝不挂地也进去同浴,吓得他羞窘万分,赶紧逃了出去。那日本女子见状,开怀大笑。原来那时日本人男女同浴是司空



见惯的。

有一天，日本警察来查户口，让章太炎填写调查表。章很反感，便填写如下：职业，填圣人；出身，填私生子；年龄，填万寿无疆。因章太炎素有圣人之称，而日本人私生子很多，所以借此来讥讽日本警察。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他再次逃亡到日本东京，三月十九日（4 月 26 日），是明代崇祯皇帝去世的忌日，在日本的革命志士，想利用它来宣传反清革命。章太炎等十人在东京发起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章亲撰宣言，号召奋起推翻清朝。留日学生热烈响应，报名参会者达数百人。清廷大为震惊，遂与日本交涉，请禁止此次集会。日本政府同意了清廷的请求，在开会的前一天，日本警署传讯大会发起人。章太炎穿着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大袖长衫，手摇大羽扇，气宇轩昂地来到警署，警长劈头就问：“你们是清国何省人？”章朗声答道：“我们是支那人，而不是清国人。”警长又问：“你们是士大夫还是平民？”章立即回答：“是遗民。”这种回答完全出乎警长的意外，他们不顾章等人的据理抗争，仍下令禁止召开此纪念会。次日，日警把按时赴会的留学生强行驱散。章等不甘罢休，便召集一部分人，改在横滨永乐酒楼补行纪念会。

章太炎是中国历史上广告征婚的第一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章的小妾王氏去世，留下一女。他时年 34 岁，正当壮年，在朋友的关心催促下，决定续弦，征求志同道合的女士为续偶。便在《顺天时报》和上海的一些报纸上刊登《征婚告白》，内容如下：

“鄙人近感鳏况岑寂，欲获得一白头伴侣，匡我家室。然必具有以下三者，方为合选：一须文理通顺，能作短篇文字者；二系出名家闺秀，举止大方者；三有服从性质，不染习气者。”

世界上第一个征婚广告，虽已刊登了二百多年，但在中国却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一惊世骇俗之举，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婚姻习俗发起了第一次挑战。可惜当时的名门闺秀，仍在旧封建婚姻桎梏下，即使开明的女性，也还没有勇气应征。不久他因鼓吹革命，即所谓

"《苏报》案",而被投入监狱。1906年出狱后,便去了日本,一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回国。所以在刊登征婚广告十年后的1913年,才在孙中山的秘书长张通典的撮合下,与符合征婚条件的学识渊博的革命者,比他小15岁的小学校长汤国黎女士结为伉俪。在上海著名的哈同花园举行盛大的结婚典礼,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革命党领袖亲临祝贺,来宾达两千余人,由蔡元培做证婚人。以不修边幅闻名的新郎也西装革履,可惜皮鞋左右脚穿错了,走起路来一拐一摇,人们仔细一看才发现他穿错了鞋子,引起哄堂大笑。



章太炎与汤国黎女士结婚时情景

章太炎托人在上海大陆坊物色了一所房子,作为婚后新居。他在学问上博闻强记,说起话来引经据典,然而,对自己的家,住了很长时间仍然记不住街巷名称和门牌号码,出了门自己也找不到家,总得有人陪同。

有一天,他应邀去孙中山家,当他要回自己的家时,恰巧孙家的车和陪同人员都有事出去,他只好自己回家。他在街上叫了一辆人力车,车夫问他到哪里去,他向前一指说:"回家。"车夫便照直向前跑去,跑了好一阵,觉得有点不对头,又问他家住在哪里。章仔细想了一下说:"我家在马路旁的弄堂里,弄堂口有一家纸烟店。"其他的就记不起来了。这话等于没说,上海所有大马路两旁都是弄堂,谁能记住弄堂口有纸烟店,何况弄堂口有纸烟店的也很多,偌大上海要车夫到哪里去找?车夫没办法,只好拉着车到处打听。

妻子汤国黎见章太炎迟迟不归,深感疑惑,便打电话到孙家询问,得知他出孙家门已很久,按路程早该到家了,知道丈夫是走丢了,心急如焚,慌忙派人四处寻找。在千街万巷的大上海,要把他找回来谈何容易,简直是大海捞针。事也凑巧,正当汤国黎找到上海非常热闹的大世



界附近时，却意外地看到章太炎端坐在人力车上。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她喜出望外，把他领回了家。

有一天外出，章太炎遇到一位朋友，拉他到小酒店喝酒，要付款时，一摸衣袋，他才发现忘了带钱。他便对朋友说：“老兄，我钱包忘在家中了，今天只好不客气了。”朋友忙说：“当然由我来付款。”可是伸手一摸衣袋，顿觉惶恐说：“出门时明明把钱包放进衣袋，怎么不见了？”酒店的招待见状很不客气地说：“我看你们二人是存心来吃白食的，否则哪有两个人都不带钱坐下就吃的道理！”章只好陪笑说：“钱我马上就去拿，一切照付。”招待忙说：“不行，脚一跨出店门，谁认识你是张三、李四？”朋友说：“钱我去拿，请老兄屈尊坐一会，我去去就来。”章只好留下当人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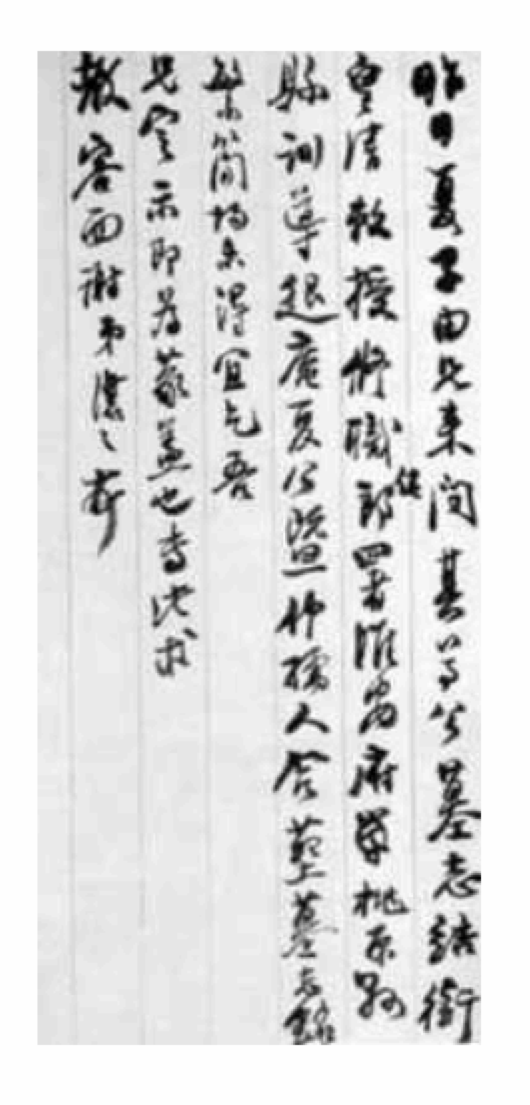
不料等了一下午，也不见朋友回来，急得章如热锅上的蚂蚁，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还要受店家的奚落。原来是那朋友去取钱时，路过一书摊，看见一本难得的好书，爱不释手，细细读了起来，竟忘了酒店还有一个人质在等他。直到书摊收摊时，朋友才想起来，急忙回家取钱，赶到酒店已是掌灯时分，进门时，只见章太炎正在焦急踱步。朋友将经过一说，两人不觉相对大笑起来。

有一次，他邀请田桓、汪东、但焘三位好友聚会，彻夜长谈。天较冷，田桓忘了穿夹裤，要回家去取。大家正在兴头上，不让他走，并开始作联句游戏。田桓首先开口说：“不穿夹裤是田桓。”汪东接上说：“穷极无聊两县官。”因汪东和但焘都曾做过知县，但他们都是清官，不盘剥百姓，两袖清风，所以卸任后除了一堆书籍之外，没有什么钱财。故但焘接着说：“剩有图书三万卷。”最后轮到章太炎，他有心和他们开玩笑，便说：“图书三万卷要值多少钱！可见你们宦囊丰满，必是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他便摇头晃脑吟出最后一句：“地皮刮尽水都干。”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辛亥革命后，他曾对袁世凯有过幻想，但随着袁氏称帝野心的暴露，他便坚决反袁，毫不妥协。1913 年 8 月，章度蜜月不久，应共和党



之邀,冒险进京,被袁世凯软禁。起初袁试图拉拢他,托人致意想和他见面,他以眼病推辞。袁拉拢不成,便命警察厅以内乱罪把他管制起来,派宪兵昼夜守门,不许随意出门和会客。



章太炎手札

次年1月7日,他手持被袁暗杀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所遗留下的羽毛扇,用原先袁世凯颁发给他的二级勋章作扇坠,借以表示他对牺牲的革命先烈的怀念和对袁世凯的蔑视,前往新华门,大闹总统府,大骂袁世凯。并曾作《上世凯》书,极尽嘻笑怒骂,说袁“食客千人,朱履相耀,炳麟之愚,宁能与鸡鸣狗盗从事耶”!

他还曾写“速死”两个篆字,大有半米见方,挂在屏风上,使人一进门就能看见,表明誓死与袁世凯斗争到底,绝不屈服。他对袁恨之入骨,在书案旁到处都写了“袁世凯”三字,每天都要反复敲打它多次以泄愤。1915年曾写“明年祖龙死”,祖龙指袁世凯,诅咒他明年死。不料袁果然在次年因帝制失败而死,极为巧合。



章太炎书法作品

他在被软禁期间,有时也应邀在监控下出席宴会,曾在冬天拿大蒲扇去赴宴。主人还没有入席,他一到便坐下大吃起来,旁若无人,还连连催促快上菜,吃完掉头就走。

他也曾两次绝食,以抗议袁世凯剥夺他的自由。他的门生鲁迅、钱玄同等都前往劝解,并偷偷把补品冲入茶水中给他饮用,他发觉后也予拒绝。经多日绝食,已气息奄奄,马叙伦去探望,一再劝他进食,仍不为所动。马起身告辞,章说:“我已是垂死的人,以后恐不能再见面了,何不留下多谈片刻?”马说:“我肚子很饿了,得回家吃饭。”章说:“我这里可以给你准备饭吃。”马

说：“面对一个绝食的人，我怎么吃得下去？你若有诚意请我在这里吃饭，除非你也陪我吃一些。”章只好点头同意，吃了一碗鸡蛋汤。正好他最钟爱的三女儿从南方来探望他，再三劝解，才恢复了饮食。一直到袁世凯死后，他才获得自由。

章太炎嫉恶如仇，尤其痛恨叛徒。有一个参加过民党的山东人，后来背叛民党，投靠袁世凯，并毛遂自荐去监视章太炎。他竟恬不知耻，请章替他已死的父亲作传。章鄙夷地讥讽说：“你不是袁世凯门下的小走狗吗？……我当为你父亲作一篇好传记予以流传。”弄得他满面通红，无地自容。

还有一个原也参加民党的孙岳，后来依附贿选总统曹锟。有一天，孙岳来访，章手持拐杖站在楼门口，当孙要进门时，章举起拐杖迎头痛击。一边打一边骂道：“你孙岳是北洋军阀的走狗，有何面目来见我？”打得孙狼狈逃窜，章仍一路追击，骂声不止。

康有为后期一直反对革命，章太炎等人曾与他就革命还是保皇问题展开激烈论战，对康有为颇为不齿。康平生极爱好古董，在诗中曾写道：“我生好古多幽癖”，观赏抚摸古董，“似伴佳人娱日夕”，“有若匹夫加九锡”。他把玩古董看做人生最大的乐趣和高尚的享受。在 1923 年游览古都西安时，他乘机收集了不少碑刻拓片等，此举引起很多人的攻击，甚至有“康圣人盗经”的谣传。章太炎因此作了一副缩脚联予以抨击。联曰：

国家将亡必有；
老而不死是为。

把“有”、“为”二字嵌入联末，骂他老而不死，乃至把“国家将亡”也归罪于他，未免过分。

章太炎与康有为相比，在政治上是新派，然而，在文化上他与胡适相比，却又成了旧派。章是执国学牛耳的泰斗，极力提倡古文，反对白



话文。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不遗余力地提倡白话文。两个人的主张针锋相对，时有争论，但限于学术观点之争，仍维持私交友谊，并未反目成仇。



胡适像

有一天，两人在北京不期而遇，交谈甚欢，还合影留念，并题诗互赠。奇怪的是，一向提倡古文的章太炎却用白话文写新诗，而主张白话文的胡适却反而用文言，按古诗的格律写了一首七绝。章太炎的新诗是：

你姓胡来我姓章，
你讲什么新文字，
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
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
将来三五十年后，
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
哈，哈，我写白话歪诗送把你，
总算俺老章投了降。

胡适的七绝是：

但开风气不为师，
龚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开风气人，
愿常相亲不相鄙。

两个人的诗都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却又不强求对方屈从自己的主张，表示了要相谅相敬相亲，而不相鄙。这是对待学术问题的正确态



度，可以作为后人的榜样。

后来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没有忘记赠送章太炎一本，并在扉页上恭敬写上：“太炎先生指谬”，落款书“胡适敬赠”。这本书是中国最早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书之一，当时的新式标点符号，凡是人名都要在右边划上一道黑线以表示它是人名。所以胡适在写赠书题词时，在太炎和胡适两个人名的右边加了一道黑线符号。章对新式标点符号一窍不通，看到在自己名字的右边画了一条黑线，不知是何用意，还以为是对自己的侮辱，顿时大怒，骂道：“何物胡适！竟敢在我的名字上胡抹乱画！”可当他低头一看下面的落款，在胡适名字的右边也有一条黑线，这才消了气，幽默地说：“他的名字旁边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吧！”

章太炎对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十分敬重，1924 年冬，孙中山北上寻求全国统一，路经上海，曾拜访过章。入京后病重，章得知后十分焦急，开了一剂中药方托人专程送往北京，期盼能治愈孙的病。孙去世的噩耗传来，章很悲痛，写了《公祭孙公文》，把孙比作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高度评价他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的功勋。同时撰写如下挽联予以颂扬：

洪以甲子灭，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间成败异；
生袭中山称，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

“洪”指洪秀全，他领导太平天国革命失败，死于 1864 年，这一年是甲子年，故称“洪以甲子灭”。孙中山死于 1925 年，这一年是乙丑年，殂即死亡，故称“公以乙丑殂”。两个人死的日期前后相距 61 年，章认为洪秀全失败了，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了，推翻了清朝的统治，故称“六十年间成败异”。孙中山早年对明代开国元勋徐达非常敬佩，徐达辅佐朱元璋南征北战，屡建奇功，最后推翻元朝，驱逐异族的统治，建立了明朝，被封为“中山王”，所以孙文以中山为字。明太祖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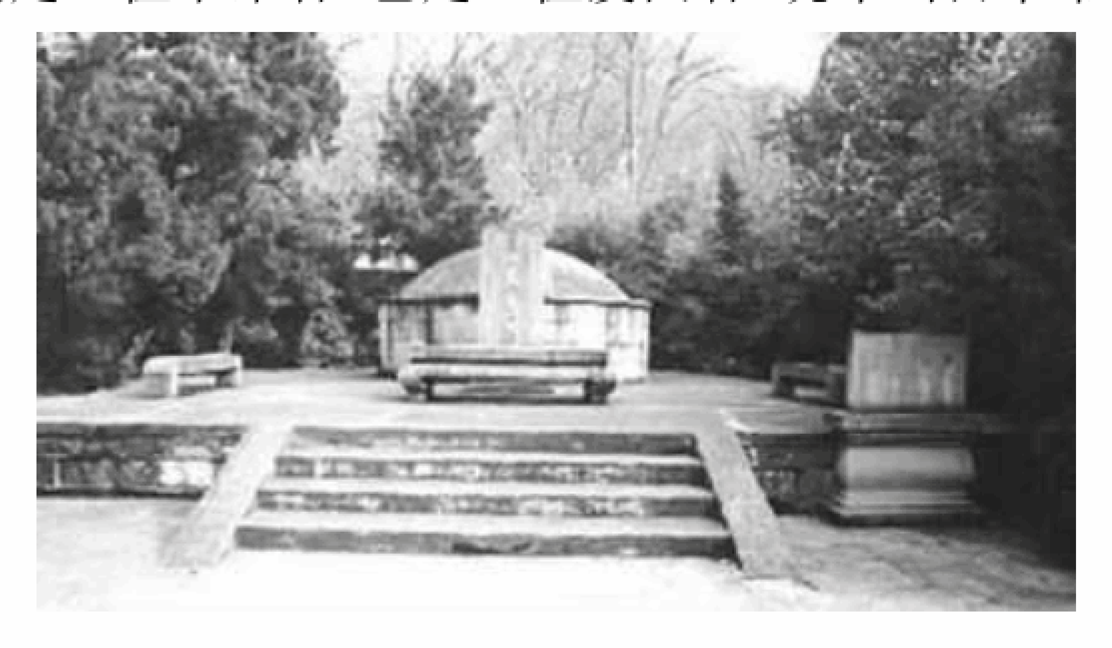


元璋死后葬于南京的钟山下,他的陵墓叫"孝陵"。孙中山的墓中山陵也在南京钟山麓,邻近明孝陵。章太炎颂赞他们二人驱除异族的统治,一匡天下的丰功伟业古今相同,所以写了以上的下联,充分肯定孙中山的历史地位,热情地歌颂了孙中山的功绩。

章太炎不但性格怪异,而且爱用怪僻的字。例如他的一部论文集,题书名为《訄书》,訄(音求),以言相迫的意思。他生了三位千金,个个都起怪名,叫章㸚、章㠭、章㗊。可谓独出心裁,分别用四个"×"、四个"工"和四个"口"给她们起名。㸚,音丽或音迤,《说文》解释为"二爻"。爻,音摇,有交的意思。《段注》:"二爻者,交之广也。"㠭,音掌,是古"展"字。古义,视察也,四工同视,形容极巧视察的意思。㗊,音儿,就是"众口"的意思。这三个字一般字典难以查到,很少有人知道它们的读音和意思。据说因人们不认识她们的芳名,没有人敢去提亲,后来他才意识到都是他所起怪名的缘故,赶忙向各亲朋好友广为解释它们的读音和含义,才使三千金陆续嫁了如意郎君。

1986年10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发行一套《辛亥革命著名领导人物》纪念邮票,全套3枚,包括孙中山、黄兴和章太炎

章太炎是一位革命者,也是一位爱国者,晚年当日本帝国主义入侵



章太炎墓在浙江杭州南山路苏堤路口,边上有章太炎纪念馆,还有他夫人汤国黎之墓





杭州章太炎先生纪念馆

中国，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时，他忧心如焚，恕不可遏，与马相伯联名通电全国，号召抗日。他所撰电文深刻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两句是：“欲专恃长城，则无秦皇之力；欲偷为议和，并无秦桧之才。”把他说成秦桧不如，对蒋的鞭挞入木三分。章太炎临终时还留下遗言，谆谆告诫后代子孙说：“设有异族入主中原，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体现了他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章太炎平生最仰慕明代开国元勋刘基（字伯温），认为刘伯温辅佐朱元璋推翻元朝的统治，道德功业可歌可颂。他希望自己死后能葬在刘伯温的墓旁，“以申九原之慕”。他 1936 年 6 月 14 日病逝于苏州，享年 69 岁。章太炎始葬于苏州，1955 年才迁葬于杭州西湖南屏山麓，与明代末年的爱国英雄张煌言之墓毗邻。



鲁迅像

鲁迅写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对章太炎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这是对章太炎革命一生的写照。



吴禄贞为革命捐躯

吴禄贞，湖北省云梦人，字绶卿。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入湖北武备学堂学习，次年由张之洞以官费派往日本留学，入士官学校骑兵科，不久加入兴中会。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唐才常在日本筹划自立军起义，吴大力支持，随后潜回国内，企图运动张之洞反清。自立军起义失败，吴禄贞想过长江逃往大通，在汽艇上见两名侦探尾随着他，正准备投江泅水逃跑，忽然听到汽笛声，两侦探相互说："大概不在这里。"就下船去了，他才逃过了这一关。



吴禄贞像

他到达上海，与朋友去澡堂洗澡，发现又有一名侦探跟踪他们去洗澡。洗完澡，侦探故意碰掉吴的衣服，放在衣袋中的信件纷纷掉出，其中有唐才常给他的信，幸亏他的朋友手疾眼快，赶紧捡起来，故意埋怨他说："银票怎么可以这样疏忽，不把它收好。"二人匆匆穿好衣服出门上车，刚才那个侦探仍怀疑他们，又急忙追出门查问他们的来历，他们开车急驰而去，又逃过一劫，速乘日本邮轮返日。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吴禄贞毕业回国，1907年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到奉天（今辽宁省），任军事参议。不久任延吉边务帮办，后升



任督办。他深入实地调查，写出《延吉边务报告》三册，证明延吉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在揭露和挫败日本侵略者在所谓“间岛”领土问题的斗争上起了重要作用。

他有血性和爱国精神，气识胆略过人，凡外国人犯法，都依法严惩不贷，致使外国侨民不敢像过去那样目无法纪，为非作歹。东三省日侨很多，一听到吴禄贞的大名，无不畏惧。



吴禄贞在吉林安图县所立的“石门山”石碑，是其在东北边防、教育上作出贡献的佐证

有一天，日本驻长春领事前往拜访吴禄贞，马车停在大门外，影响交通。中国委员让日本车夫把车移到路旁，日本车夫不但不听，反而举起马鞭抽打该委员。委员用日语与他讲道理，并告知他是委员有责任管此事，日车夫仍骄横地继续鞭打他。他将此事报告吴禄贞，吴大怒道：“在中国的土地上岂容日本人横行霸道。”他命人把日本车夫抓起来，亲手用刀割下车夫的左耳朵，顿时鲜血淋漓。日本领事前来诘责，吴理直气壮地答道：“你别再说了，你若再说，我就再割下他的右耳朵。”终于把日本领事镇住，不敢再强辩。



1911 年 10 月 29 日阎锡山就任山西军政府都督

宣统二年（1910 年），吴禄贞任陆军第六镇统制（相当于师长）。次年，武昌起义后，他暗中策划北方响应，去滦州联络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共同举兵反清。时山西标统阎锡山响应革命，打死山西省巡抚，被举为山西省都督。清廷派吴继任山西省巡抚，前往镇压革命。吴却暗中与山西革命军联系，共组燕晋联军，吴任联军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副之，并企图联合北方新军举兵直捣北京，推翻清朝统治。



他的计划若能实现，必将加速清朝的灭亡，甚至不会有袁世凯挟清廷以自重和后来的洪宪帝制。

可惜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因他断然截留北洋军运往湖北的军火，并电奏清廷，指责荫昌统领的进攻武汉的军队军纪败坏，应予严惩，并停止进攻武汉。清廷怀疑他是革命党，由满洲旗人都统良弼（一说袁世凯），以重金贿赂吴的部下第十三协统领周符麟，让他设法暗杀吴禄贞。

1911 年 11 月 7 日夜，吴禄贞正与参谋周维桢、张世膺密谈军务。突然有第一镇旗籍两名管带，以祝贺吴荣升山西巡抚为由求见，谈约 20 分钟，起身告辞。吴送他们出门，两管带乘其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举刀乱砍，割下吴的头去领赏。张、周二参谋同时遇难，吴死时年仅 32 岁，闻者无不痛惜，全营将士更是哭声震天。



河北石家庄原来的吴禄贞烈士祠



现在的石家庄长安公园吴禄贞墓





湖北云梦吴禄贞纪念园



1912 年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孙中山大总统即发布命令嘉奖吴禄贞，并以大将军例，赐一次抚恤金 1 500 元，其家属每年抚恤金 800 元。阎锡山发表通电，称吴是“民党英杰，军界伟人”。次年在石家庄为其铸铜像，立石碑，供后人瞻仰和纪念。



国民党创始人宋教仁轶闻

一、捍卫国家领土主权

1907 年 4 月,宋教仁到东北联络“义军”(“马贼”),准备响应孙中山等在南方组织的武装起义。此时,他探听到日本参谋本部组织的长白山会企图吞并我国的间岛地区。

间岛实际上只是吉林省光霁峪图门江中的一个小沙洲,又称夹江岛,属于中国领土。但是,自从 1905 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就侵占了间岛,并别有用心地把附近一带的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全部纳入间岛地区。这对于从小就热爱并熟知中国地理,并在地理方面具有渊博知识的宋教仁来说,倍感怒火填胸。为了捍卫中国的领土主权,他装成日本人,化名贞村,冒着生命危险摄取到了日方许多伪证。接着,他又在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翻阅了大量资料,凭着自己丰富的地理知识,写成《间岛问题》一书。该著作详细叙述了间岛的来龙去脉以及该地区的历史沿革,用大量确凿的证据证明间岛地区自古属于中国领土,



宋教仁像



并提出了解决间岛地区问题的正确途径。

1907 年 9 月，袁世凯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他凭着宋教仁的这本书，和日本进行了谈判。由于铁证如山，终于争回了间岛地区主权。清廷从日本手中争回了地权，认为宋教仁有功，除大加赞扬外还发给一笔赏金。不料这件事，造成了一部分反清革命同志对他的误会，认为他已变志屈节，为金钱而投靠了清廷，宋教仁为此受到嫌疑。他愤懑之极又无从解释，只有抱头痛哭了一场，还把赏金全部散发给贫困的中国留日学生，并表白道：“我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

二、组建国民党

1912 年 3 月，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位后，其政府要职，如内务、外交、陆军、海军等均被袁氏党羽或亲袁政客所把持。仅把教育、司法、农林、工商几个无足轻重的部门留给同盟会成员，宋教仁因此出任农林总长。上任不到三个月，他决计要“以政党内阁为号召，在选举时争胜”，于 7 月 8 日提出辞呈。嗜权如命的袁世凯在 7 月 14 日就将他同教育总长蔡元培等一起免职。

宋教仁辞职后，就一心一意致力于组织政党，以便实现组织政党内阁的宿愿。他在征得孙中山、黄兴等的同意后，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小党派，组成国民党。并修改了同盟会的革命政纲，提出“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励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维持国际和平”的政纲。



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发动和领导武装起义斗争的领袖黄兴

1912 年 8 月 25 日，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了国民党成立大会。当日上午 8 时，会场内外人头攒动，前来参加成立大会的约有两千多人。孙中山来到了会场上，全场一片欢腾，热烈的掌声一阵高过一阵。在宋教仁和林森等人的

主持下,成立大会正式开始,孙中山在大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会议推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人文、王芝祥、张凤翙、吴景濂、王宠惠、贡桑诺尔布等九人为理事,孙中山、黄兴任正、副理事长。由于孙中山等忙于其他事务,委托宋教仁代理党务,所以主持党务的实际上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





林森像



同盟会的第一个女会员唐群英(1906年于日本东京)



唐群英设计的女子参政同盟会会员徽章

当成立大会进行到宣读党纲时,由于"男女平权"条款未写入其中,马上引起了到会的女同盟会员的一致强烈抗议。在群情激昂的气氛里,突然从人群中跃出一位女士,她愤怒地冲上讲台,猛然扬起手掌,向宋教仁和林森击去,宋、林猝不及防,躲避不及,恰好被打在脸上,这一举动顿使全场惊愕。

这位女士是谁?她就是中国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驱者,被孙中山先生誉为"巾帼英雄"的唐群英,是年41岁。她痛心疾首地宣称:"当民军起义时代……女子等牺牲生命财产与男子同功。何以革命成功,竟弃女子于不顾!"大声为男女平权而抗争。

原来从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组织成立国民党的过程中,唐群英等为争取男女平权,不仅成立了"女子参政同盟会",还先后五次上书民国临时参议院。然而,每次上书都石沉大海,毫无结果。在成立国民党的大会上,竟在党纲中又没有写上"女党员"及"男女平权"等条





文，此举引起了唐群英等女同盟会成员的强烈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唐群英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愤，冲动地动了手，使会议最终不欢而散。

二、一身正气垂千古

国民党的成立，使宋教仁一跃成为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的人物。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看到宋教仁极力主张建立责任内阁制，深感自己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决计要收买宋教仁。他派人"送二十万金，一为交通银行存折，一为中国银行存折，并说明如不足尚可增加"，还以资助政治活动经费为名，又送"一本支票簿"。宋教仁却将"支票和存折"原封不动地退还给袁世凯。袁不甘心，又派人间接表示，只要宋教仁不坚持责任内阁制，就一定借重他担任内阁总理，宋也"一笑置之"。袁世凯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他听说宋教仁的妻子是一个农村妇女，貌不出众，又没文化，便把宋教仁叫到自己家里，"关切"地说："我的一个亲戚的姑娘才貌双全，极有胆识，可以成为你的贤内助，我把她介绍给你好吗？"宋教仁坚决地回答道："你知道我是有妻子的，她虽然其貌不扬，但非常贤惠，我们的感情很好，我绝不能这样做。谢谢大总统的美意，再会！"说罢扭头就走。



大總統宣布參議院議決臨時約法

茲准參議院咨送議決臨時約法前來合行公布

孫文

中華民國元年三月十一日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

第二條 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第三條 中華民國領土，爲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

第四條 中華民國以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國務員，法院，行使其統治權。

第二章 人民

第五條 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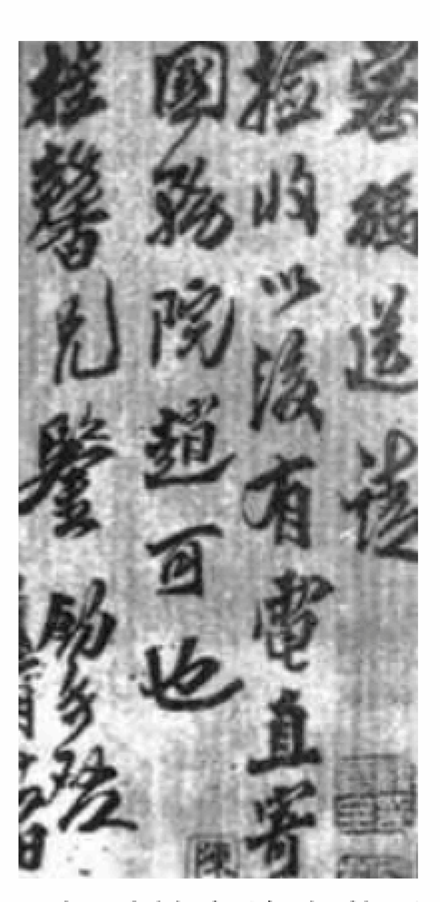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一页

袁世凯恼羞成怒，见金钱、高官、美女等诱惑都不成功，就决定动用御用文人在报纸上对宋教仁进行诽谤，造谣说他将纳某名妓。实际上宋与这个妓女从不相识，知情者都气愤地要宋教仁"驰电辩证"，他则坦然地说："是奚足诬我者？！"仍倾注全力从事政务。

袁世凯施尽了伎俩，都无法使宋教仁屈服。最后，他决计要除掉不



遇刺身亡的宋教仁



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赵可也。桂馨兄鉴 钧手启

赵秉钧交给应夔丞联络密码的手令



民国二年三月廿一日上午九点二十分
上海电报局发寄北京第四等一
第一千六百四十一号电报计三十三字
译文如左
北京椿树衚衕洪荫芝君鉴

应夔丞向洪述祖报告刺宋任务已完成的密电

屈不挠的宋教仁。宋的一个朋友闻风后，劝诫宋教仁警惕袁的谋害。宋教仁依旧坦然地说：“我不为诱惑所动，也不为强暴所骇！”表达了一个革命志士大无畏的浩然正气。然而，由于疏于警惕，1913 年 3 月 20 日，宋教仁于上海车站遭到了袁世凯主使的凶手的狙击，两天后不幸逝世，壮志未酬，遗恨千古。

中国首任总统杨衢云

一般人都认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推举的首任总统是 1912 年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实际上，早在 1895 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筹备举行广州起义时，就曾举行过一次“总统选举会议”，并推举出了一位“合众政府大总统”，这位总统就是杨衢云。



杨衢云像

杨衢云（1861—1901 年），原名飞鸿，字肇春，又字合吉，号衢云，福建海澄（今龙海）人，自少年时期即任侠好义，尤关心时事，精通武术。曾在香港湾仔国家书院任教员，担任过招商局船务书记长，新沙宣洋行副经理等职。1891 年在香港结识孙中山以后，常在一起研讨救国图强等问题，并于 1892 年同谢缵泰等成立以“开通民智，讨论时事”为宗旨的“辅仁文社”。



谢缵泰像

谢缵泰（1872—1937 年），祖籍广东开平，生于澳洲，1887 年到香港，肄业于皇仁书院。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爱国志士，在从事革命活



动的同时,一有空暇,便潜心研究和试制飞艇。他用铅制成艇壳,装上螺旋桨推进器和发动机,制造出了"中国号"飞艇,并于1894年试飞成功,成为了我国第一个制造飞艇的人。后来,在1898年他激于民族义愤,面对外国列强瓜分中国的危局,拍案而起,绘出了一幅形象而生动的《东亚时局形势图》(即著名的《时局图》),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各国的侵略野心和清廷丧权辱国的丑恶嘴脸,以警示国人。



时局图

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机关,吸收了杨衢云、谢缵泰等创办的辅仁文社成员参加,积极筹划在广州发动起义。

孙中山、陆皓东、杨衢云、郑士良、谢缵泰等人多次开会,研究起义计划和设计起义后的诸项事宜。当时,革命党人决定举行一次"总统选举会议",推选一位"合众政府大总统"。



1897年孙中山(二排中)、杨衢云(前排左二)及日本友人合影

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实际上有资格当选大总统的只有孙中山和杨衢云两人。在会议选举过程中,以谢缵泰为首的一派坚持拥杨,以郑士良为首的一派强烈拥孙。拥孙派和拥杨派不相上下,并且各不相让,郑士良甚至想杀掉杨衢云。孙中山见状,为维护革命党人内部团结,顺利发动广州起义,决定以大局为重,主动劝说拥护自己的革命党人选举杨衢云,还历数杨积极投身革命事业的功劳,同时公开宣告自己退出"竞





杨衢云遇难处香港中环结志街 52 号今貌

选”，从而使杨衢云顺利当选，成为起义胜利后将要建立的“合众政府大总统”。这样，杨衢云便成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推举出的第一位大总统，比孙中山于 1912 年被推举担任临时大总统早了 17 年。后来，由于广州起义夭折，杨衢云又于 1901 年在香港被清廷派人刺杀身亡，这位中国首任“合众政府大总统”也随之湮没于历史的尘烟之中，不为世人知晓。



毛泽东青少年时期轶闻

一、孝子



1913年时的毛泽东

毛泽东对母亲非常孝敬和爱戴。他的母亲名叫文其美，湖南湘乡人，嫁给湘潭毛顺生（贻昌）后，按习俗称毛文氏。她是一位勤劳、善良、有思想的妇女。她虔诚拜佛，力图以行善积德来影响夫权主义思想严重的丈夫和教育孩子们。她先后生了七八个孩子，只有毛泽东、毛泽民、毛



1919年11月，毛泽东同父亲毛贻昌（左二）、堂伯父毛福生（右二）、弟弟毛泽覃在长沙合影



泽覃长成人，她把全部的爱和希望都倾注到儿子们的身上，尤其是对排行第三实际上为长子的毛泽东关怀备至，千方百计总要让毛泽东读书求学。



1919 年 7 月毛泽东（右一）创办《湘潭评论》时与弟弟毛泽民（右三）、毛泽覃和母亲在湖南长沙合影

毛文氏对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有很大的影响。在她的影响下，毛泽东早年也崇佛。当母亲生病时，他总是求神拜佛，祈求神灵保佑母亲早日康复。15 岁时（1908 年），毛泽东还曾几步一拜地到离韶山一百多公里的衡山大庙烧香求佛。

1919 年，毛文氏患腮腺炎。当时，毛泽东在长沙任教，闻知母亲生病的消息，急速赶回韶山把母亲接到省城医治。由于病情恶化，毛文氏还是谢世了，享年 53 岁。毛泽东悲痛欲绝，跪于灵前，以泪和墨写下了《祭母文》和挽联，记叙了母亲的养育深恩和高尚品格，字里行间洋溢着母慈子孝的真情实意。



毛主席故居



毛泽东在故居晒谷坪

后来，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1959 年重返韶山时，他独自一人寻到父母的坟墓前，久久伫立，寄托无限的哀思。当随行人员找到他时，他动情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不信鬼神，但生我者父母，这还是要讲的。



二、当兵

1911 年春,毛泽东到长沙读中学。10 月,武昌起义爆发,长沙革命党人纷纷起来响应,使湖南成为第一个响应起义、宣布独立的省份。

有一天,一位革命党人在征得学校校长许可后,到学校来向学生们作推翻清朝的激动人心的演说。激烈的言词、奇特的话语深深打动了毛泽东和听演说的学生们的心。大家心情异常激动,纷纷表示要投身到反清的革命洪流中去,不能只埋头读书,不能对这场革命袖手旁观。于是,毛泽东与几位学友商讨后,决定去参加革命军。

当时,长沙城里各校学生已经组织有一支学生军。但是,毛泽东认为学生军成分太复杂,不算真正的革命军,他就报名参加了长沙的正规军。当年,毛泽东刚刚 18 岁。

毛泽东参军以后,被编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他第一次领到一支崭新的步枪,枪号为 8341,为了纪念此事,后来北京卫戍部队便以此为番号,他非常珍爱这支枪,经常随身携带和擦拭。由于他在部队里勤学苦练,仅仅几个月时间,就把当时军队里那一套基本训练搞得很熟了。此外,他还主动承担起军队的一些勤务工作,脚踏实地为革命出力。

毛泽东虽然参加了新军,仍然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当时,每个士兵一月能得到饷银七八元,不少士兵发了饷,就上街吃喝玩乐去了。而毛泽东除了开支两三元伙食费和水费外,其余的钱都用来买书、订报纸。每天操练或值勤以后,人们常常看见他独自在仔细阅读报纸或看书。


1911 年湖南第一师范原貌

1911 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取得成功,清朝被推翻了,但袁世凯逐步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正当新军准备起来反对袁世凯时,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和议,南北实现"统一"。这样,毛泽东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







毛泽东就读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时的同学合影

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深造。不久，他便考入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所以，毛泽东总共当兵不过半年左右。

三、爱憎分明

1912 年，《湖南公报》招聘了三名专门抄稿的年轻人。这三位年轻人在抄稿时各有自己的特点：一位是不问文稿的内容，只按原文认真照抄，一言不发，老老实实地认真履行职责。另一位则是见到文稿中有了问题，总是要提出来，并加以修饰润色，满意了才抄上去，对所抄文稿都要进行一番修补、发挥和创新工作。第三位却是个性突出，爱憎分明，看到与自己观点相同的，爱不释手，奋笔疾书；一旦看到与自己认识相悖的文稿，根本不愿抄写，有时干脆放在一边，不屑一顾。



湖南韶山毛泽东纪念园

后来，这三位年轻人的成就也不一样。第一位将文稿全部照抄无误的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默默无闻；第二位则成了中国著名的作家、戏剧家，他就是田汉先生；第三位却成为了改变中国现代历史发展方向的巨人和伟大领袖人物，他就是名震中外的毛泽东。



愿作男儿身的女词人吴藻

在封建社会里，妇女处在社会的最底层，饱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封建思想意识、道德规范的桎梏。男女极不平等，"女子无才便是德"，不知扼杀了多少有才华的女性。女子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不能做官，也不能享有与男子同等受教育的权利，甚至女子不可抛头露面，深藏闺阁，缠足束胸，不得自由。很多天赋极高的女子，不得不默默无闻，了却一生。能够冲破封建束缚，有所成就的才女，只不过是凤毛麟角。她们要比男子付出数倍的艰辛还仍受到诸多限制。于是许多才女叹惜自己是女儿身，梦想能成为男子汉，著名女词人吴藻就是其中的一位。

吴藻（1799—1862年），字苹香，号王岑子，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父亲和黄姓丈夫都是商人，而且两家之中均无一文人。唯独她极富文艺天才，既能绘画又善抚琴，尤其对词曲有极浓厚的兴趣，广泛阅读，手不释卷，对不少词曲能倒背如流。

人们见她喜爱词曲，便鼓励她自己创作，她经过精心构思，终于写出了处女词作《浪淘沙》。不料一鸣惊人，其处女作十分成功，广为当地名流所传诵，对她自身也是极大鼓舞，从此开始了词曲的写作生涯，并得以结交诗人词客。更幸运的是，当时著名的大诗人陈文述正广收女弟子，她得以拜门受教，在名家指点下进步很大，成为陈门高足，得以与词坛俊秀、耆宿相唱和。



吴藻著有《花帘词》和《香南雪北词》两部词集，获得诗词界很高的评价。她的老师陈文述亲自为她的《花帘词》作序，赞美道：“疏影暗香，不足比其清也；晓风残月，不足方其怨也；滴粉搓酥，不足与其缠绵也；衰草微云，不足宣其湮郁也；顾其豪宕，尤近苏辛。”称她的豪宕之气，近似宋代杰出大词家苏东坡、辛弃疾，可见其评价之高。





《梅花如雪悟香禅：吴藻词注评》试图解读吴藻的精美词作及其人生情怀

然而，她对封建束缚极为不满，哀叹自己出身女流，梦想能摆脱“束缚形骸”的女儿身，变为英俊豪迈、叱咤风云的男子汉。因此，她特创作了杂剧《饮酒读骚》，又名《乔影》。这部短剧只有谢絮才一个人物，剧情也并不曲折复杂，写的是才女谢絮才边饮酒边读《离骚》的故事。剧中的谢絮才是一个“生长闺门，性耽书史，自惭巾帼，不爱铅华”的才女，她悲愤慨叹：“若论襟怀可放，何殊绝云表之飞鹏。”无奈自为巾帼，备受束缚，“竟似闭樊笼之病鹤”，要想飞也飞不起来了。实际上剧中的谢絮才就是她吴藻的化身，借剧中的曲白以发泄自身的愤懑情怀，也是对封建束缚的抗争。

她还自画一幅肖像，穿的是男子服装，题名《饮酒读骚图》，寄托她欲变巾帼为须眉的心境。这幅画得到一些名人的题词咏赞，如齐彦槐题词云：“一卷《离骚》酒百杯，自调商徵写繁哀。红妆抛却浑闲事，正恐须眉少此才。”许乃谷则赞颂：“须眉未免儿女肠，巾帼翻多丈夫气。”她的性格的确很豪放，颇具大丈夫气概。

那时医学还不发达，不像现在可以实行变性手术。所以，吴藻一心愿换男儿身的志向根本不可能实现，充其量只能聊以自慰自怜，有时触景生情更增加自己的哀伤。有一天，她换成闺阁女装，来到书房玩阅，



“借消愤懑”，对着自己的男装画像读《离骚》，不禁狂饮痛哭，泪如泉涌，借酒浇愁愁更愁。她伤心自我凭吊道：“能几度夕阳芳草，禁多少月残风晓！题不尽断肠词稿，又添上伤心图照。俺呵，收拾起金翘翠翘，整备着诗瓢酒瓢。呀，向花前把影儿凭吊。”哀怨之情溢于言表。

她晚年移居南湖，万念俱灰，潜心修道，不再写作，以度忧患余生，享年63岁。







左宗棠军中的“花木兰”

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有一天，手下人来禀报，军中记名提督陈某求见。由于此人一向骁勇善战，屡建奇功，左宗棠马上召见。

陈某上堂后，一头伏在地上，一味请求左大帅宽恕。左宗棠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急忙问是什么缘故，陈某缓缓抬起头来，将情由一一禀告大帅。

陈某虽是军中的一员虎将，却是一个女儿身，今已怀孕，特来直言禀报，请求看在从军多年的分上，从轻发落。

左宗棠一听，惊骇不已，追问其故。

陈某如实禀报道：十年前（1862 年），多隆阿将军奉命从安徽率军入陕西督办军务，攻打回民起义军。有一位安徽读书人朱某，年少体姿丰美，多年科举应试，均名落孙山，为谋求一官半职，投笔从戎，被任为军中书记，经数年辗转，随多隆阿大军出关入陇。

军队途经荆子关（今荆紫关）时，部队招募了一批脚夫，从事辎重粮草运输和干杂务。应募者中有一位陈姓年轻人，面孔黧黑而且布满痘瘢，长相丑陋但性情豪爽，令人称奇的是力大过人，人们却料想不到她是一位女性。从军后，她先为军队牧马，由于肯吃苦又能干，深受同伴们称赞，不久就提拔为兵士。她作战英勇，敢于冲锋陷阵，屡建奇功，不断被提拔，官至记名提督，在沙场上雄飞了十年之久，现正统领着一



支部队,随大军东征西战。

前几年,安徽人朱某被调到她率领的部队中任书记。朱某为人和蔼,工作认真,深得陈统领的厚爱,尤其朱某的人品才学都出众,更加讨得陈提督的欢心,久而久之,不由得触动了她深埋已久的女儿心。

有一天,陈统领忽然单独召见朱某,要他陪酒夜饮。畅饮到夜静更深,陈统领邀请朱某同榻留宿,朱某不肯,立意要返回自己的营房去,陈统领不由得大怒,借着酒性拔出佩刀要杀朱某,朱某骇然不知所措,只得服从了。哪料到登床共寝,方知陈统领乃是一位女子,并且还是一位处女,朱某从军多年,极难见着女人面,不觉大乐。此后,朱某每夜都留宿在陈统领帐内,同僚们却十分鄙视朱某,认为朱某和陈统领在一起搞同性恋。

随着时间的流逝,陈统领的腹部渐渐大起来,即将临产了。她不由得日夜焦虑担忧,又不敢去找人堕胎,只有和朱某商量对策,朱某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最后只好怂恿她直言禀告左宗棠大帅,并以古代花木兰的故事来安慰她,认为看在军功卓著的分上,也许不会受到责罚。这样,她才冒死前来禀报大帅。





花木兰艺术形象,受到中外听众、观众喜欢,
与她有相似经历者,也应该得到人们的关注

左宗棠在惊异之余,本想据实奏报朝廷,听从发落,但手下幕僚则劝告说:“事情涉及欺君之罪,恐怕朝廷会斥责治军不严,不如就此了结为好。”于是,左宗棠就任命朱某顶替陈统领的名字,统率其军队。而陈某则易服还其女子面目,朱、陈二人正式结为夫妻。

当左宗棠的大军平息了陕甘回民起义以后,朱某就请求退伍还乡。朱某返回故里后,又纳了二妾,这使陈某大怒,挟其资财和所生儿子转回了西北,以后一直住在兰州。



彭嫣与吴保初的纯真爱情

彭嫣，江苏常州武进人，字秀云。母亲早死，父亲年老穷困，因生活所迫，幼年即入戏班为伶人，在江浙一带演戏。15 岁时已能唱南北曲 400 阕，而且艳姿妙舞，尤精剑术，矫捷如飞，已颇有名气。后来到上海读书，认姓金的人为养父，改名金菊仙。她心怀大志，忧国忧民，见时局日坏，忧心如焚，遍访豪杰，却难觅知音。正在她苦恼之时，突然有一个叫吴保初的人闯入她的生活。

吴保初，安徽庐江人，是已故淮军著名将领、广东提督吴长庆的次子，弱冠时即以主事升任刑部郎中。因为他工诗歌，精篆刻，一时名流都争先和他交往。他与清末巡府之子谭嗣同、陈三立、丁惠康过往甚密，被并称“清末四公子”。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他曾向皇帝上书发表政见，引起刑部长官的惧怕，一致压制他。他见在此处为官难以施展抱负，便拂袖而去，浪迹江湖。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他再次进京，上书政务处，请慈禧太后还政于光绪皇帝，受到扣压，不能上达。他便去了上海，卜居梅福里。此时章太炎因



《清末四公子》书影





鼓吹排满,被清廷通缉,吴急派人迎他至寓所,加以保护,供给衣食,相处近三年之久。

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吴保初在上海大宴诸名士,久闻金菊仙之名,便请她出席宴会。大家知道她善于曲艺,请她献上一曲,菊仙身体不适,为不使大家扫兴,勉强哀歌一曲,以至咯血,吴保初急忙劝止她。次日起,菊仙大病一场,可门巷冷落,无人探望,唯独吴保初前往慰问,并极为关怀,替她奔走求医,使她的病很快痊愈。两人话语投机,相见恨晚,菊仙乃闭门谢客,单独与吴保初竟日清谈,每谈及国家现状,相互叹息流泪。

经过半个月的接触,彼此了解日深,菊仙以找到知己而庆幸,便主动表白愿委身于吴的心迹。吴长叹一声说:“我妻子悍妒异常,不能带你到家中去,旅居上海又怕我经济上难以供给,你能忍受得了这种处境吗?”这时上海有两个京官,争着愿出万金娶菊仙为妾,戏院老板很高兴,劝菊仙应允。菊仙说:“我所要的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何必要那么多钱?”一口予以拒绝。

有一天,她和吴保初一起饮酒,乘酒兴对吴说:“君的情况我都知道,如我们两人一起生活,经济上应不成问题,我历年积蓄客人送给我的钱已达万金,我全都给了你好不好?”吴也很爱她,并为她的诚意所感动,笑着说:“我所要的是知己,他无所求。”菊仙毅然说:“既然如此,更待何时?”竟和他同车返回他客居的寓所。菊仙时年 24 岁,定情之夕,请吴作词以为纪念,吴满怀喜悦幸福之情,作《满庭芳》词一首,菊仙大喜,把它谱成曲,手弹琵琶演唱以侑酒取乐。从此夫妻极为恩爱,形影不离,吴曾作《天贶姻缘记》记其事。浙江的朱祖谋、江西的陈三立及诸名士,也都为此天作之合所感动,纷纷作诗词予以称颂。


陈三立像

金菊仙自从嫁给吴保初,便改名为彭嫣,拜



陈三立为师，向他学习诗词。吴保初又教给她篆刻，从此她更迷恋嗜好金石词章，技艺日益精进。彭嫣的大名更广为流传在公卿之间，士大夫鲜有不知其名者。

彭嫣的积蓄坐吃山空，尤其在他们出游日本归国后，经济更为困难，彭嫣的首饰也当卖殆尽。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起，吴保初不得不去当袁世凯的食客，携彭嫣定居天津。袁世凯为什么肯资助他呢？原来他的父亲吴长庆是袁世凯的伯祖父袁甲三的部下，和袁世凯的父亲是好朋友，袁父死时，是吴长庆给他办理的丧事，并教养袁世凯长大成人。吴长庆奉命出兵朝鲜平乱，袁在其营中训练军队，成为后来袁发迹的基础，而且袁的发迹也得力于吴长庆的提携。吴保初和袁世凯是世交朋友，所以当他去投奔袁时，袁问及他的近况，他毫不客气地直率说：“我要饭来了。”袁便留他住下，每月发钱给他。

吴并不赞成袁的为人和政见，不得已而寄人篱下，心中总是怏怏不乐，常署名叫“瘿公”，瘿是指附着于他人的赘生物，表明他心中的苦闷。彭嫣朝夕以欢笑来慰解他，更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伉俪感情更笃。吴曾对人说：“我得了彭嫣才知道天地间有人生的乐趣。”后来彭嫣得重病，群医引避，无人敢负责为她治疗。吴保初请来日本医生，答应治好彭嫣的病酬以千金，医生还是辞谢而去。吴一再痛哭流涕请求救治，经过精心治疗和吴无微不至的照料，她的病居然治好了。吴虽然经济困窘，仍信守诺言，千方百计筹措千金相谢。不久，吴保初病倒了，彭嫣竟割下臂肉为他治病，长相厮守。其纯洁的爱情令人羡慕与景仰，在世风日下的时代，更是难能可贵，可谓一对情真意笃的模范夫妻，足可为世人之楷模。

侠女吴芝瑛


女书法家吴芝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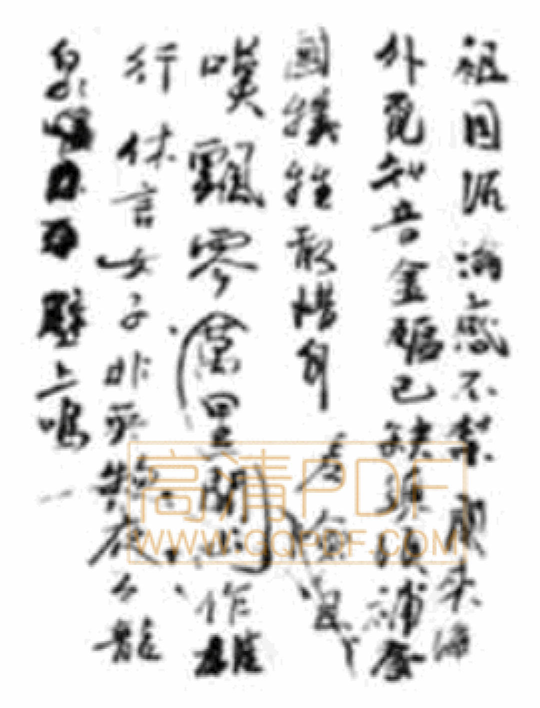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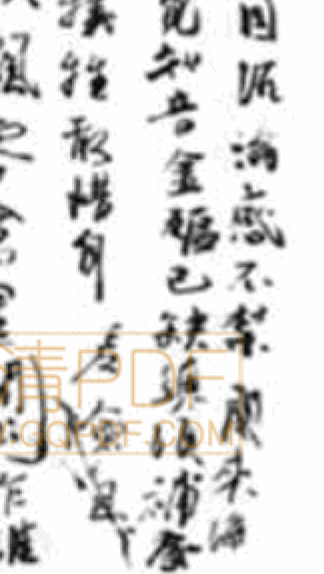
吴芝瑛（1867—1934 年），字紫英，号万柳，安徽枞阳县浮山乡人。父亲吴鞠隐曾任山左县县令，思想较进步，伯父吴汝纶是著名桐城派古文大家。芝瑛是独生女，父母钟爱如掌上明珠，从小受到系统的良好教育，承袭家学渊源，故诗文书法俱佳，并称三绝，是当时著名的才女。尤为难得的是她具有侠肝义胆，主持正义，乐于助人。

吴芝瑛 19 岁嫁给江苏无锡人廉泉。廉泉举人出身，是诗人和书法鉴赏家，后来进京担任户部郎中的小官。芝瑛随丈夫到北京，夫妻感情很好，家庭幸福。廉泉有爱国维新思想，1895 年康有为领导要求变法的上书运动，他也是签名者之一。芝瑛也受到新思潮和丈夫的影响，关心国家大事和国民的命运。


秋瑾戴帽像

她与秋瑾的情谊尤为动人。鉴湖女侠秋瑾由父母包办嫁给湘潭富家子王廷钧，他是个纨绔子弟，不能通过科举取得官职，花钱捐得户部主



秋瑾诗词手迹



浙江省博物馆所藏秋瑾撰写的《精卫石》手稿(1905—1906 年)

事,正好与廉泉同部共事,八国联军入侵时,避难回湘。1903 年王廷钧回京复职,秋瑾陪同进京,居住在匠绳胡同,恰巧与芝瑛是邻居。两位侠女、才女志趣相投,肝胆相照,相见恨晚,竟成了最好的朋友。廉泉开办了开明书局,并与报界多有来往,家中藏有很多进步书报,外面不易见到,秋瑾便常到芝瑛家阅读,共同探讨时局,研究世界新思想、新科学,以及诗词唱和,互相鞭策,共同进步。次年正月,她们便由莫逆之交而结拜为异姓姐妹。吴芝瑛比秋瑾整整大十岁,成了大姐。她对小妹秋瑾婚姻的不幸,极为同情,帮助她挣脱封建包办婚姻的束缚。秋瑾有志到日本留学,寻求新的出路,她也大力支持,给予经济上的资助。临别时她还召集在京众姐妹在陶然亭为秋瑾壮行。秋瑾作《宝刀歌》和《宝剑歌》以抒发她的爱国激情,决心为救国而奋斗牺牲。《宝刀歌》曰:“宝刀之歌壮肝胆,死国灵魂唤起多。”《宝剑歌》指出“世无平权只强权”,“公理不恃恃赤铁”,“茫茫国恨何时雪”?决心以铁、血来改变这不合理的社会,“死生一事付鸿毛,人生到此方英杰”,完全置生死于度外。这些铿锵的诗句震撼人心,感人肺腑,传诵一时。吴芝瑛更为之自豪和感动,对秋瑾也更加敬佩。

1906 年秋瑾回国发动革命,不幸事败被捕,坚贞不屈,吴芝瑛冒死竭尽全力奔走营救无效,秋瑾于 1907 年 7 月 15 日被杀害于绍兴城中的轩亭口,年仅 31 岁。其族人怕被株连无人敢收葬烈士遗骸,后来由



黄梅戏《风雨丽人行》展现了吴芝瑛、秋瑾及另一位江南才女徐淑华(自华)三人之间的生死情谊

她哥哥赶回绍兴才草草入殓。吴芝瑛大哭一场,1908年2月,她病刚好即和她们的另一结拜姐妹徐自华,在杭州西湖西泠桥畔、岳王坟东买了一块墓地,冒雪渡钱塘江,把烈士灵柩运往安葬。她们为什么选择此处埋忠骨呢?原来在秋瑾牺牲之前半年,秋瑾与徐自华同游西湖,走到岳王坟,秋瑾素来仰慕尽忠报国的岳飞,故在此处恋恋不舍,不忍离去,徐自华半开玩笑地说:"你难道死了也要葬在这里吗?"秋瑾万分慨叹说:"我死后如能埋葬在这里,那就是我的福气了。"因此,她们根据烈士生前的愿望而把她移葬在这里,这既是对死者的尊重和肯定,同时也是对清廷诬蔑烈士的否定和抗议。徐自华还为秋瑾撰写墓表,由吴芝瑛手书勒石,墓碑正面是"鉴湖女侠秋瑾之墓"八个大字,并在墓前哀读祭文,泣不成声。吴芝瑛又在她上海的寓所建"悲秋阁",供奉秋瑾塑像,题挽联曰:"英雄尚毅力,壮士多苦心。"其丈夫廉泉也特请故乡无锡的著名画家吴观岱画了《西泠寒食图》,寄托对烈士的景仰和哀思。秋瑾墓落成后,前往凭吊的人士络绎不绝。农历二月十五日是花朝节,即百花的生日,芝瑛来到秋瑾墓前凭吊,写下悲愤的悼亡诗四首。

他们的正义行动"义声动天下",却刺痛了清廷反动统治者,都察院御史常彻上奏朝廷,说吴芝瑛与秋瑾同党。清廷下旨平毁秋瑾墓,拿办吴芝瑛、徐自华等人。这时,吴正在上海租界德国人所开医院治病,亲友无不劝她暂不出院,借外国的势力以避祸。她却决心继承秋瑾的精神,不愿托庇于外人,毅然抱病出院,专等入狱。但此时清廷已摇摇欲坠,要求立宪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尤其江苏人士纷纷上书,义正词严地指出:朝廷的律令并没有不许掩埋有罪之人的骸骨,故吴、徐等人并不违反大清法度。两江总督端方与芝瑛的父亲和伯父私交不错,也替她们打圆场。还有芝瑛的朋友、美国教会的女教师麦美德也出面为



浙江杭州秋瑾墓

她打抱不平。这时正巧有美国军舰访华，清廷已订做了数千只银杯要送给来访的美舰官兵，麦美德借题发挥，在天津出版的英文《泰晤士报》上刊登文章说，现在清廷正要把一个仗义的女子由病院投入牢狱待死，尊重女权的美国官兵是不会收受纪念银杯的。清廷受到内外舆论的谴责，不得不收回成命，才使吴芝瑛等逃脱这一难。

秋瑾墓被毁后，棺木由其兄运回原籍绍兴，后来移葬于其夫家的湖南湘潭。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反动统治后，才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将烈士遗体归葬西湖。吴芝瑛为她重建新坟，并建造了一个纪念亭，因秋瑾牺牲前曾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故将此亭取名“风雨亭”。1913年孙中山路过杭州，特亲莅秋瑾墓祭奠英灵，并题赠“巾帼英雄”匾额，予以表彰。吴芝瑛又为秋瑾作诗，同时收集整理出版秋瑾遗稿，宣扬秋瑾的英雄事迹，不愧为生死之交。

吴芝瑛的豪侠之气，不仅表现在对待异姓姐妹秋瑾身上，平日也是见义勇为、仗义执言、敢作敢当的女中英侠。如清廷为了支付“庚子赔款”，向老百姓赠加赋税，贫苦人民不胜负担，苦不堪言。吴芝瑛挺身而出，为民请命，上书要求清廷取消对“无产人”的捐税。她为此横遭地主富豪的攻击，但也在所不惜。

她居住上海期间，有一良家女子李苹香，因丧夫被坏人骗卖入上海一妓院。此女很能作诗，兼善于绘画和书法，而被人们称为“诗妓”，颇有艳名。吴芝瑛很同情她的不幸遭遇，也很爱惜她的才艺，与她交游，感情不错，决心出巨资为她赎身，但一时又难于筹措巨款，竟毅然割爱，将家传的清代著名大书法家董文敏手书的全部《史记》出售。李苹香被救出火坑后，感激涕零，一再拜谢，吴芝瑛却淡然一笑，叫她不要把此





事放在心上,勉励她好自为之。

吴芝瑛与丈夫除了无锡的故居之外,在上海曹家渡和杭州西湖各有别墅一座,都叫做"小万柳堂",故人们都尊称她为"万柳夫人"。上海万柳堂与九果园相邻,她与该园主人吴渭川交谊深厚,不幸渭川父子相继亡故,留有遗产数万,委托芝瑛代管,等到他的嗣子长大成人,即如数归还。她这种高尚品德曾被传颂一时。但后来渭川的孙子吴荣泰胡作非为,多行不义,因犯案被捕,芝瑛爱憎分明,不但不护短,相反,致书上海民政长吴馨,历数其罪状,谴责他"痛殴尊长,惨无人道,天怒人怨,孽不可逭"。吴荣泰被判处19年徒刑。

辛亥革命爆发后,上海组织民军队伍,芝瑛不顾病魔缠身,慷慨解囊助饷。同时向上海女子北伐队司令陈也月上《请缨书》,愿为革命效力。

后来,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大肆筹划当皇帝,吴芝瑛闻讯当即致书袁世凯,指出"武力之不足恃,帝制自为之不可能",要他下台以谢天下,并毫不客气地说:"公朝去,而吾民早安;公夕去,而吾民晚安;公不去,而吾民永无宁日。"虽然袁世凯不可能接受她的警告,但从这件事也足以表明她的胆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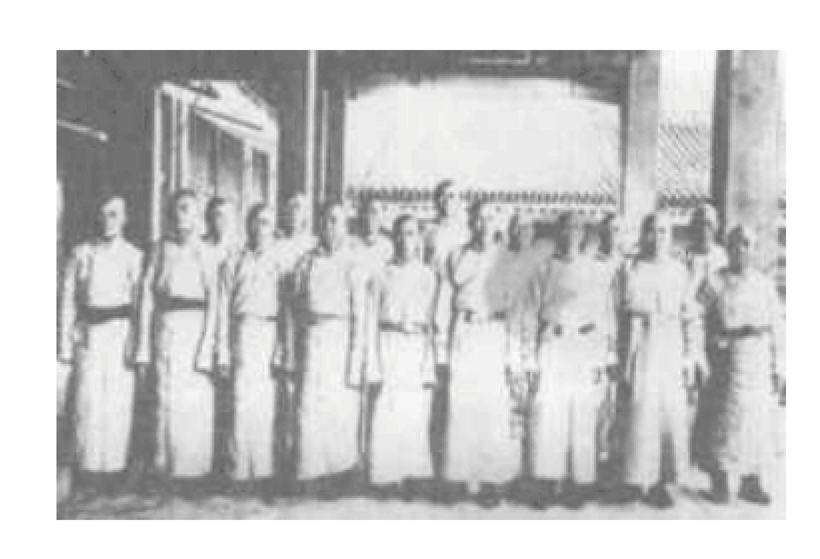
她虽出身富家,却对贫苦百姓十分同情,曾筹款救济江苏、安徽等地灾民,并在其家乡创办了鞠隐小学。她每有所见,便写诗文登诸报刊。署名"桐城女子吴芝瑛",故她名噪遐迩,尤其对女界有很大影响。她交游甚广,梁启超、樊增祥、徐悲鸿等都是座上宾。其著作也甚丰,有《帆影楼记事》、《剪淞留影集》及书法作品《小万柳堂帖》等。





忠言死谏的太监寇连材

太监是皇宫中豢养的奴才，大都是奴性十足，为了讨主子的喜欢，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趋炎附势，毫无人格可言。其奸恶者如李莲英之流，倚仗主子慈禧太后的宠信，干涉朝政，陷害忠良，营私纳贿，无恶不作，故在人们的心目中太监的形象极坏。然而在清朝末年，却出现了一位顶天立地，忠肝义胆，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敢于忠言死谏的“烈宦”寇连材，令人刮目相看，为人们所传颂。



养心殿前十六太监合影

寇连材，直隶昌平州（今北京市昌平区）人。从小很聪颖，秉性耿直，读过几年书，因家穷不能续读，识字不多。为生活所迫，15 岁被阉入宫，充当慈禧太后的梳头房太监。拜闻古廷为师，闻是光绪皇帝宫中的太监，本是贡士出身，爱好文学，为人正直，忠于光绪帝。

因寇连材聪明伶俐，勤快细心，对工作认真负责，很快受到慈禧太后的喜爱，太后宫内的会计都交给他掌管。后调任奏事处太监一年有余，又回任太后会计房。他虽在太后身边，却不盲从太后。甲午战争一败涂地，国家陷于危亡境地，维新运动风起云涌，使他深受教育。加上



他对宫廷内情了解日深，使忧国忧民的他日益感到国家前途堪忧，常为此苦恼叹息。

后来他逐渐认识到，光绪皇帝想要有所作为，变法图强，却受到慈禧太后的压制，不能施展抱负。而慈禧太后大权独揽，不图振作，纵情享乐，醉生梦死，不思富国强兵，反而以海军款大兴土木，修筑园林。寇连材忍无可忍，终于冒死向慈禧太后力谏，他屡次乘机向太后进谏，太后只当耳旁风，认为他年少不懂利害，屡加呵斥，看在历来勤奋工作的分上，未加治罪。寇见屡谏无效，太后仍我行我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和爱国的良心，使他不忍坐视，决心以死力谏到底。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1896 年 3 月 23 日）晨，慈禧太后尚未起床，寇连材已痛心地泪流满面长跪榻前，哭着进谏道：“国家危亡到了如此地步，老佛爷（指慈禧）即使不为祖宗天下计，难道也不为自己打算吗？怎忍心纵情游乐，坐看国家的灭亡？”慈禧太后照例不但听不进去，反而认为他疯狂，怒斥他退下。

寇连材不甘罢休，决心以身殉国，他请假五天，回家与父母兄弟诀别。把他所写《宫中日记》一册交给弟弟收藏，所记多是光绪帝受慈禧太后虐待、压抑的情形。说皇上境遇最苦，连生母都不许见面，每天向太后请安，不命起，不敢起。稍不如意即令长跪，疾声厉色，使皇上胆战心惊，如对狮虎。御膳离御座远的菜多半已腐臭，近御座的也都已干冷，不堪下箸，往往吃不饱。有时让御膳房换上可口一点的菜，管膳者必面奏太后，太后便责他应以俭为德。而太后自己却穷奢极欲，挥金如土。他对皇上受制于太后、孤苦零丁、还不如一孤儿的处境，表示愤愤不平。

他告别亲人回宫后，把平日省吃俭用的所有积蓄都拿出来分给众小太监，然后于二月十五日（3 月 28 日），向慈禧太后上一奏折，共十条。主要内容有请太后勿揽权，归政于皇上；勿修颐和园，停兴土木；勿游园，回宫居住；停修铁路；练乡兵加强战备；勿用李鸿章、张荫桓并予以革职；仿效尧舜，择天下贤者立为太子等，把自己的主张全盘托出。




慈禧太后看了他的奏折，气得火冒三丈，以为他是受人指使，想追出他的后台，便把寇连材叫来亲自审问。她责问：“你的奏折是你自己写的，还是受别人指使？”寇答道：“是我自己所写，并无人指使。”太后还不大相信，让他背诵奏折内容，寇朗朗背诵，与奏折相合。再看奏折确实是寇的笔迹，错别字较多，有的句子也不大通顺，证明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寇所写。



现在的颐和园佛香阁

太后又问：“本朝成例，太监有言事者斩，你知道吗？”寇正义凛然地答道：“奴才知道，奴才若是怕死，就不上奏折了！”于是太后便下令把他囚禁于内务府慎刑司，次日移交刑部，命当日处斩。

二月十六日(3 月 29 日)，寇连材被押至菜市口刑场，临刑时镇定自若，脱下一枚碧玉扳指赠刽子手，请他从速砍断头颅。他又以一块玉佩、一块金表赠送来送行的太监。然后他整理衣冠，望阙九拜，从容就义，神色不变，时年仅 28 岁。

寇连材就义的当天，惯于落井下石的卑鄙小人杨崇伊，劾奏侍读学士文廷式私通内侍，联为兄弟。次日，慈禧太后下旨将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驱逐回原籍萍乡。一时京城传遍如下对联：

寇太监从容临菜市；
文学士驱逐返萍乡。



文廷式像

表达了对寇连材英勇就义的同情和赞扬，及对专横的慈禧的不满。此事成了当时舆论的焦点，人们纷纷议论慈禧太后不能采纳忠言，滥杀正直人士，使寇连材的事迹广为传播。维新派的首领之一梁启超还特地





北京西百花山有寇公祠,为民间祭祀寇连材而立

为他写传,宣传他的忠勇事迹,称赞他为仁人志士,号召人们学习寇连材的精神,推行新法,以挽救国家的危亡。



李莲英的拍马术

李莲英出身贫苦，从小入宫当一个下等小太监，他之所以能迅速爬上太监总管的宝座，受到慈禧太后的终生宠信、言听计从，成为有清一代权势最大的宦官，主要是凭借他善于逢迎拍马、精于阿谀奉承的特长，有一整套讨好慈禧太后的拍马术。现仅举数例，以窥一斑。



大太监李莲英

慈禧太后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人，极难伺候，宫中的太监宫女动辄得咎，使得人们见她都胆战心惊。她很爱美，注重打扮，尤其是她宝贝似的头发，谁要梳掉一根，轻则挨打，重则处死。先后换了许多梳头太监，她都不满意，太监们都把替太后梳头视为畏途，人人谈虎色变，唯独李莲英认为这是亲近太后的捷径，跃跃欲试。鬼灵精的他就有心计地先暗自向京师各著名理发师求教，博采众家之长，融会贯通，掌握了一套梳头的妙技。又向曾为慈禧太后梳头的太监打听到太后对梳头的要求、好恶和应注意事项，做到胸有成竹，伺机而动。一次，梳头太监又受责打，李便乘机毛遂自荐，太后瞄了这个年轻太监一眼，并不抱希望，实因没有一个满意的，姑妄试试





地微微点头。太监们都为李捏把汗,不料他拿起梳头就非常熟练地梳了起来,不急不慢,不轻不重,恰到好处,十分舒服,太后的满脸怒容渐渐消失,很难得地展露了笑容。李莲英梳出的发式也极美观,很合太后的心意,太后终于夸奖了他,问他的绝技是从哪里学来的。李莲英见机会来了,便装出无比崇敬和忠诚的态度说:"太后的秀发何等珍贵,宫中却没有一个人能把它梳理好,这是我们当奴才的耻辱。所以我立志要为太后解除烦恼,为太后梳好头,于是到各大理发馆刻苦向名师学艺,只求能伺候太后梳好头。"说得天花乱坠而又很动感情。这番话竟打动了太后,使她既惊奇于他的绝技,又欣赏他的忠心,从此把他留在身边,专职为她梳头。李莲英终于打开了通天的门径,每天都能亲近太后,察言观色,细心揣摸太后的好恶,投其所好,伺机进言,替她出谋划策,或说一些笑话逗太后开心,使太后渐渐离不开他,把他当做心腹,很快便提升他为太监总管。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一步登天。

李莲英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当然还必须不断地拍慈禧太后的马屁,而且拍马屁的技巧越来越精,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简直是个马屁精。慈禧太后是信佛的,自称为老佛爷,曾经打扮成观音照相,李莲英就在她身边打扮成护法神韦陀。佛教主张不杀生,而且要放生,这个杀人如麻的老佛爷,居然每年十月初十日庆祝她生日的这一天,都要让人买来很多鸟和鱼在颐和园放生。光绪二十年(1894 年)十月十日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这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许多大臣鉴于国难当前,反对大肆祝寿,慈禧太后大为震怒,扬言"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要让他一辈子不痛快"。李莲英对这句话另有所悟,心想,反过来说,如果我能让你



慈禧装扮观音,右一为李莲英


慈禧等人装扮观音在中海乘平底船

这一时极痛快，那么你就会让我一辈子都痛快啦。他认为太后这个大寿的日子是拍马屁的最好时机，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于是则挖空心思要让太后在这一天欢乐痛快。经历几个不眠之夜，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奇招，即在放生上下工夫。

他比往年提前了几个月命人到处收罗各种鸟，数量也比往年多得多，并特地找来多名驯鸟行家，在万寿山上鸟放生处进行训练。到了慈禧太后诞辰之日，太后接受百官贺寿，举行完了典礼，照例在后妃宫眷们簇拥下登上万寿山为鸟放生。当她命人将千百只鸟笼打开之后，意外地出现了奇迹，往年鸟笼一打开，鸟儿纷纷飞出，转眼便不见踪影，各自逃命去也。这次鸟儿飞出去，转了一圈又都飞回来，或雀跃或点头地朝太后不住鸣叫，再不飞走。太后正感到纳闷和惊奇时，李莲英看准了火候，马上跨前一步跪下，开始大唱赞歌说：“老祖宗的善心感动了百鸟，使它们都舍不得离开老祖宗，尤其今天是老祖宗的六十大寿圣节，百鸟都在为老祖宗祝寿哩！这是百鸟朝凤啊！”几句话说得太后乐不可支，她也猜出可能是李莲英派人训练的，便眉开眼笑地亲昵骂一声：“又是你这个猴精捣的鬼吧！”这一声骂实际上就是最高的奖赏，李莲英故作谦虚，连声说：“奴才不敢。”

接着请太后到昆明湖边去给鱼放生。当一桶桶大鲤鱼倒进湖中时，奇迹又出现了，一尾尾鲤鱼钻进湖里后，很快又游回岸边，一字排开，张大嘴巴一开一合，不停地向岸上的太后点头。慈禧太后更被这一奇观所吸引，竟看呆了。李莲英又适时地跪下说：“您看，还是奴才说得对，又是老祖宗的善心感动了鱼儿，使它们不忍离去，全游回来向老祖宗叩头谢恩，祝老祖宗万寿无疆哪！真是大吉大利，可喜可贺！”原来这是李莲英命人将装满鱼虫的小纱布口袋钉在湖堤水中，让鱼虫不

断钻出来浮游在岸边水面，这些鲤鱼是在三天前弄来的，故意不喂食，鱼儿早已饥饿难忍，见有大量可口的鱼虫，岂有不游回来大口吞食之理呢？

李莲英导演的这两场好戏，完全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使慈禧太后乐得合不拢嘴，浑身从里到外无处不舒坦，从此更加宠信李莲英。从这个典型事例，可以看出李莲英拍马术之精妙绝伦。

李莲英的“三绝”

慈禧太后身边先后有两个最受宠信的太监，一个是安德海（1869年奉命采办宫中用物，非法南下，张扬跋扈，招权纳贿，被山东巡抚丁宝桢乘机诛之），另一个就是李莲英，被爱称为“小李子”。





安德海、李莲英先后为慈禧太后的贴心人

李莲英是直隶河间（今属河北）人，早年随其父做过鞋匠，绰号“皮削李”，为人狡黠。咸丰年间，他自阉为宦，从此在皇宫内达五十余年，干预国政，卖官鬻爵，广植私党，反对戊戌变法，陷害帝党及维新志士。他在慈禧太后死后出宫，不久被人杀死，身首异处。

据说，李莲英之所以受到慈禧太后的特别宠信，是与他善于迎合慈



禧太后的爱好分不开的。为此,他费尽心机地刻苦钻营并掌握了三手绝活。

李莲英的拿手绝活首先是善梳各式新型发髻。当时,为给慈禧太后梳头,不少宫女与太监屡遭责罚。只要梳落的头发稍多,轻则被责打,重则被处以极刑。所以,宫中内侍们一轮到为慈禧太后梳头,就有谈发色变的恐惧。而李莲英却认为这是讨好主子向上爬的好机会,他暗自拜师求艺苦学各种发式,并很快创新和掌握了一套独特的梳头功夫,就主动要求去给慈禧太后梳头,不仅落发不见,发式还能常梳常新,绝不重复,终于赢得了慈禧太后的欢心和赏识。



位于北京海淀镇彩和坊 24 号院的清朝大太监李莲英故宅,是一个三进院落的四合院

李莲英的第二手绝活是善于按摩推拿。慈禧太后虽然养尊处优,但却权力欲极强,为了牢牢控制住大清朝政,整天弄权耍心术,不由得时常感到心竭力疲,每每离朝回内宫独坐,更感到周身酸软。唤来为慈禧按摩的内监,不是手轻作痒,就是手重作疼,常被呵斥。颇有心计的李莲英早已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就钻研起按摩推拿术来,很快又掌握了按摩推拿的各项要领,并寻机主动去为慈禧太后施行按摩推拿,还刻意迎合慈禧的生理需求,日益获得了慈禧太后的厚爱。李莲英为慈禧按摩,推揉滚捏,用力恰到好处,使慈禧感到十分舒适。因此,他每天早晚两次进入慈禧寝宫为其按摩。先是跪在榻前的红毯上,以右手慢慢地伸入被下,轻轻拂拭之后,由上半身开始按摩,然后按摩下身、两腿,除“不方便”的地方外,全身各部位均按摩一遍。每回经过李莲英精心按摩后,慈禧太后顿觉通身轻快,惬意得昏昏欲睡。早晨慈禧醒来,总要问一问:“你来啦?”李莲英就毕恭毕敬地回答道:“来得长



时间了，祖宗今天舒服吗？”夜晚按摩后慈禧说：“下去吧！”李莲英则一动不动地跪着，等慈禧太后睡着后才离开。若慈禧在按摩中睡熟了，李莲英就一声声轻唤着“祖宗”，然后三叩头离去。李莲英由于掌握了恰到好处的按摩绝技，更是使慈禧太后一日都离不开“小李子”了。



慈禧在颐和园仁寿殿前乘舆图。前右为李莲英、左为崔玉贵

李莲英的第三手绝活是善于说书。慈禧太后在颐和园“颐养冲和”时，无论是泛舟游湖，还是观山赏月，总喜欢有人给她说笑生趣。李莲英为讨得慈禧的欢心，在私下里暗下苦功，将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三国演义》、《小五义》、《石头记》等篇目背得滚瓜烂熟，不敢有半点差错，加上他绘声绘色、丝丝入扣、妙语连珠的口才，听得慈禧太后神魂颠倒，欲罢不能，欲止不忍，欲听不绝，时常笑颜满目，眉飞色舞，乐不可支。李莲英曲意逢迎主子的技艺，达到了炉火纯青、全宫无敌的地步，连专门说书的艺人也为之折服。李莲英在说书时，还常常插入一些口技，如学猫叫、鸡鸣、狗吠之声，配之以手舞足蹈，不时引得慈禧发笑，因此也经常得到银两奖赏。所以，慈禧太后一有烦闷，总是首先想到“小李子”，简直达到了一日没有见着“小李子”，就一日没有乐趣的地步。



慈禧扮观音，李莲英（右）扮善财童子

另外，李莲英还尽量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全力讨好慈禧太后。据说，慈禧太后被称为“老佛爷”，就是李莲英给安上的头衔。在清朝光



绪年间,我国北方连年大旱。有一天,慈禧决定带领文武百官到天坛祈神求雨,刚好在求雨的第二天,北方果然下了一场大雨。在李莲英带头下,众大臣齐跪在慈禧太后面前,李莲英灵机一动,向慈禧奏贺道:“太后真神人也,连天上的雨公也听您的派遣,这不是老佛爷降临人间吗?”慈禧听后,乐得前俯后仰,兴奋得合不拢嘴。众大臣又一次跪在地上,齐声高呼:“老佛爷万岁,万万岁!”从此,将慈禧太后称为“老佛爷”的叫法就流传开来了。



李莲英的皇亲梦

李莲英工于心计，善于逢迎拍马，取得了慈禧太后的宠信，当上清宫太监大总管。太后对他可说是言听计从，他也因此权倾朝野，即使王公大臣也对他敬畏三分，成为有清一代最大的权阉。他还通过贪污受贿、卖官鬻爵，聚积了巨大财富，但他仍然不满足，总觉得太监的身份只不过是皇家的奴才，名声不好，一旦太后仙逝或自己年老不能再为皇室效劳，总有失宠之日。对此他耿耿于怀，深感美中不足。

正巧李莲英有一个妹妹，年方二八，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且知书识礼，兼通文墨，又乖巧伶俐，聪明有心计，一若其兄。于是，李异想天开，欲利用妹子的姿色攀龙附凤，选入宫中为妃，自己当上个国舅爷，成为皇亲国戚，改变自己的身份，以进一步扩大、巩固自己的权势，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叵耐清代祖制，严禁选汉女为妃嫔，甚至根本不许汉族女子住进宫中，连充当下贱宫女的资格都没有，以保证满族血统的纯正和清代政权不落入汉人之手。历朝皇帝都不敢违背这个祖制。李莲英对此也是十分清楚的，但他心存侥幸，认为突破这个瓶颈关键仍在慈禧



紫禁城内盛装的宫女

太后,只要她肯做主,祖制并非不可能逾越。于是他就有计划地进行运作。每逢太后高兴时,他总是竭力吹嘘自己的妹子如何漂亮、讨人喜欢,保证太后见了一定会把她当做掌上明珠,并说他妹也和他一样,忠诚于太后,做梦都想见老佛爷一面,亲自伺候老佛爷。开始慈禧太后也只是听听而已,并没往心里去,后来经李莲英一再提起,便产生了好奇之心,有意想见见这个可人的佳丽。



左起:光绪的妃子瑾妃、德龄、慈禧、容龄、容龄之母、光绪的皇后

正在这时李莲英得到一棵特大何首乌,他深知太后最宝贵她的头发,希望它永保乌黑亮丽,李便把这棵何首乌恭恭敬敬地献给太后,并对她说:“像这么大的何首乌乃百年不得一见,吃了它可永保头发乌亮,奴才得来不易,特拿来孝敬老佛爷。但服用何首乌,要煎制得法,经九蒸九晒之后才有奇效。舍妹深得其中三昧,最善于烹制此物,非得她亲手烹制我才放心。”慈禧太后得到这枚极其罕见的何首乌已是心花怒放,听李这一说,更是喜上眉梢,当即传令召李莲英之妹入宫。

当然,李莲英事先早已对妹妹进行精心调教,教给她宫中掌故和一切礼仪,各种场合的称谓应对,以及慈禧太后的性格特征、爱好禁忌,如何投其所好,博取太后的欢心,等等。他妹妹也很机灵,心有灵犀一点通,每能举一反三,心领神会,演练纯熟,不愧是李莲英的妹妹。当她进宫参拜慈禧太后时已胸有成竹,举手投足无不合乎宫中规矩,举措得体,应对裕如,伺候太后更是细心周到。加上她确实人才出众,美貌超群,竟然使这个最爱挑剔、极难伺候的慈禧太后也感到十分满意,传下话去,留她在宫中伺候,让宫中人等称她为李姑娘。她所烹制的何首乌很地道,更获得慈禧太后的赞许。从此李姑娘在宫中站住了脚。

李莲英见时机已成熟,便进一步寻找机会,向慈禧太后进言:“如今皇后和皇上形同水火,无法接近和影响皇上,瑾嫔也形同虚设,皇上

心中只有珍嫔（后来加封为珍妃）一人，珍嫔恃宠专给皇上出坏主意，这样下去不但皇上和老佛爷的母子之情将受影响，恐怕大清的江山也令人忧虑。如若将来李姑娘选入宫中为妃，她一定和奴才一样无限忠于老佛爷，一心向着老佛爷，而凭她的美貌和机灵，一定能讨皇上的欢心，可夺珍嫔之宠，可以说服和辅佐皇上与老佛爷一条心，一切听命于老佛爷，岂不是一举两得。"他的这番话打中了慈禧太后的要害，触动了她的心病。光绪十三年（1887 年）慈禧太后迫使光绪帝选她的侄女叶赫那拉氏为皇后，就是为了利用裙带关系，在皇帝身边安插自己的心腹，通过她侄女去影响光绪帝，以便于自己随时掌握皇帝的动向，牢牢控制皇帝，以巩固自己的权力。不料弄巧成拙，选她侄女为皇后并非光绪帝的心愿，婚后感情不和，被光绪帝晾在一边，根本不起作用。若能如李莲英所言，选她妹妹为妃，他兄妹二人对太后的忠心是不成问题的，倒是可以加强对皇帝的控制，不失为一妙策，不过祖制难违，选汉族女子为妃，必然要遭王公大臣、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她正在为此而沉吟，李莲英马上看出她的顾虑，便进一步怂恿说："至于祖制是可以根据需要改变的，历朝在许多地方也多有所改变，就凭老佛爷的威望和权力，您的决定有谁敢说半个不字？！"慈禧太后微微点点头。李莲英满以为自己的计划即将如愿以偿了，不觉心中乐开了花。



光绪帝宠爱的珍妃

李莲英为了达到目的，采用了双管齐下的做法。他认为历朝皇帝没有不风流的，故在说服慈禧太后的同时，也让他妹妹主动接近光绪帝。按清宫规矩，没有皇帝的召见，任何人是不可以主动去见皇帝的。李莲英的妹妹知道光绪帝每天都要定时去向太后请安，便利用伺候太后的机会，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香气袭人，专等光绪帝请安退出来时，向前向他请安，主动调情，企图引起光绪帝的垂青，不料光绪帝根本不理她，连正眼都没瞧她一下，使她无计可施。



至于老奸巨猾的慈禧太后，她虽同意李莲英的计划，在皇帝身边重新安插一个耳目，却不愿意自己出头做主，背上违背祖制的罪名，成为舆论攻击的目标。她企图说服光绪帝同意此事，只要他同意了，就可以把违背祖制的罪名转嫁到他身上。于是她召见光绪帝，劝他纳李姑娘为妃。不料光绪帝断然拒绝，他说，此事违背祖制，孩儿若选汉女为妃，有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孩儿断难从命。慈禧见勉强无益，只好作罢。李莲英费尽心机的皇亲梦终于破灭了，眼看就要到手的国舅爷当不成了，从此更加痛恨光绪帝和珍嫔。